

沧桑家事  
记忆永恒



# 沧桑家事 记忆永恒

王桐初著



年逾古稀又五年，《沧桑家事》拙作篇。  
先人驾鹤升天国，《怀念永恒》存心间。

## 目 录

|                         |            |
|-------------------------|------------|
| 一组照片-----               | 005        |
| 读《沧桑家事·记忆永恒》后的一点感想----- | 017        |
| ——赵文滔先生                 |            |
| 两百年家国情怀，一辈子难诉衷肠         |            |
| ——《沧桑家史》书评              | ——吴称谋……025 |
| 前言-----                 | 030        |
| 第一篇家学渊源——几代人境遇迥异        |            |
| （一）穿清庭朝服的高祖父-----       | 035        |
| （二）誉满杏坛的曾祖父-----        | 038        |
| （三）热心兴学的祖父-----         | 043        |
| （四）叔辈们的不幸-----          | 051        |
| （五）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 062        |
| （1）“三反”时的阴谋诬陷-----      | 062        |
| （2）“反右”阳谋的刻骨铭心-----     | 070        |
| （3）良知泯灭的株连-----         | 079        |
| （4）夹边沟——父亲人生的终点-----    | 107        |
| 第二篇为何划“右”——何罪之有？        |            |
| （一）兰州之行-----            | 113        |
| （二）胡编的“改正”结论-----       | 119        |

|                     |     |
|---------------------|-----|
| （三）划“右”标准及劳教条例----- | 126 |
|---------------------|-----|

|                |     |
|----------------|-----|
| （四）人间地狱真相----- | 133 |
|----------------|-----|

### 第三篇怀念永恒——敬盼英灵安息

|              |     |
|--------------|-----|
| （一）祖孙情深----- | 146 |
|--------------|-----|

|              |     |
|--------------|-----|
| （二）追忆父母----- | 157 |
|--------------|-----|

|                  |     |
|------------------|-----|
| （1）父母的青少年时代----- | 157 |
|------------------|-----|

|              |     |
|--------------|-----|
| （2）鸾凤和鸣----- | 161 |
|--------------|-----|

|                  |     |
|------------------|-----|
| （3）父亲在大学的四年----- | 164 |
|------------------|-----|

|                  |     |
|------------------|-----|
| （4）父亲广西八步遇险----- | 167 |
|------------------|-----|

|                 |     |
|-----------------|-----|
| （5）难忘乡间的三年----- | 169 |
|-----------------|-----|

|                   |     |
|-------------------|-----|
| （6）父亲南京工作的两年----- | 182 |
|-------------------|-----|

|                 |     |
|-----------------|-----|
| （7）大家庭中的母亲----- | 198 |
|-----------------|-----|

|                |     |
|----------------|-----|
| （8）锡矿山的团聚----- | 204 |
|----------------|-----|

|                 |     |
|-----------------|-----|
| （9）长沙的温馨岁月----- | 219 |
|-----------------|-----|

|                |     |
|----------------|-----|
| （10）武汉的五年----- | 226 |
|----------------|-----|

|                   |     |
|-------------------|-----|
| （11）历尽艰辛后的母亲----- | 247 |
|-------------------|-----|

|                     |     |
|---------------------|-----|
| （12）平凡而珍贵的精神财富----- | 259 |
|---------------------|-----|

|                      |     |
|----------------------|-----|
| （13）寻觅足迹，告慰在天之灵----- | 267 |
|----------------------|-----|

|         |     |
|---------|-----|
| 后语----- | 274 |
|---------|-----|

### 附件三篇

|                 |     |
|-----------------|-----|
| 父亲遗作——南海泛舟----- | 277 |
|-----------------|-----|

|                 |     |
|-----------------|-----|
| 2015年清明节感言----- | 286 |
|-----------------|-----|

|           |     |
|-----------|-----|
| 怀念故乡..... | 293 |
|-----------|-----|



祖父王子濂 1886 年农历 11 月 22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58 年因我父亲蒙冤遣送夹边沟农场，老人承受不起这一打击，当年 8 月自缢身亡于甘肃省兰州市。



父亲**王本莢** 1912 年农历 11 月 21 日出生于湖南省。地质钻探工程师。1957 年在甘肃省地质局被错划为右派，1958 年 4 月底遣送酒泉夹边沟农场，1960 年 11 月因劳累饥饿去世于农场。



母亲张瑞仙 1914 年农历 2 月 15 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我父亲被冤屈后，劳累且积郁成疾，1966 年 11 月 25 日逝世于广西南宁市。



因父亲野外工作时间多，父母一生聚少离多，没有俩人的合影，这是 1954 年元旦父亲和母亲在湖北大冶铁山与同事合照中摘下俩人头像的一张合影。



1950 年 10 月，父亲调往武汉工作，行前父母亲、妹妹和我四人，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



1934 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时的学生照。  
(1934 年 7 月至 1937 年 1 月在北京，  
后北京大学迁往昆明，1938 年 7 月毕  
业于西南联合大学。)



1947 年父亲在南京资源委员会  
矿产测勘处工作时摄于南京。



1954 年父亲评为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赴北京开会时，与北京老友们(原在南京矿产测勘处工作时的同事)合影，中排左一是我父亲。



1953 年在湖北大冶观看学员操作钻机，  
前排左第二人是我父亲



1953 年 7 月在湖北大冶铁山与钻探学校职工  
合影，左二是我父亲。



父亲与钻探队培训班学员合影，

中排中间是我父亲。



1954年元月，父亲调平顶山工作，离开湖北大冶钻探学校时与教导股教职工合影。前排左二是我父亲，左一是我母亲。



1953 年 2 月父亲在大冶钻工学校与几位年龄最小的学员合影,父亲对他们特别关心。



母亲 1966 年 11 月 25 日病逝于南宁市，  
2003 年 11 月 3 日骨灰安葬于南宁烈士  
陵园公墓区。父亲 1960 年冤逝甘肃酒  
泉夹边沟农场，遗骨无处寻觅，墓中  
仅是一帧遗照与母亲同穴。

## 读《沧桑家事，记忆永恒》后的一点感想

——赵文滔先生

王孝嫻是一位老师，她一生，教书育人，作为园丁，她把一批批幼苗送进科学的殿堂，广阔的社会，碌碌一生，孜孜不倦，人民养育了她，她也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她是一位尽责的老师。直到退休，拖着半身病痛，她才有时间回忆她的“沧桑家事”。

走进知识的殿堂——大学，是每个学生的理想。然而，谁又会知道，她在这个殿堂——天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小小年纪，却被中国的特殊政治株连风浪莫名地掀入大海，承受了几近灭顶之灾的灾难。作工程师的梦破灭，危难中才走进教书育人的行列。

她的父亲王本莢先生于 1938 年在抗日战乱中从北平的北京大学随校迁赴云南，从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地学系毕业。

当时，清朝覆亡，军伐混战，内战连连，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是，在社会变革中：“学一门技术，为国效劳”；在从事自己的专业劳动中，解决生活问题。“地学系”就是后来称为的“地质系”。（52 年院系调整，北京地质学院就是以北大、清华的地学系为基础成立的。）

王本莢先生毕业时，正是国难当头，毕业后为了生活，也为了发挥其专业特长，战乱中曾在西南有色金属产地从事过艰难危险的勘测工作。他还以地质专家的身份参与西沙群岛磷酸盐矿的储存量勘察，和同事写出了极有见地的勘察报告。（现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解放之后，只看到社会的变革是美好的。大区还没有撤销时，他担任过中南区重工业部钻探总队副总队长。从技术的角度说，他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专家”。然而从政治角度他却完全没有理解毛泽东自己说的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以及“新农民革命”的社会变革的真谛。不要说作为一个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他，即便是历史系毕业生，当时也没想到，把毛和“农民革命”来类比。更没有和洪秀全、李自成等“农民革命家”来类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懂得许多。后来爱国思想鼓舞他自动申请到西北艰苦环境去开拓工作而远赴甘肃。刚去不久他就赶上了收拾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很自然的，新来的人大部分是被“划”的目标。

甘肃的“官风”极具地方特色和原始性，不久他就被送到著名的夹边沟去劳教。

一个家庭的支柱被撤，顷刻间就面临家庭危机。

她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祖

父参加过清代的科举。大半生在故乡办学，为桑梓教育服务。年届古稀，孤身一人，前不久刚被儿子接到兰州赡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哪里见过什么“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突然把儿子打成“右派分子”，弄走了去劳动教养。老人被迫“留诗自缢”未必就完全是因为失去唯一赖以生活的儿子，没有了生路。那个时代的老知识分子考虑最多的恐怕还是传统文化的“诚、信、厚”。在他头脑里解不开的问题应该是：“知子莫如父”，何来“莫须有”？这个不解的难题。直到他被迫自缢时，他都想不明白。所以老人的留诗最后还有：“扶筇时上望乡台”对儿子的悬念。

单位还逼着让立刻腾房。家里就留下没有工作的母亲。当即陷入无法应对的窘境。

正在天津大学三年级读书的王孝娴不得不被迫休学，赶赴兰州，接过这一付家庭重担。

好不容易经人帮助谋得了一个可以勉强养母维生的工作。接着又要被伐到“陇西荒原”。甘肃本就是贫穷地区，那“陇西”更属于不毛之地。一个刚届成年的女孩带着一个家庭妇女——母亲，要去荒地谋生，岂不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危难时刻”，她在南宁的好友向她伸出了真诚友谊之手，才把她引到南宁，真正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叔父从唐山工学院毕业，在贵州教书，为了和当地领导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竟然也被冤狱十年，1979年给平反时，已经重病缠身。

按理说，无产阶级是不唯心的，不相信宿命的。为什么不幸会连连出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么这不是社会、制度、掌权人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呢？

艰难啊，她这一生。

甘肃的地方官真的是“政绩”斐然。到了1960年，仅仅两年，他们就创建了胜过奥斯维辛、古拉格的以饿死人，活人吃死人为特点的消灭人的记录，在夹边沟作了试点。王本莢先生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所谓的“罪行”，却被施以原始性的闻所未闻的处罚方式，不幸于1960年11月被饿死在夹边沟。

政不惊人誓不休。人已经被他们整死了，甘肃却在1960年12月给王本莢来了个“摘帽子”。还说是按“正常死亡”对待。说这话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但突然想起1946年4月17日，共产党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在《新华日报》质问王芸生先生的文章里的一句话：“……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

人重要不重要？科学技术重要不重要？知识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都不重要。

金口玉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圣人出，黄河清”。他就是“圣人”。

超英赶美，砍树炼钢，亩产万斤……

这就是“农民革命”的特点。

1978年，中央下发55号文件给“右派”“改正”。正式说明王本茨作为一个有色金属的专家，当年是被“划”错了。也就是说他本人“没问题”。

二十年过去了。被迫悬梁叫作自缢；活活饿死叫作“正常死亡”；被权系狱，只作平反，免惩罪犯；以及当时作为一个无辜的女孩——王孝娴被伤害的一生变故由谁来负责？作恶多端者概无责任，没有人承担任何责任。那末，这些真正的罪行是谁的责任？没有人。没有人！

死者已逝，活着的，最多允许你的也就是“记忆永存”。

在中国，历史是一本学不完的教科书。永远学不完的教科书。

## 怀念赵文滔老先生

(赵老于 2014 年 5 月辞世，是在他给我写完以上《感想》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此文以示对他老的怀念)

2014 年 5 月 21 日文滔老驾鹤西去，惊闻这一噩耗，我禁不住热泪双流，虽然从他三月中旬生病入住医院时，从他的病情看，就并不乐观，但我仍然遥祝他能闯过这一险关，我默默地期望着好人会有天助。可是他走了，我好几晚无法入睡，与他交往几年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

我是 2010 年 8 月初与另一位朋友交往中知道赵老的，便试探的给他去一电话，大致向他谈到我的情况，从这第一次的通话中，我就感受到了他的热情，随即我便给他去了一信，谈到我父亲及我家 1957 年“反右”后的境遇，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作品《伤害》及《木人的话》。从《伤害》一书中我了解到他的不幸经历，也知道他的胞弟与我是同一所大学同年级的校友，因不同专业，并不相识，但无形中更拉近了我和文滔老的距离，从此我便视他为我的兄长。

当时他让我将我父亲的情况写一篇文章，他可发给刊物登出，我匆忙中写下一篇《沉重的回忆》从电子邮箱发给他，不久他告之此文已发给《巴山夜雨》及一称为《观察》的刊物，随后此文便在 2011 年 9 月《巴

山夜雨》第9期登出。他还告诉我《观察》也刊登了，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共识网》及《爱思想网》还有其他几个网页转载了。我父亲1956年从武汉调往西北仅一年时间，1957年被甘肃省地质局划为“右派”，含冤于1960年11月饿死在人间地狱甘肃夹边沟，半世纪尸骨无存。几十年来为维护个别人的威望，仍坚持“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说词，尽量封闭有关信息，今年清明甚至捣毁由亡灵家属及社会人士捐款建成的夹边沟纪念碑，千方百计阻挠家属去悼念，企图使夹边沟事件无声无息。我所写的有关回忆父亲的文字刊出后，我接到不少素昧平生的人打来的电话，我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地质钻探工程师，他的冤逝现在总算让世人知晓了。

随着赵老对我家世的进一步了解，他鼓励我写下近几十年变迁的家庭境遇，2013年初正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于是我便从2011年动笔写对家事的回忆，说实话由于我文字水平有限，从未写过较长的文章，我不知如何下笔，反反复复是赵老一再鼓励和提示及修改，赵老还托人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购得《西南联大校史》一书寄给我（我父亲原是考入北大，1938年后是西南联大毕业生，赵老是为让我了解更多的史料），我才完成了《沧桑家事·记忆永恒》这本小书，作为父亲诞生100周年的祭礼。赵老还为这本书写下了他的读后感，

因此我从内心感激赵老。

自 2010 年交往，因南宁—北京相距较远，加之我双腿有疾，难出远门，我与赵老不曾见过面，但电话、信件、电邮交往频繁，几年的交往，情谊已深，他才华横溢，善良真诚，他是我敬重的良师益友和兄长，在他病重入院前，给我寄来了他新出版的《八六杂谈》，这是他人生最后的贡献。他走了，我要告慰他，尚健在的朋友们不会忘记他，愿他在天国里过得幸福，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也会与他在天国里相会，再述情谊。

---2014. 6. 15. 写于南宁

## 两百年家国情怀，一辈子难诉衷肠

### ---- 《沧桑家史》书评

吴称谋

本人与王孝娴女士结缘于天问学会《反右与当代中国命运》一书的征文活动，王女士曾经是一名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王老师而今已近八旬高龄，却笔耕不坠，实乃精神可嘉，亦难能可贵。将先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反右运动中不幸落难及整个家庭陷入绝境的悲惨遭遇，晚年敢于披露出来并投稿收入反右六十周年文集，此乃大孝之举也。反右文集已经被一些世界名牌大学图书馆收藏，它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将永存于世。

我们之间虽然素未平生，但通过邮件往来却感觉彼此均心系家国情怀，王老师遂将近年写的《沧桑家史》书稿发来与我分享。我在浏览此书的过程中，甚为感慨。其一，从1840年以来，中国很多大家族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我从《沧桑家史》中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真是，两百年家国情怀，一

辈子难诉衷肠。其二，此书正如作者其名，孝嫫者，对先祖之缅怀，对家乡之眷恋，对家族之关切，以及对父母之思念，从书中收集的珍贵图片以及书中的字里行间，跃然于纸上，扣动读者心弦。

本人出生于湘赣边界的一个小村庄，和王老师的家乡宁乡县相隔不远，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颇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浏览此书的过程中，书中所记载的家史故事，很多触动了我对童年的记忆。于是，我有了为此书给个书评的冲动，并告知了王老师。此后的几次邮件往来，我感到了王老师的一种默默期待。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的期许还一直搁在心头。2017 年阳历的 11 月 23 日就是西方的感恩节了，懂得感恩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最基本品质。我得赶紧写完对此书的读后感，算作是对王老师的一份节日礼物吧。

《沧桑家史》还是一部书稿，至今并未正式印刷出版，但并不影响它的流传与阅读。如今早已是电子时代，写书不一定要印刷成纸质书才算出版，王老师写的家史，已经做成电子版流传正是如此。我读《沧桑家史》时，就感觉在读中国近现代史。或许，王家大祠堂在过去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运动中，或是当下中国大陆的拆迁运动，早已片瓦无存，但它早已成为了作者的精神家园，心灵港湾，哪怕作者漂泊在外几十年，

对故土的眷恋依然来自于那个遥远的、模糊的、记忆中的王家大祠堂。

在书中，作者据家谱记载，提到王家先祖是从山西到浙江，进入福建，再于清朝康熙年间迁入湖南宁乡县回龙铺的。从王氏家族的变迁史就可以反映出中国近六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的北方、中原和江南地区均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野蛮屠杀。很多汉人在元朝期间因避祸而被迫迁至东南的沿海地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陆很多地区一片荒芜，千里无人烟，于是在明清时期汉人又陆陆续续回迁至内陆。由此证明，这部家史的价值卓尔斐然，它是一部真真切切的民族信史。

作者玄祖父楚才公，追随清末重臣左宗棠公，为平定西北新疆效力，保家卫国，功德卓著。正因为祖德殷厚，才有王家后世几代子孙的兴旺发达。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中叶，王家几辈人为民族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才智和力量。曾祖泽臣公，任职湘水校经堂，隶属岳麓书院。桃李满天下，为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特别是辛亥革命，培育出了很多人才，有的门生还成为了民国政府的要员。作者祖父和叔辈多是教书育人，父亲则是有色金属专家，这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近来两百年来，王氏家族在宁乡县可谓是豪门望族矣，

上对得起天地的造化之功，下对得起先祖的庇佑之德也。

《沧桑家史》除了记录祖上的一些耳闻传说故事，慈母操持家务的日常琐事，亲身经历的童年难忘记忆等等。书中还重点记载了作者父亲一生的坎坷、悲凉且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作者父亲本莼先生是个朴实的地质科学工作者。从书中叙述的“‘三反’的阴谋污蔑；‘反右’的阳谋陷阱；泯灭良知的无辜株连；夹边沟——父亲的人生终点。”本莼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千千万万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悲惨“红祸史”。

作者一生对家父的追念、悲诉、反思、揭露，铸就了一个受害者家属无畏抗争的铮铮傲骨。几千年来，中国人争取讲真话，吐真情，写信史，以期还原历史真相的浩然正气一直屡屡不绝。由于当下中国大陆再一次越来越趋紧的言论环境，真相无法公开诉说，正义依旧无法伸张，哪怕只是一种停留在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内心深处的抗争！这是一种任何当政者不可也无法彻底剥夺的权利和自由。

作者在《沧桑家史》的第三篇“专政之罪”中，讲到“追寻父亲的足迹；荒唐的右派结论；泯灭人性的标准；人间地狱的真相。”叙述的是一种何其荒唐的年代，

何其癫狂的民众，何其可悲的社会，何其可耻的政权！  
尽管如此，作者在书中的后记对未来依旧充满希望“世界民主潮流滚滚向前，总有一天会见到曙光吧？！”

书中最后，作者提到了家道的传承，这对于当下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变化，历史如何掩盖，永远不变的是家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家就有国，有家就应该有家道！只有家道不绝，中华民族才会生生不息、自尊自强，这是作为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经历几千年沧桑而延绵不绝的根本保障啊。

在本人看来，不忘孝道，提倡家道，弘扬中国优秀道统，正是此部家史与一般的家族回忆或家谱的不同之处。这也正是我为王孝娴老师的心血之作 -----《沧桑家史》写书评的一种缘由。

## 前言

古语有“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几十年来，我总想寻根溯源，写下我对家乡及几辈亲人们的怀念，自高祖王楚才公至今，一百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变革，五代人的经历是千差万别的。因为对祖辈了解得不是太多，更因为文字水平有限，很难准确翔实地表达出来。我曾祖父年幼时，高祖就去世了，曾祖辈我也不曾见过，祖辈也仅是儿时几年的相处。我所了解的家史，大多是我成年后，母亲和我相处时闲谈中得知。我外婆是我祖父的嫡亲堂姐，我父母按血缘是第四代姑表兄妹，因而我母亲对王氏家族知晓甚多。每逢中元节及一些祭祀祖先的节日，也曾见过祖宗牌位中诸如“迁宁一世祖、二世祖”等字样的牌位，但也不曾放在心上，直到2001年堂兄寄给我一本家谱，我才对家族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母亲所谈及的情况也得以印证。

据家谱记载：宋朝时，宋熙宁年间，祖先原居山西。政和元年南迁浙江慈溪，后又入福建。至清康熙22年（1683年），施琅率战船向台湾进发时，因躲避战

事居福建的王氏祖先中有一支率家人迁入内地，即湖南宁乡县回龙铺。后立大西楼王氏祠堂，并定辈名“诤国思正道、齐家本孝忠、文运承先泽、修明启后英。”因而有一说，湖南宁乡王姓也属山西王姓后裔。

迁宁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几辈人中均有国学生，四世正字辈国学生王正琳（志方）公有三子，即道字辈有同父异母三兄弟，名道复（汝修）、道南（楚英）、道东（楚才）。道复年廿岁时应试科考，未中秀才，急忧早逝，随后其一子也夭折，无后裔。正琳公夫妻已是中年，其妻已过生育年龄，为续后，正琳公娶一妾，又生育了道南与道东，后兄弟俩均入学湘水校经堂，学成入仕。其后人在宁乡居住都较集中。道东（楚才）是我的高祖父。

楚才公后裔遵祖训：勤劳节俭，好学上进，讲道德修养，公平正直，讲礼仪、知廉耻，爱护劳动人民，是一个团结、互助的大家族。

高祖父入仕，追随左宗棠入清廷时的湘军任职。曾祖父的一生都以教书为业，只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后，很短时间进入过政界（不足一年时间），他的一生，赢得当年执政当局的认可和赞誉，离世后葬礼隆重，尽享哀荣。祖父辛亥革命后，进入过政界任职

几年，而后半生有 20 多年的时间是投身兴办教育。父辈中，我三个叔父都是教师，父亲一生从事地质技术工作，也任过几年教师。

我家自曾祖父入职长沙城南书院后，就定居长沙市。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 年武汉失守前夕，我刚出生不久，全家迁至宁乡乡间祖居。后“文夕”大火烧毁了长沙的房屋，八年抗日及三年内战时期，我们一直居住在宁乡乡间。

父亲 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38 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先在广西从事了几年地质专业的工作，后回到乡间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段时间乡间平静，家庭团聚。父亲热爱自己的专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父亲离开乡间去到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又回到了自己的专业。但接着又是三年的内战，父亲总盼望着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母亲一直是操持着家务，父亲在外时间多，他们虽聚少离多，但心灵相通，都是为了家庭的幸福而忙碌着。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孩提时代，在乡村的十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1949 年元旦后，父亲婉拒美国友人的邀请，不随他一同去美国。随后在南京已风雨飘摇的情况下，锡

矿山人心也浮动，他让我们离开了矿山，自己艰难地坚守在锡矿山钻探队。当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约是8月底，父亲原带队的锡矿山钻探队交予了当时进入矿山的解放军部队。

9月中旬父亲离开了锡矿山，集中到长沙的学习班，当年10月1日新政权成立，父亲结束学习后，11月安排在当年的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不久湖南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处第三地质调查所。随后父亲调往武汉中南区钻探总队，担任副总队长。

父亲满腔热忱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多年来的战乱已结束，他认为全力投入自己的专业工作的时期来到了，他从未想到他对国家的忠诚，对专业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会使自己在1952年被莫明的诬陷。他更未料到，随之1957的“反右”更是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56年父亲已调去西北地质局工作，1957年他是甘肃省地质局的钻探工程师。错划为“右派”后，1958年遣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去劳教。当时宣扬的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去后不到三年，就在饥饿和劳累中去世。父亲及家庭的遭遇，是留在我内心深处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痛。

最使我遗憾的是父亲的一生，我了解得也并不详细，因为他在家时间不多，即是在家，也很少向我谈及他的工作及经历。尤其是 1958 年被遣送夹边沟之后的一切，我一无所知，我无法具体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我只能从现今所披露的有关夹边沟当年的惨景中去揣度，今年 12 月是父亲诞辰 100 周年；冤逝 52 周年。祖父诞辰 126 周年；曾祖父诞辰 150 周年；高祖父诞生 187 周年。母亲诞辰 98 周年，逝世 46 周年。在此文中只是写下我内心的感慨和思念，并启示我的后辈，对一个家学渊源的传统家庭，几代人境遇迥异的沧桑经历有些了解，尤其是使他们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迁，带给家庭的影响稍有些印象。

# 第一篇 家学渊源

## ——几代人境遇迥异

### （一）着清廷朝服的高祖父

我儿时在外婆家居住时见过着清朝官服的一张画相，我当时并不介意，只隐约听见外婆曾说过：她的祖父和伯父都担任过清朝官职。我母亲说：那张着清庭朝服的画像是我外婆的祖父，因外婆与我祖父是嫡亲堂姐弟，（共祖父）按血缘辈份，那画中人就是我的高祖父了。

名为道东的高祖父，后人称呼他为楚才公。王楚才公生于清道光五年（1825 年），后入读位于长沙市的湘水校经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入仕。咸丰三年（1853 年）曾国藩奉旨委任郭嵩焘赴宁乡等地劝捐筹饷，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招募团练（湘勇），楚才公全力相助。咸丰四年，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府，深得重用。左宗棠早年（1830 年）曾入长沙城南书院，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也算是楚才公师兄。他仰慕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胸怀大志的名言，楚才公与左宗棠在骆秉章府相识。

咸丰十年（1860 年）入左部任职，一直追随左宗棠转战浙江、福建等地。1867 年又随左公入陕甘、新疆，直至光绪三年（1878 年）收复新疆和田。屯垦戍边，功勋卓著。曾有杨昌浚《恭颂左公西行甘棠》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我的高祖父王楚才公就是湖湘子弟中重要的一员。为表彰其功绩，清廷委任王楚才新疆要职，其宁乡老家之府邸，御赐名为“保民堂”，可能取保国安民之意吧。以后楚才公后人称此寓所为“王家老屋”。楚才公在赴新疆上任途中遇害重伤，去世于甘肃省兰州市，后皇葬于宁乡县城木井河。1950 年之后因县城扩容，原墓地已拆，因后人无人知晓，改葬何处？已不知情。

楚才公娶太学士吴湘臣之女为妻。（太学士非官位，是国子监人员职称，相当现在的研究员）生有五子（晋臣、元臣、甫臣、耿臣，泽臣）。其长子晋臣、次子元臣均任职于左宗棠部，元臣去世后享有奉政大夫级墓碑。以后“王家老屋”就由楚才公的次子元臣、三子甫臣继承，随后兄弟俩又加以扩建，以后即为其兄弟二人的后人居住。甫臣有两子一女（长子赞勋我称呼三伯祖父；次子颂华我称呼四伯祖父；一女即是我的外婆）。元臣无子

裔，将甫臣次子颂华过继于他。我儿时也常去玩耍，我未见过曾祖辈元臣及甫臣，我出生时，他们早已辞世。但常见居住在此的祖辈三伯祖父母及四伯祖父母，还有父辈的几位伯父伯母。这些长辈对我十分关爱，在这里我虽不能一一表述，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老屋同辈的堂兄姐们对我也很爱护，经历了几十年艰辛岁月，我们都是年过七旬或八旬以上的老人了，从高祖父楚才公到我辈，虽已是第五代，但仍很珍惜同根的血缘亲情，因而现在我与分散在全国几处、尚健在的堂兄弟姐妹们还常联系。

我回想起当年的老屋：依山傍水，后山竹林茂密，树木参天。前门围墙外是一池塘，池岸道路两旁，一侧垂柳依依，一侧为高大树木，形成了一条林荫道。每当微风吹拂，岸边柳枝摇曳，水池里清沏的水面泛起微微涟漪，那一幅自然的美丽景色已深印在我脑海之中。2002年，相隔半个多世纪，应堂兄之邀，我在老伴和儿子的陪同下，返回老家探亲，见到原址已面目全非。堂兄告之该寓所的经历：1950年之后成了新政权的胜利果实，土改后搬入该寓所的几家住户却将屋内能换钱的家什变卖一空，尤其1959至1961年翻了身的农民，也同样贫穷饥饿，有的住户将楼板及天

花板也拆下卖掉，换取食物果腹，房屋已满目疮痍，不堪入目。有的住户还将所分房屋易主或拆卸，最后仅留下一花厅和三间小房。池边道路上树木及屋后山林也砍伐已尽，池塘接近干涸。1980年，社会环境有所改变，我的一位堂兄见仍住在老屋的住户因家境万分拮据，又想将残存的这几间房拆楼板出卖时，便花费贰千元买下了余下的这几间老房，也算是老屋留下的遗迹了。

## （二）誉满杏坛的曾祖父

我的曾祖父名王泽臣，是楚才公最小的儿子，出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少时入湘水校经堂就读，后未入仕途，先在宁乡一私塾任教。1887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任职（城南书院内）。并在长沙南门距天心阁不远处，原称为钱司井的街区购有一处住宅，定居在此。

王泽臣公任职的湘水校经堂属岳麓书院讲堂。是清道光11年（1831年）巡抚吴荣先创立，原在岳麓书院内。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迁至长沙城南天心阁附近的原城南书院旧址。岳麓书院是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1008年至1017年进入北宋鼎盛时期。1015年宋真宗为其题写了“岳麓

书院”四字，至今书院内所存明代石刻“岳麓书院”便是当年宋真宗手迹。宋代起有不少名人均与岳麓书院有关联。如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郭嵩焘（第一位外交大使）、熊希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原就读于湘水校经堂。还有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宋教仁、蒋翊武及民国政府的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因而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 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现大门上悬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气势磅礴。

我曾祖父王泽臣公教过的学生，辛亥革命时期，有不少人都加入了革命组织，泽臣公也积极支持革命人士的活动。武昌首义成功后，有人还成为民国政府要员。泽臣公 1912 年受辛亥革命有关人士邀约去到武昌黎元洪府任职。因我曾祖父不适应士途之职，任职时间很短。1913 年黎元洪赴北京任副总统职之前，我曾祖父就离职回长沙了，仍返回岳麓书院，直至 1926 年卸职归养。

曾祖父有过两次婚姻。原配李氏曾祖母生育了两个儿子，即我的祖父（王子濂）和叔祖父（王子闽）。在我祖父四岁时（1890 年），原配曾祖母病逝。1893

年续弦卢氏曾祖母，卢氏曾祖母娘家离我家祖居很近，彼此熟悉。她少女时生过一场病影响成年后的生育，因而年近三十尚未出阁。曾祖父看重她为人厚道，善于理家。婚后不久，曾祖父要返回长沙任教，曾祖母却不愿随往，要留乡间照料祖产及娘家老人。曾祖父就带着尚年幼的长子——我的祖父王子濂，于 1894 年春返回了长沙。而我叔祖父王子闾出生不久就已过继曾祖父的兄长王耿臣抚养。其后曾祖父也只是一年中回乡一两次，而继曾祖母就留守在一所名为烈武湾的祖居，这所祖居是我曾祖父与他长兄王晋臣共同继承的楚才公遗产。继曾祖母因未生育，一直是雇请保姆陪伴，最后是一位杨姓保姆陪伴她将近十年，直至 1943 年 6 月寿终。

1935 年，已七十二岁的曾祖父，身体日渐衰弱，疾病缠身，仅是保姆已很难照料。已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我父亲暑假回家就与我母亲成了亲，从此曾祖父就由我母亲照料。半年之后，1935 年底，曾祖父在长沙去世，享年不足七十三岁。

据我母亲说：曾祖父性格随和，生活十分节俭。晚年理发既不去理发店，也不请理发师，就是自己拿着剃刀，对着镜子刮成光头。按老人家的说法是：“稀

**稀疏疏的几根头毛，花钱找人剃，不值”。**他的衣服很旧，内衣内裤补了又补，说旧衣服软和贴身，穿着舒服。洗脸水及清洗衣服的水均不能随手倒掉，而是积储在天井旁边一缸内，雨水也尽量收集起来，用来擦拭家俱及拖地板，或洗刷痰盂和便桶。我家在长沙的住房也只是几间很普通的平房。但是对困难的友人却慷慨解囊，因而在亲朋旧友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曾祖父病重后，曾留下遗言：病逝后丧事从简，不再花钱在长沙购置墓地，遗体送回宁乡老家与原配合葬，将来继室寿终时，如她本人愿意，也安葬在一处，三人就团聚了。他老人家总感觉与继室曾祖母几十年的夫妻，各守一方，团聚时间少，自感有愧。但去世后，亲友们闻信，纷纷赶来，我祖父却无法回避亲朋好友对曾祖父发自内心的悼念之情。在长沙就先有一场隆重的祭奠仪式，有不少湘居的辛亥革命元老、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也有要员参予了悼念。悼念者所送挽联挽幛难以计数，其内容多为师生情谊。后灵柩归葬宁乡时，走水路由湘江到达宁乡距祖居不远的名为大成桥的小镇，沿途路祭者也人数众多。据我母亲说：我家用一艘民船装满白色印有曾祖父逝世纪念字样的较大浴巾回赠，其数量也不少，可见曾祖

父的门生好友人数之多。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曾用挽幛中布料较好的缝制有枕头芯套，白色的棉布上书有“王公泽臣大人千古”字样，几件枕头芯套母亲一直保存了很久。1960年我结婚后，母亲随我居住时，我丈夫在我母亲房中还见到过，他当时还询问“王泽臣”是哪位老人。

曾祖父过世时，我尚未出生。我只见过挂在宁乡祖居烈武湾厅堂中他的照片，穿着一身湖南人常着的中式胸前对扣的黑布衣服，神态慈祥。他的墓冢离祖居很近，站在祖居的前门就可望见。它不是在山上，而是在一处高出周围稻田的土坡上。墓地正前方坡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水清洌见底。水不深，约只有六十多厘米，但一年四季不会干涸，可看到不少小鱼在溪里的水草间游弋。墓冢两侧及墓后均种有扇形树叶的棕榈树。原配曾祖母早年先葬在这里，1943年继室曾祖母去世也葬在此处，因而就是一座三人合葬墓。我儿时在乡间，常去看邻居小伙伴在小溪里抓鱼玩耍，或与小伙伴们坐在棕榈树下玩农村孩子常玩的一种掷石子的游戏，因此对墓冢及周围的环境记忆深刻。这座墓冢很简单，只是树立了一块石碑，墓碑中间书写着“显考王公泽臣大人之墓”。左右两侧是俩位曾祖母

名号“显妣李氏夫人，显妣卢氏夫人”。此外还有几位老人的生辰和去世年月及立此碑的后人名字。墓冢没有用诸如石材及其他材质进行修整，全是土质的。

1948 年初之前，我母亲还居住在家乡时，每年请人去给墓冢除草培土，曾祖父母的生辰及忌日、清明节中元节及春节等传统节日均去祭奠。1948 年春我母亲带我们离乡后，尤其是 1949 年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没有人去过问了。2002 年我回去老家时，堂兄告诉我：烈武湾祖居已完全拆掉，原址已是一片田地。曾祖父的墓冢先后被盗过三次，棺槨被毁，尸骨无存，墓冢也推平了，而盗墓者一无所获。曾祖父一生节俭，墓内根本就无随葬品。烈武湾祖居周围环境已变，我因腿疾，行动也极不方便，加之在乡间度留时间很短，就未去到我居住过的祖居原址了。几十年来，世事沧桑，生者坎坷，逝者虽已几十年长眠地下，还不得安宁，还遭挖掘，尸骨暴露丢弃，实在令人感叹。

### （三）热心兴学的祖父

祖父名王子濂，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五，因而号“立五”，也称“立吾”。生于清光绪 12 年（1886 年）

农历 11 月 22 日。他不满五岁，生母去世。1894 年就随他的父亲（我曾祖父）去到长沙，在他父亲照料下开始读书。祖父 15 岁时，约是 1901 年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童生试。我曾听我母亲说过一则关于我祖父另有一个名号来历的趣事：科举考试后发榜前，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录取榜文中有《今年宁乡县案首“王禄”》。他便问他堂兄、我三伯祖父，“这会是谁”？因为他们兄弟俩都参加这次考试。三伯祖父回答：“应该是我”。后来兄弟俩都荣登榜上，祖父名列榜首，堂兄弟俩为同科秀才。从此族人中就调侃祖父，总叫他王禄，于是我祖父就有了这个不算正式的别名。

此次县童生试过后，1902 年及 1903 年，清廷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及后的修改版，史称《壬寅学制》及《癸卯学制》，随后科举考试取消，1903 年 17 岁的祖父也就进了新式的湖南高等学堂。随即辛亥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因不少辛亥革命元老为湘籍人士，我祖父自然也受到影响，曾祖父也很支持。他们虽没有直接加入其中，但对所认识的革命志士同仁也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911 年武昌首义成功后，有一段时间祖父曾去到江西原万安吉水（后统称为吉安市）等地任过县长。何时去的，具体时间我母亲也不清楚，

只知道 1921 年底就辞职回到了长沙。后在湖南高等法院任过两年推事。

1924 年后，就先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三所学校：一所小学称为“群英小学”；一所完全中学称为“建国中学”（1931 年开办，原校址在长沙福星街，初始为私立法政学校）；还有一所女子职业学校称为“衡粹女校”，他是学校董事会成员之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群英小学”停办。1938 年日军入侵武汉，就考虑另两所学校搬迁或停办之事，董事会决定女子职校也停办，“建国中学”迁往安化县一处称为桥头河的小镇（现为涟源四中）。

随着战争时局的紧张，我家老小在 1938 年 5 月即搬回宁乡乡间祖居。1938 年长沙大火，因 11 月 12 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即为“夕”，所以这场火灾史称为“文夕大火”。我家在长沙的房屋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因为安化县离宁乡祖居有一段距离，战乱时期，祖父已不方便前往参予工作，以后就仅是学校的股东而已。祖父名下的王姓近亲如去建国中学求学，可照顾一人免收学杂费用，我的堂兄中有一人得到过这一优惠（1950 年以前）。祖父名下的子侄有求职者，并符

合任职条件，也可安排一人任职。我的小叔父 1947 年从湖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去到该校当了一名教师。

祖父回乡不久，约是 1940 年，应当地乡绅之邀，在乡间又开办了“群英小学”，但祖父不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而办学的资金大多是他投入。因资金和校舍有限，此小学只有初小，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就近招聘教师和招收学生。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的印象里该校的学生不限年龄，有十七十八岁的青年小伙，也有十五十六岁的姑娘。祖父的目的是想让农村年轻人都能认识些字，减少年轻一代中的文盲。对家庭贫困的学生不收费用。我约不足六岁（1944 年春）也成了该校当时年龄最小的学生，与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相比，我是不算认真的学生，我在该校读了两年，就算完成了初小课程。

祖父在开办群英小学不久，又受聘在当地一所完全小学（当时称涌泉乡中心小学）任过一段时间校长。这座完小的校舍是一座关帝庙，庙内还香火鼎盛，尤其是每月初一及十五更是朝拜者人流如潮，常常是钟鼓齐鸣，鞭炮震耳，学生们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学习。祖父想了很多办法，因房舍难找，当时的政府也无钱建校舍，只好将初小一至三年级，另找附近称为

陈家湾的民房内安置。初小四年级和高小学生年龄较大，自控能力较强，还留在庙内。搬走部分初小学生之后，腾出的房间也就解决了离家较远的高年级学生及教师需住宿的问题。我祖父有时也住校，他的房间很小，这间房是走廊尽头隔出的。放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单人床板，紧靠床是一张很小的学生课桌，就已挤满了。进出房间的门因太靠近床，人进出时也只能开至百分之八十，不能全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祖父忙于处理我家原在长沙的地产之事，另外祖父也还是建国中学的股东，间或也需联系，约是1946年初辞去了涌泉中心小学校长职务。我1947年初也去到这所小学读了一年高小五年级，也住宿在学校，祖父在该校住宿过的那间房舍我见过，面貌依旧。

约是1948年底，祖父已年过六旬，就不想再操劳办学之事，群英小学交予了当时的地方转为保办小学（当时基层是保甲制）。1950年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私立学校逐步转为公办，约是1952年建国中学就成了公办中学。祖父早在1950年初已与建国中学没有了关系。

祖父的为人是很宽厚的，他后半生都是从事教育。他一生并无多少积蓄，长沙大火所烧毁的房子，抗日

战争胜利之后，祖父也没有重建，将地产卖掉之后，收入又投入了办学基金。原乡间继承的祖产，原是由继曾祖母管理。继曾祖母 1943 年去世后，就由继祖母接管。祖父只忙他的办学工作，基本不管家事。1938 年回乡至 1949 年新政权建立，这将近十一年间，祖父在乡间办学，扶贫济困得到了乡邻的认可和好评。

1951 年底，乡间开始土地改革，因为有土地出租，收租谷，划成分时不可能不划为地主。土改工作人员对我祖父身份的定位也有些为难。当时新成立的宁乡县政府领导层中有祖父救助过的学生，原在建国中学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过我祖父的庇护和经济上的帮助。按当时情况，地主肯定是要划的，土地房屋也是要分的。后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继祖母是掌家的地主，批斗从严，而祖父则得了一顶开明地主的贵冠，从轻批评教育，俩老人搬出了原住房，安排在一处较简陋的小屋居住。祖母不能随便行动，有受管制的意味。但祖父可以自由行动，且有动员他离开乡间去我父亲处生活的建议。祖父不愿丢下老伴一人在乡间，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1956 年底，继祖母去世，1957 年初，祖父才由我父亲接到甘肃省兰州市，离开了居住将近二十年的宁乡老家。

祖父的一生命运多舛。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遭遇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尤其是 1951 年之后的晚年，我的父辈接二连三的遭遇，甚至不应该的早逝，给祖父的打击是致命的，最后导致祖父自缢身亡。

祖父在江西任职时，原配李氏祖母已有了四个孩子，前三个是男孩，第四胎是女孩，这是祖母十分盼望的，总算是如愿了，祖母十分高兴。我这位姑姑取名吉媛，包含两重意义：一是出生于江西吉安；二是祝愿她一生吉祥。可是姑姑出生后就发现哭声不对，对周围动静没有反应，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先天性聋哑，这对祖母是一个无情地打击，产后心情郁闷，身体受到了很大影响。身处他乡，总有不便，于是我祖父于 1921 年就辞职返回了长沙。祖母仍然想要一个健康的女孩，回长沙后不久祖母又怀孕了，1923 年，生下了我的小叔，又是一个男孩，未能如愿，心情仍然不好，加之操劳五个孩子，家事也繁重，不久就得病去世了。

祖母留有一张约八寸大小、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单人照片，上身着半袖前襟绣花的短衣，下着百折长裙，此照片挂在烈武湾祖居一花厅的墙壁上，面部表情庄重。我母亲说：祖母性格要强内向，遇事总放在心上，

积郁积劳成疾，这也许是她早逝的原因。祖母在长沙去世后，遗体也送回宁乡葬在距烈武湾祖居不远的一座小山上，约走十多分钟路程，我儿时母亲曾带着我去祭拜过几次，是简单得连墓碑也没有的一座土坟。

祖母去世后，丢下的四男一女五个孩子，我父亲是长子，当时也不足十三岁，小叔不足一岁。这个家庭上有年过花甲的我曾祖父，下有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我祖父真是为难了，只好匆忙续弦。1925 年底，祖父娶年近三十的曾氏祖母，继祖母过门后，面对这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也难为她了，家庭矛盾难以调和，祖父只好在长沙北门另购住宅，继祖母另住。而我父亲及弟妹们与我曾祖父住在一处，就只能请保姆照料了。继祖母婚后第二年生育了一个女孩。祖父两边都需兼顾，还要工作，其劳累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尽力而为，但也总难免有力不从心之处，因而我的几个叔叔与继祖母之间造成了难以消除的隔阂。叔叔们自立之后，很少与继祖母往来，对祖父的照顾自然也少了。

1950 年至 1957 年，家中的变故更大，最初是小姑与小叔的亡故，对祖父心身的伤害已是难以描述。而健在的三个儿子他更是担心。三叔疾病缠身，收入微薄，在乡间学校工作，也承受着不少压力，四叔已

好多年无音信，生死不明。我父亲当时也不轻松，1952年“三反”运动中也短时间受到冲击，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事上的复杂，乡间家中所发生的事，老人家就一人这样承受着，确实不易。

我1948年初离开宁乡老家后，直到1957年夏将近十年，只在1949年初回乡匆忙见过祖父一面，新政权建立后，我就没有回过乡间。由于客观原因，我与家乡的人也没有书信往来，祖父的情况仅是从他给我父亲次数不多且很简单的来信中略知一二。1950年后的几年，祖父闲居乡间，由于几年来经历了接连的丧女丧子之痛，且已年过七旬，祖父身体已很衰弱，双目已接近失明。1957年初父亲将祖父接到兰州后，在我母亲细心照料下，身体逐步好转，本应可安度晚年了。可是不久“反右”开始了，我父亲被划为“右派”。1958年4月底被遣送甘肃夹边沟农场劳教。祖父已多次受伤的心，再也承受不了这一打击，因为我父亲是他惟一的依靠，他觉得已无路可走了，因而导致祖父的自缢身亡。

#### （四）叔辈们的不幸

我的叔辈，即我父亲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只有哑姑可以说是正常病故，其他的几个一生也命运波

折，小叔与小姑都因人为因素先于祖父离世，给祖父的打击是难以言表的。

**聋哑姑姑病逝。**她名王吉媛。1938 年，我们回乡时，我父亲大学尚未毕业，随北京大学去了昆明，三叔与四叔也是大学生了，也是随校迁移，五叔尚读中学，随建国中学去了安化，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湖南大学法律系。叔叔们假期回家，是回烈武湾祖居，仍是我母亲照料。聋哑姑姑不能上学，就一直由我母亲照顾她的生活。祖父由长沙回乡后，也是另购住宅，和继祖母及小姑姑三人同住。聋哑姑姑虽先天残疾，但人很聪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今后考虑得很多了，因而沉闷不乐，忧郁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我祖父和我母亲虽四处求医，当时乡间也只有中医，凡是能请到的名医也都请了，但无力回天，1939 年刚满十八岁就病逝了。祖父对哑姑的病逝，总有些自责，认为与继祖母所生的小姑姑相比，没有得到过多少母爱，父爱也可能少些，因祖父没有多少时间与她相处，祖父心灵上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哑姑去世后安葬在她生母坟墓的下方，两座土坟近在咫尺。

**小姑分娩难产去世。**继祖母所生的小姑姑，1926 年出生，名王瑞莲，又名满贞。从小继祖母对她特别

宠爱，不爱读书，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不大善女红，身材高挑，外貌一般，为人还是单纯善良的。但有一个为当时社会对妙龄女性来说，看不顺眼的习惯，即爱抽烟，捧着一个水烟壶，咕嘟咕嘟吞云吐雾。因而她的婚事艰难，高不成，低不就。我儿时乡间那几年，小姑有时也接我去她那儿玩，她对我也很好，记得有一年春节，过了元宵之后，她带我去到她的外婆曾家住了几天。她的几个舅舅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富的房舍宽敞，家中有男女仆人，她的表兄们有的在当地政府机关任职，生活气派。穷的则房舍低矮简陋，生活拮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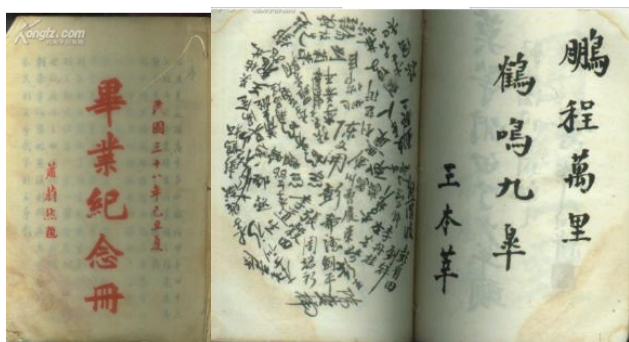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在土改前夕，社会形势的改变，小姑匆忙嫁给了她外婆家一位已年过不惑、且家境贫寒、但为人憨厚的表兄。她这位表兄，那次我去她大舅家见过，家境确实贫寒。小姑1951年分娩难产，在旧社会贫困的这位表兄，新社会翻身了，可仍然贫困。好不容易凑合成了家，人过中年即将有后，本是一件喜事，却眼看妻子孩子都不能保，却束手无策。自己无钱，老丈人家已一无所有，阶级兄弟也无力帮手。最后是孩子未产出，大人孩子一起死亡，喜事变成了悲剧。我祖父眼睁睁又送走了他的小女儿。

**小叔冤逝。**我的小叔叔，名王本莘，1923年生。我父母成亲时，他尚未成年，他的生活一直是由我母亲照料，直到他结婚成家。我儿时与小叔叔很亲密，只要他在家，总是带着我玩，如去钓鱼，抓蟋蟀。记得我读小学时，还带我去与他拍过一张合影，我是搂着他的脖子照的。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已无踪迹，可能是1948年离开老家时没有带出。小叔叔大学尚未毕业就结婚了，我记得是1945年初。小婶名张琼仙，是我母亲娘家的堂妹。

小叔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建国中学任教，生活是很顺利的。约是1952年（当时建国中学已收为公立）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原因可能他是民国政府时期学法律的，且大学毕业前在湖南高等法院实习过，在当年某些无知的当权者想当然地认为：在旧社会搞法律的人，历史会没有问题？在那些随心所欲的年代，因私怨嫉妒或为凑够上级下达的指标，就胡乱对某人进行审查之事，举不胜举。小叔他想不通，在审查期间自尽了。这件事，对祖父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小叔冤逝后，小婶被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建国中学回到宁乡老家，原祖居已无她母子的安身之处，还是好心的邻居让一间草屋让母子三人栖身，生活靠好心人

施舍度日。接踵而来的是不久小婶又病故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男孩不满七岁，小的女孩约四岁，这个小妹妹出生不久，我们就离开家乡了，因而我没太多印象。这时的祖父已年老力衰，且手中拮据，不可能照顾到孙辈。据说有一小段时间两个孩子就白天沿户乞讨，晚上就在稻草堆里安身。

小叔结婚不久，就另起炉灶，但还是与我们同住在烈武湾祖居。1945 年底小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支明”，对祖父来说，是一件喜事。因为我父亲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女孩。三叔虽然也有了一个男孩，但三叔已过继，按乡间传统习俗，其子已不属我祖父直系。四叔当时离家无音信。小叔这个儿子就是我祖父的第一个男性孙辈了。



以上是小叔父王本莘在建国中学任教时 1949 年  
那一届高中学生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里，株连现象丛生，动辄上升

到阶级立场，思想觉悟，三亲不认，六戚不念，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才能保全自己的情况下，祖父不想让我父亲过问家中之事，以免惹事上身，因而当初一切瞒着我父亲。后来女孩是原住烈武湾祖居的一左姓邻居收留，儿子支明则由祖居近旁与我祖父熟悉的、一位木匠师傅好心收为徒弟。两个孩子总算有了安身之处。也说明了祖父一贯的为人，乡邻们才会顶住当时社会压力以善报善。

1978 年小叔原单位也认为当年对小叔审查是错误的，但又认为仅是审查，并未作什么结论，无反可平，死亡属自杀，也不可能有经济上的赔付，最后据说是给了小叔的两个孩子共 200 元钱，这钱是根据什么文件那个条令发给，就不得而知了。

**四叔的遭遇。**四叔名王本芑，毕业于唐山工学院。约是在 1942 年底回过一次家，并带回一个比我小叔小几岁的名周志诚的小伙子，说小周是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与家人失散，祖父只得收留了小周当自家儿子对待。而四叔则于 1943 年初又离家了，且一去就无音信。约是 1953 年初，我父亲才知道小叔已屈死。为能给祖父一些安慰，冒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下决心寻找四叔，根据 1943 年他离家时留下的些微线索，父亲认为他在

贵州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即与当时的贵州地质部门的同行联系，请他们帮忙。并在当时的《长江日报》登出寻亲启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有了回音。四叔终于给我父亲来信了，他在贵州毕节师范任教，大致向我父亲谈到了 1943 以后的经历，他一直单身，并未成家。他答应给祖父去信，已过 10 年没有音信的儿子有了消息，也算是给了祖父莫大的安慰。从 1953 年至 1956 年，这几年我父亲和四叔一直是书信联系着。祖父这几年生活也算平静。我 1955 年考上大学时，四叔还给我汇款，表示奖励。

可是好景不长，1956 年春节，四叔的一位女学生被毕节专署一位头头相中，此人已年过不惑，遗弃农村原配，强娶这位年方二十的姑娘。我四叔看不惯，找这位干部理论。四叔所教班的学生也一致支持。其结果是这位头头指责我四叔鼓动学生闹事，上纲上线，认定为反政府，反对党的领导，逮捕法办，四叔被判了十年徒刑。1956 年暑期我回到兰州时，看到了毕节法院寄来的对四叔的判决书。不久四叔的学生给我父亲寄来了信，详谈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父亲又能如何呢？拿石头打天？只能是对祖父隐瞒这件事，从此我们与四叔又失去了联系。

1979年，政治环境改变，我去信贵州毕节教育局询问，对方回信告之：我四叔已落实政策，推倒了过去的判决，宣布四叔无罪。已调至黔西县教育局，我才与他恢复了联系。不久得知他已患肺癌，且已是晚期，入住在贵阳医学院附院。我立即向单位请假赶往贵阳看望他，叔侄相见，我无法表述我们当时的情感。几十年家事沧桑，从何谈起？我只能让热泪流淌。四叔注视着我，我五岁时他离家，相距已三十六年之久，我从孩童已过不惑，四叔从青年已至花甲。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四目相对，长时间无语。随后在交谈中他告之：他1966年5月刑满后留在农场的一所学校教书。留场后曾给我父亲原工作的单位甘肃地质局去过信，结果是原信退回，信封上注明“查无此人，退回原处”。四叔认为我也早应大学毕业离校了。经历了十年，乡间的祖父是否健在？四叔已不知如何与亲人们联系，只得作罢。

不久又“文革”运动开始了，他只好谨慎为人，也不敢结婚成家，怕万一有变，联累他人，幸运的是他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农场职工对他还算照顾，因为他单身一人，有些生活中的锁事，家属们还主动帮他料理。

1978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调至黔西中学，不久又调至黔西县教育局教研室。黔西中学有不少学生及家长对他也很好，有人还张罗帮他成家，可不幸他又病倒了。他在贵阳住院期间，是学生家长主动轮流照看护理。时光荏苒，四叔1956年以前所教过的学生，大多已过不惑之年，有的在贵州省市部门已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对四叔仍有深厚的师生情谊，因而想方设法积极为他治疗，但已病重，无法医治。

我在贵阳呆了五天，是住宿在贵州省统计局一位处长家，这位处长就是四叔教过的学生。四叔的其他学生和家長，听说我去到了贵阳，非常热情地来看望我，他们用车并陪同我去了一趟黔西县，看看四叔工作过的黔西中学及县教育局，也看了四叔住的宿舍。黔西中学的校领导及师生们视我如同亲人，的确使我感动。我在黔西住了一宿，也是住在四叔的一位老学生家，他当时是黔西县政府的干部。

我也是南宁市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而且我任课的班级是高中毕业班，当时已接近期末考试，我无法久留。原想回校安排期末考试之后，再赴贵阳陪伴。谁知我刚回到南宁的第三天，就接到噩耗，我因工作难以离开，无法立即再赴贵阳，参予后事的料理。

四叔生于1919年8月，1980年元月29日去世，终年为六十周岁，正好满一个甲子。四叔的丧事，据他的学生来信告之：遗体运回了黔西，悼念仪式隆重，不是火葬，而是土葬，棺槨材质上乘，墓冢立有墓碑，四叔的后事，能有如此隆重，我想与他那些有一定职务的学生有关。悼念安葬及以后立碑过程，墓冢形状等，他的学生都陆续拍有照片寄来，我一直珍藏着。

四叔的一生，虽然也坎坷艰辛，也没有品尝过婚姻和家庭的温馨，但总算熬过了那些荒唐无情的岁月。他活到了六十岁，兄弟四人相比，他的寿命较长，去世后又有一个隆重的葬礼，一座较好的墓冢，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好的结局了。我与四叔的几位学生的联系，也延续了好几年，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住址的变迁，也就逐步失去了联系。

三叔“文革”中遭批斗自尽。关于三叔，我印象不深，他名王本范，1942年结婚成家就分灶另立门户，三婶是继曾祖母娘家侄孙女，名卢君莲。他俩婚后一小段时间，也居住在祖居烈武湾。因三叔已过继给家族中一无后的祖辈，1943年6月继曾祖母去世后不久，三叔一家就搬迁去继承此祖辈的产业。因住处相距有一段路程，我们未离乡前，来往也不多，我就很少见

他了。1948年我们离乡后，也没有信件往来。关于他们一家的情况，1957年前只是从祖父给我父亲的信中有时很简单的提到，三叔身体从小就较弱，1950年后生活也很艰难。

我直到1980年与一直居住在宁乡的堂兄取得联系之后，才知道三叔在1966年“文革”后也遭批斗，据说是投水自尽，具体时间不详。祖父此时早已过世，否则又是一次挖心的打击。三婶现在还健在，我的上一辈在世的只有她一人了。2002年我回乡时去看望了她，送给她一点广西产的荔枝干桂元肉及少许现金。她当时虽已年近八旬，身体瘦小，但还很健旺，连说：“记得你，记得你，难得回来，多住一阵吧……”。我离开时，她抱着一只母鸡对我说：家中实在没有别的可给我，这只鸡一定要送给我。我只好委婉地对她说，回广西路途远，鸡是不好带走的，我心领了。我看到她那难舍难分的表情，的确很心酸。

关于四叔领回的周姓小伙，我本不想着笔，但他在我家生活了六年多，我祖父对他如同亲子，我父辈对他如同小弟。他原本是与家人失散而流落街头乞讨的孤儿，来我家后供他读完中学，也长大成人了。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他提出要返江西寻找家人，我父

亲给了他一笔钱，随后他来过一信，没有找到家人，他考入了江西农学院。以后几年不曾联系过，在那人以阶级划分的年代，也能理解。中南行政区刚成立时，我父亲任中南重工业部钻探总队副总队长职，小周从何处知晓我父亲情况，我不清楚。1953年，他毕业分配，工作单位在较偏僻地区，他不想去，跑到武汉找我父亲，我父亲确实无法帮忙，他悻悻而去，从此再无来往。我不想去猜测他对在我家生活的这几年如何看待，但我认为祖父和我的父辈助人的精神，应该是肯定的。

## （五）永远抹不掉的伤痛

### （1）“三反”时的阴谋诬陷（1952年3月至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后的1949年11月底，父亲作为留用的高级技术人员，安排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当时该所共有24名技术人员和职工，其中专业地质技术人员13人，所长是田奇镌，他早年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我家在长沙住定后，一家团聚，生活安定，父亲心情舒畅，邻居李教授家小弟很可爱，父亲在家时总喜欢逗他玩。当时我妹妹已九岁，父亲的确想再要一个孩子。李教授与我父亲是高中同学，知道我父亲的

心事后，就告之我父亲，他们原在省一中有一位也是姓李的同学，是留学美国学医的，也是1945年回国，现在长沙天主堂医院任院长。建议我父亲带我母亲去看看，查查不孕的原因。父亲找到李院长，他很热情，给我母亲进行了全面仔细的体检，确实妇科方面有点小毛病，于是就进行了对症的治疗，母亲自感治疗是有了些效果。

1950年5月在汉口召开了有关中南区资源勘测的会议，随后田所长调往武汉任资源勘测处处长，并拟定将成立中南区钻探总队，我父亲也参加了会议。不久资源勘测处钻探总队即成立，负责人是一名总队长、两名副总队长，父亲是副总队长之一。当时武汉是中南行政区的政治中心，因此父亲在1950年10月底就前往武汉市开始参予钻探总队的组建。父母又两地分居了一段时间，至1951年4月底，母亲才迁到武昌。约是当年八月母亲终于有了身孕，父母亲喜悦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1952年初，正当我家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一个新的生命降生时，却是一桩劫难来临了。

事情的原由是父亲在组建钻探总队时，为购置钻机与正职总队长发生过分歧。父亲认为原美产机器还可用，不必全部弃用而购置苏式新设备，以免造成资

金和物资上的损失和浪费。再者，工人已习惯原机器，一时全部换成新机型，操作技术也难以跟上，需要时间来培训，多少会对工作有影响。当时有不少由部队转业下来的军人，安排到各钻探队，这些人普遍文化水平都较低。父亲的意见是对这些人办文化学习班及对新机型操作的培训，一段时间后再新老交换，新工人用新机型，换老工人下来再培训，逐步淘汰老机器。

父亲提出办一所培训钻工的学校，学校不能办在武汉的市区，最好建在附近的矿山，最后选址在湖北大冶的铁山，很快就建起了简易的校舍，即宿舍、办公室等全部是平房，1951 年就开始培训司钻工人了。正校长是南下的干部，我父亲兼任副校长。

钻探总队的正总队长是部队转业的，曾听人谈论此人文化水平低，也不懂专业，但为人很跋扈。我不曾见过他，姓名虽听说过，但未用心去记它。他觉得拚着命打下了江山，现在进了城，还当上了领导，有了权就得用。他认为总队的事应该是由他说了算，为这事对父亲很不满，心中结下了疙瘩。这年春节刚过后，“三反运动”开始了，总队在开展运动时，对总队组建时的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全面的核查，这位总队长认为对付我父亲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对具体负责采购的

一位刘姓职员先下手，对他进行了各种威逼的手段，为他编造了供词，胁迫他认供，并将我父亲咬上了。从当年三月中旬开始，凭这捏造的伪证就将我父亲隔离审查了一月余。在审查期间受到残酷的逼供和批斗，使父亲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更令人气愤的是审查组到我家来抄查，在一目了然约二十平米的房间内，室内可数的两张门板床、一张三抽桌、一张小饭桌、一张小竹床、一张旧藤椅、几张小板凳、三只破旧的箱子。实在搜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就撬开破旧的地板，也仍一无所获，他们大失所望拂袖而去，房间内留下一片狼藉。这情景我只在描绘国民党残酷对待老百姓的影片中见过，想不到新中国也会有如此的行径，这次算是见识了，实难以忘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母亲只得艰难地收拾被撬起的地板，同屋住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就主动来帮忙，七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陈阿婆直骂是“缺德鬼，要遭报应的”。

父亲的不白之冤，也殃及到母亲和我们两姐妹，因父亲受审查期间，不发给工资，我们母女生活无着落，只能将暂未用的半新旧被面，和母亲以前穿过的较好的衣服拿去寄卖行典当，以换取生活费。母亲还

帮隔壁一卖菜的邻居推车去卖菜，好心的陈婆婆免收了我们的房租，有时我和妹妹放学回来时，母亲卖菜还未归，陈婆婆还喊我们到她家去吃饭。

审查组还三番五次到我的学校去，要我揭发我父亲，并威胁说：如不配合就开除我少先队队籍，各种威胁手段都用尽。我的班主任何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来说：“她还是一个孩子，经不起你们这样的折腾，适可而止吧”。后来听说教数学的黄老师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来时，我刚上完数学课，他们正好与黄老师相遇，黄老师对他们说：“据说你们是让孩子揭发经济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让一个孩子去揭发所谓经济问题，她能知道吗”？这两人狼狈地走了。有的同学在一旁起哄发笑，从此他们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学校了。我特别感激我的老师对我的爱护。

母亲因为担心父亲经受不起这冤屈，日夜思念，精神紧张，也因劳累，导至胎儿在腹中死亡而早产，是已发育成型的男婴。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约是四月中旬母亲当天做好晚饭，感觉身体有不适，勉强吃了几口饭，就说去躺一躺，让我和妹妹吃好饭就收拾好厨房，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在前面房里写作业，母亲在后间房内叫我，让我去找住地距我家不远的朱

伯母。朱伯母丈夫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比我父亲一届毕业的，当时也在中南重工业部地质所工作，我们两家交往比较密。朱伯母民国时期在一家教会医院当护士，不过已赋闲在家几年了，她稍年长过我母亲。朱伯母来后不久，就提着我家平时用的便桶（当时武汉的民房大都没有厕所）出去了，一会儿她返回来对我说：“你妈早产了，孩子太小已死了，现在也不可能告知你爸爸，近几天你们到我家去吃饭，让你妈妈好好的休息，你们的衣服要学会自己洗，放学回来好好照顾你妈妈。”父亲直到结束审查回来后，他才知晓这件事，对我父母的打击确实是很大。周围邻居也为母亲很惋惜，尤其后来知道父亲并无经济问题时，对制造事端的始作俑者都认为太可恶。

大约是四月的中旬，新调来不久的人事处李处长，对父亲审查一事，听到了一些尚未失去良知的人私下有议论，感觉事情很蹊跷，便找一些职工详细作了解。其实那位被威逼的刘采购也没有贪污，因为他与五金店老板是朋友，他当时正好要搬家，拆装家具需用螺丝刀钳子之类的小工具，老板送给他一只克丝钳及一个活动小板手，老刘当时认为这两件工具不是公款所购买，是朋友之间的交往，没有把它当回事，谁知那

位总队长煞费苦心，导演出了这一幕。李处长了解到了事情确切的起因，父亲之事完全是出于栽赃与陷害，借以报私怨。后经过核实，采购资金也是帐物两相符，就解除了对父亲的审查，并让我父亲回家休息了一个月，算是审错了的补偿。

刘采购也就“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看来罪魁祸首是两件小工具了。随后那位正总队长也调往他处。这就是 1952 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伤痛。现在我在《炎黄春秋》2012 年 11 期上，看到《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一文，文中详细地表述了当年运动中抓大小“老虎”（贪污犯）的数量一再的加码，甚至“要枪毙一万至几万”，“……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中南钻探总队某人正是子虚乌有胡乱编造出罪名，威逼刘采购，打出了我父亲这只假老虎。这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写照。

按我父亲的思维，可能也一直未能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当初为国家打算，使原设备物尽其用，节约资金，倒惹出了麻烦。另一位副总队长，也是专业技术人员，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比我父亲低两届，我想他应该知道谁是谁非，但他识时务，保持

沉默，而安然无恙。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的针对知识界及文艺界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一段时期父亲也感到很迷惘。“三反”之后，父亲愿意去基层钻探队工作，在机关的时间不多，他觉得基层的工人比较单纯，工作也能接触实际，心情较舒畅。

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知识份子心情更压抑，政治热情及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挫伤。新政权建立后几年来，各单位领导大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对知识份子的看法总认为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思想不纯，历史不清。有一种典型的说法是“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枪杆子虽可以打出新政权，但医治不了伤和病，还需有医术的医生。最高领导也曾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就需教授、教师。要搞现代化建设，就需科研技术人员。虽说当时各地相继有了工农速成中学，也保送了不少工农干部进入了各类高等院校，但培养还需时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图已确定，急需大量科技人才，远水难解近渴。

1956年元月中央召开了知识份子会议，作出一些针对当时知识份子心情压抑的情况，如何发挥知识份子的作用，提高待遇、关心生活等规定。当年四月又提出了双百方针，从当时的形势看，似乎前途一片光

明，又激起了不少知识份子的热情。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1952年所受的创伤，他又淡忘了，在他心中又燃起了实现抱负之火，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专长，他自愿去支援西北，1956年4月离开了中南地质局去到西安的西北地质局。

## (2) “反右”阳谋刻骨铭心(1957年6月至1958年4月)

父亲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西北，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他不会想到当时高层对知识份子政策的功利性。当时的西北地质局在西安，两个月后，1956年6月西北局迁至兰州市。1956年9月撤销大区局，各省建省局，父亲就属甘肃省地质局了。

我1956年7月暑期回到兰州时，当时的兰州风沙还较大，城市设施较差。地质局距火车站不远，当时局内是一幢角钢型的办公楼及一幢筒子楼职工宿舍，这两幢楼房是三层或是四层，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父母亲的住房在宿舍楼第二层最头的一间，住房约十二平方米，没有厨房，做饭就在筒子楼的走廊内，在住房门外放一小煤炉，房内设施也只有一张双人床及一张三抽桌。父母亲去西北时，妹妹还留在武汉市，住宿在学校。家中只有父母两人，一间房也够了，相

比邻居老小挤一间，应算不错了。

地质局院内还没有自来水，有一眼水井，打上来的井水有黄泥，一桶十公斤重的水可沉淀下约五公分厚的黄泥，不论是饮用、煮食、洗涤都需先沉淀过滤才能够使用，很麻烦。

我记得当年暑期，我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回国后，驻吉林省蛟河某部队工作的堂兄，从吉林到天津，随我一道去兰州看望我父母，我妹妹也从武汉回到了兰州。我们当时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从条件较好的武汉而来到西北，父亲则说：“**西北的矿藏丰富，将来的发展会很好的。我正当壮年，身体也好，还可好好地干点事。再说你姐妹俩几年以后也将相继走上工作岗位，一切都会很好的。**”记得父亲还和我谈到当年

（1956）1月我国首次向有成就的科学家颁发了1956年度科学奖，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荣获1956年国家科学一等奖。还谈到国务院已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他认为我1960年大学毕业时，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们当时看到父亲踌躇满志，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态，都为他高兴。当年在调西北之前，父亲也继1954年之后第二次评为地质部系统1955年度的先进工作者，但他因工作

离不开，没到北京去开会，会议的纪念品是他人替他带回的，据母亲说奖励是由六级工程师晋升为五级。但父亲自己却没有向我谈及。

兴致勃勃的父亲还带领我们去兰州有名的景区五泉山游玩，因为自己没有照相机，就让在景区摆摄影摊的摄影人员，拍摄了一张五人的全家照。过了几天，当我去领取照片时，却说照坏了。这时堂兄已离开兰州，而我也特别生气，我们一家四口也没有去补照。谁能料到，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照全家照了，这件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记得当年父亲还去到兰州女子中学，了解学生转学插班的情况，还想让妹妹从武汉转学来兰州，插班读高二，因妹妹本人不愿意，转学才作罢。如果当时真转学过来了，1958年高中毕业后，还真不好说会怎么样。

在兰州的第一年，父亲的工作和生活可能还正常。他是探矿处的工程师，他是自己单独的一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我没有进去过，只记得他办公室的窗口与家里房间窗口隔着院内的空地可望见。

有一次上午刚下班时间，乔姓处长来家找父亲，送来几份报刊说：他下午要出差，到我父亲办公室，

见已关了门，故将报刊送到家里来。我看到上面一份报纸有《参考消息》的字样，父亲接过报纸就返回了办公室，过一会就空手回来了。当时这一类的报刊不是放开阅读的，哪些人可以阅读，是有规定的。我父亲可以看，他也严格地遵守着规定，不在家里看，因为我母亲及我和妹妹都不应该看，所以马上就拿去了办公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当时还是受到信任的，党内干部对他并未另眼来看待，也看到了我父亲是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规定。

约是当年的年底，地质局建了两排干打垒平房，作家属宿舍用，有单间的，也有里外两间一套的，当时局里一般干部有一家老少三代，或夫妻及孩子数口，也只是分得一单间住房。而我家当时只有父母两人却得到一套里外两间的，与乔处长相邻。这也说明当时局方是按年初中央所说，对知识份子的生活待遇给予照顾吧，应该说父亲去到西北的第一年还是顺利的。

1956年10月东欧波兰及匈牙利等国发生了骚乱，中国高层受到了震撼。当年的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决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主张用小民主整风的方法，整顿党的作风。1957年3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鼓励

人们要大“放”，帮助党整风。接着召开了大大小小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一再申明：“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四月下旬，《人民日报》天天发表“放”的报导。接着全国都进入了鸣放高潮。

五月中旬形势突变，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风向突变，不少真心诚意帮党整风的无辜者纷纷落入了圈套，中了“阳谋”恶计。

据我母亲说：当年四月，我父亲出差在外基层勘探队，局里前几次的座谈会他没有参加，五月一日也未回家来。他给母亲的信中告之可能要五月下旬才能回到家，可是五月初父亲突然回来了，母亲感到很突然，父亲说局里通知有重要的会议，一定要他赶回来参加。父亲是一个政治敏锐力较差的人，一门心思放在专业工作上，对人一贯很坦诚，根本不会去揣测他人对他设下的陷阱，只看到报上热烈的“放”，今后的变化会如何？他是不可能想到的，加之看到局方的态

度很诚恳，在座谈会上就将自己心中的话吐露了，谁知就被抓住了把柄。现在看来，既是阳谋，上面早有布置，即所谓引蛇出洞，待风向一变，他就成了被批判的“右派”。

我七月初回到家时，批判我父亲的小会大会已经是一场接一场了，父亲当时在座谈会上说了些什么？批判他的是些什么问题，父亲回家来也闭口不言，我当时也不曾知晓。从 1956 年 4 月调至西安，6 月到兰州，至 1957 年 6 月仅一年时间，就从先进工作者变成反党的“右派”了。

自从父亲卷入这场“反右”运动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专业工作的权力，每天就是接受批判，写检查，没完没了。父亲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容易就范之人，他经不起对他人格的侮辱，约是七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时分，母亲叫醒我，说父亲一夜未归。我即起身去到办公室楼下，看到他办公室没有灯光，这时传达室的老人告诉我：他昨晚约是十点时见到我父亲出了大门，后来没回来？我不敢往下想了。一会儿局方知道了，严厉指责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并告诫我们回家，不准去找。我和母亲只得回家，也不敢让祖父知道，心急如焚，可又无奈。约是早晨七时左右，父亲回来

了，身上的衣服象被水浸湿过，还未干透，且有黄泥。祖父眼睛视力很差，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和我及妹妹三人已猜想到父亲想干什么了。我们望着父亲，禁不住热泪流淌。父亲说：他昨晚出去从雁滩已走下黄河，当水淹至胸前时，他想到了我们和祖父今后怎么办？为了我们他只能屈辱地生活着，挨到哪天算哪天，今后即是被斗死，也不自己去找死，没有亏心事，我为什么要违心地低头。想到这些，他便转身又走回到岸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走到一无人处，坐到天明。七月虽是盛夏，但兰州的天气，午夜至黎明时分，还是有凉意的，穿着湿衣服，在野外坐了几小时，我们担心他身体会受凉而生病，我们能说什么呢，好在父亲身体并未出毛病，我们才放心了，看到父亲的神态，相信父亲不会再有自杀的念头。

父亲的这一举动，更激起了毫无人性的局方领导层及积极分子们整人的升级，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由大院贴到了家门口，家门都被大字报封实了，但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尽是一些无聊的口号，如“王 XX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将对抗运动的王 XX 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如此等等，批斗会也越来越密，批斗会上口号声震天，不过当时情况与后来的

“文革”批斗会相比，积极分子们还仅是慷慨激昂地动口，几乎叫破嗓子，可能还没有动手，还没有剃阴阳头，或挂牌游街示众之类的动作。且并未离家关押，一般仍按下班时间回家，晚上也可能是白天积极分子们也辛苦了，晚上并不加班批斗，但全局已放下日常工作，集中人员对付我父亲一人。而我父亲倒坦然了，他也下了决心，再不自杀逃避，听其自然了。

这件事之后，地质局方有两人找我谈过一次话，一男一女，我不知他们尊姓大名，他们让我去办公室，我说不必，就站在离我家门约 20 米的大院中。首先他们问我是否团员，我说不是，那位女人马上反问：“为什么没入团”我说：“没想入”。她倒没有继续这一话题了。接着让我揭发父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我说：“我从 1950 年读初中开始，就大部分时间住校，假期在家，父亲有时还出差在外，与父亲见面的时间都不多，我高中快毕业准备确定读大学的专业时，征求父亲的意见，他还不知道我要高中毕业了，这也许与我没有按步就班读满六年中学有关，父亲连我读中学几年级都无暇过问，那有机会在我面前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外面有什么行动我就更不会看到了。毛主席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我不能无中生有，

胡乱编造，欺骗组织吧。我读大学后，父亲倒是给我写过几次信，但都是明信片，没几句话，如果你们认为有用，我回校后给你们寄来”。我的这些回答，他们也无无可奈何。

八月初我就离家返回学校，在离家的前夕，父亲只说让我放心，第二天临别之时，父亲半躺在旧藤椅上伸出右手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不能送你去车站了，一路上自己当心。**”我长到十九岁，这是父亲第一次和我这样慎重地握手，我望着他憔悴的眼神，我理解了他心里有不少话说不出来，我禁不住流泪，谁能料到这几句话却成了父亲与我决别的遗言，这次分别之后，不知道批斗到何时才结束。

后来父亲每月仍按时寄给我生活费，从他简短的信中，知道他已很少再接触业务，大多是打扫卫生及做其他杂事，等待对他的处理。当年寒假父亲写信让我去武汉看妹妹，不让我们回兰州，我想父亲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处境。

1958年4月底，父亲在给 my 的信中告之：他被遣送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其他如根据什么条令作如此处理，没有提及。并给我寄了最后一次生活费，只嘱咐我以后的费用母亲会有安排，但数额可能

会少一点，希望尽量节省一些，要安心学习。我 1957 年 8 月初告别父亲回校，以后直到他离世，我们再也未能见到面。

### (3) 良知泯灭的株连(1958 年 4 月至 1961 年 1 月)

父亲 1958 年 4 月遣送夹边沟时，他未意识到这将是他的不归之路，他以为仅是甘肃地质局领导丛健等人对他的短时间惩罚，最多一年也可能就回来了，可是甘肃地质局，没有一个如原中南地质局那样主持正义的李处长，只有不仅要整治他本人，还想斩草除根置家属于死地的丛健之流。

说到李处长，我也想写下他与我的一段谈话。1956 年地质系统撤消大区局，地质部成立了南方局、北方局。原中南地质局有部分人调到北京地质部南方局，李调南方局任人事司长。我家在武汉时，中南局有几位与父亲关系较密的技术人员，常到我家来，因此我与他们很熟悉。我每到北京都去位于右安门外原地质部宿舍去看望，李司长的家也在该宿舍，他的妻子我在武汉时见过面，是湖南人，当时她主动说是老乡，因此稍有点印象，于是我也认识了他。当李知道我是王本莢的女儿之后，对我很热情。1957 年寒假，我去

北京，他问到我父亲，当我告之父亲被划右派时，他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你父亲太耿直、坦率，政治敏锐感较差，一心放在专业上，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当时请调西北，我就挽留过他，可他执意要去。人生地不熟，周围人事关系如何？行事说话谨慎为上。现在全国的形势都如此，北京也不例外，部里情况也不乐观，我作为一人事干部也无能为力，最多只能做到不昧良心，不火上浇油，不落井下石。”

**扫地出门，逼亡祖父。**1958年4月父亲走后，家里祖父和母亲情况怎样？我一无所知。我正蒙然时，收到了母亲的信，让我以后给她写信时不再寄往地质局，而暂寄到一位在甘肃省建工局工作的姜姓亲戚收转。随后母亲较详细地告之：由于父亲不肯认错，可能激怒了当时地质局的四位头目（局长丛健、副局长李云龙、白智斌、高汉瑾），也许是因抗拒从严吧，将父亲按极右处理，却又说是“劳教”，不说是“劳改”，没有说开除公职。但当父亲离家去农场后，地质局几位毫无人性的头头，惟恐整人还不彻底，又将矛头指向我家年逾古稀、双目接近失明的祖父及身体单薄的母亲，威逼祖父和母亲必须搬出地质局宿舍，扫地出门。他们明知我祖父年迈，母亲没有工作，一时断了经济

来源，又无住处，难道不是存心将人逼上死路吗？可见，这些人是何等的残忍。总之，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领导的话就是法，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没有了栖身之处，又断了经济来源，该怎么办？正处绝境时，母亲去兰州后，每天外出买菜，与一位家距地质局宿舍不远处的大妈聊熟了。大妈原籍洛阳，老伴原是小生意人，已过世几年了，两个女儿已成家另住，她自家的几间干打垒平房，除出租了两间外，她自己还住了四间。交往多了，我母亲和她也就成了朋友。这位大妈知道了母亲的处境，很是同情，便腾出两间平房，让我母亲和祖父搬过去暂住，他们才未流落街头，有了安身之处。还是这位好心的大妈熟识一位甘肃省人民医院的女医生，女医生的孩子因嫖娼照料不好而摔伤了，大妈介绍我母亲去帮忙照料。医院宿舍离大妈家不远，母亲是早去晚归，母亲不在家时，这位热心的大妈就帮忙照看我祖父。

当年八月初的一天，大妈急急忙忙去找我母亲，说祖父出事了。父亲被遣送农场后，祖父受不住这打击，已有轻生的念头。因为 1952 年之后，祖父已接连失去了小叔和小姑，他们都不应早逝，老人的心灵已多次受到伤害，父亲是他惟一的依靠了。祖母于 1956

年去世后，在家乡只有三叔一家了，而三叔身体较弱，经济也较拮据，已无力照顾到祖父，且祖父双目几乎失明，1957年初父亲将祖父接到了兰州。现在他看到父亲被遣送到夹边沟音讯皆无，我母亲工作仅是临时帮帮忙，收入低微且又无保障，他不愿拖累我母亲，又不可能再回家乡去，更是加剧了离世的想法。一天早晨他趁我母亲外出做工时，便摸索着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遗言及四句心里话：“青山是处能埋骨，老死他乡不自哀。唯念儿孙居故国，扶筇时上望乡台。”就自缢身亡了。母亲含泪拖着瘦弱的身躯奔走料理了祖父的后事。祖父自缢而亡之事，母亲没有告诉父亲和我们姐妹，她一人忍受着痛苦。至此，本是一个尊老爱幼、子孝媳贤、夫妻和睦、温馨幸福并未违法的家庭，却被丧尽天良的丛健之流整得家破人亡了，我不知他们的良知何在?!

祖父亡故不久，母亲照看的孩子摔伤的胳膊也已经痊愈。这时与我父亲同样遭受厄运的地质局一位胡姓技术员，他的妻子，也遇到了难处，这位姓郭的女士原也在甘肃地质局财务处工作，他们夫妻俩同是湖南大学毕业生，老家都是在长沙，与我们也算是同乡。胡技术员遣送武威某农场后，小郭也被迫离开了甘肃

省地质局，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三岁多的大女儿左手有残疾，小女儿还不满周岁。小郭本人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也被逼离开了地质局，由此可看出甘肃地质局的丛健之流是何等狠毒。好在有好心熟人推荐，小郭去到当时位于七里河的回民中学当会计。丈夫走后，一人带着两个孩子，既要忙工作，又要忙家务，急于要找人帮忙，就想起了我母亲。我们俩家原住地质局宿舍时就彼此很熟悉，又遭遇同样的厄运，也就能互相照顾，彼此体谅。我母亲为他照顾两个孩子，料理家务。她也将我母亲当成她的家里人，很是融洽。除食宿外，她每月付给我母亲 20 元（她的收入 78 元 / 每月，兰州市当时保姆工资是 25 元 / 每月）。从 1958 年 8 月中旬至 1959 年春节前，母亲又这样过了约半年。

在我母亲未去她家前，该校有一位已丧妻且无儿女的男教师对小郭很同情，不时来帮干一些较为吃力的家务活，如买煤、帮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等，一来二去闲话就多了，更有好事者去信告之她那在农场劳教的丈夫。不久她丈夫来一信，提出要离婚，1959 年春节前，她丈夫请假回来了，很快就办妥手续离了婚。我母亲觉得小郭既然已离婚，她还不满三十岁，如与这位老师能结合，也算是有了一个好归宿。春节前因

小郭的丈夫回来了，她只一间房，我母亲住宿不方便，便去到省建工局宿舍姜家了。

说到姜家，姜家男主人（我称呼他表兄）是甘肃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他是从一野部队转业的。他的外婆杨老太是我祖父的堂姐（我的堂姑祖母），1950 年以前在宁乡老家，与我祖父同住在一个大院内，关系较亲密，姜表兄的母亲我称呼七姑妈。姜表兄与甘泗淇上将是同族，甘泗淇上将原名姜炳坤，1949 年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予指挥了兰州的解放战争。姜表兄与甘将军是同辈兄弟或是叔侄，同族亲缘关系近或远，我就不清楚了。

我母亲在姜家与七姑妈同住。姜表兄觉得母亲不必再回小郭家，他很快就为我母亲在建工局所属的油毛毡厂找到了工作，每月 25 元工资。在此厂工作的还有一位姜家邻居，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妇女，也是湖南人，我母亲也就有了一个一起做工的同伴。母亲在厂里自己做饭吃，晚上就寄住在姜家。姜表兄有四个孩子，大的男孩约 9 岁，我还记得名字叫抗美，可能正是所谓抗美援朝时出生的吧，最小的还不到两岁，妻子是百货店的售货员，七姑妈一人忙家务也很不容易，我母亲有空也帮帮忙，姜家人对我母亲很关照，

母亲也就有了一个栖身的处所。

**母亲病重，家贫辍学。**父亲 1958 年 4 月去夹边沟农场时，我在天津大学已读三年级，妹妹在武汉已是高中将毕业。当年七月妹妹在武汉参加高考时，成绩很优秀，由于父亲的问题，各大学都不敢录取。可怜妹妹一人在武汉，不知怎么办？她的班主任及所在学校与招办再三交涉下，直至录取工作进入最后的几天，才被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轧钢专业所录取（现武汉科技大学）。而懂事的妹妹认为我们的生活费用成了母亲面临的难题，那有可能同时供我俩再学习，妹妹认为我已读到大三了，中途放弃太可惜。而她所录取的学院及专业，又不合理想，她如不升学，找份工作做，减轻母亲的负担，也可保证我可不辍学，读完大学至毕业。可母亲却不愿我们姐妹俩人中有一人辍学，家里用品衣服卖得只余下她自己几件很旧的衣服及一套旧被褥。到西北后的两年，因摆脱了宁乡乡间舅家的麻烦，同一级别因地区差，父亲在兰州工资略高于武汉，母亲操持家务又善于精心作安排，因此家中有少量的积蓄。原在武汉跟随我父亲关系较密的几位年轻技术员，也给予了援助。父亲在 1952 年倾囊所购十年按每年中号，分期兑换的国债，1958 年也兑换了点现金。

母亲做工的收入，她也省着用。因此我和妹妹还能继续学习了一年，直至1959年4月。

1957年暑假后，我和妹妹返回了学校，直至1959年4月，将近两年时间我们姐妹没有回过兰州的家。父亲离家后，我们姐妹也很想回去看看祖父和母亲，但知道家中经济很困难，往返路费是一笔支出，即使很想家，也只好作罢。

1959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姜家表兄的来信，告之我母亲病很重，全身都浮肿，我只好休学返回到兰州，也只能暂住在姜家，我也才知晓父亲走后家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急需找份工作做，解决家中的困境，但并不容易。每次到招收单位接洽面谈时，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用人单位不录用。后来由在回民中学工作的郭女士介绍，该校一位教师休产假，她所任俄语课，分其他教师承担时，还余下一个班难以做安排，郭推荐我临时去代课，我便一方面去该校临时每周任一个初中班四节俄语课，一方面寻找其他的工作。

我记忆最深的是六月初在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求职的一次，接待我的那位人事干部当时对我个人的情况很满意，他请示领导再回复，让我两天后去听信。两天之后，我去时这位干部很惋惜，说人事处长也觉

得我的家庭问题使他很为难，决定不录了。

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说来也很巧。在该厂出来正等公交车，巧遇 1958 年已毕业分配在兰州冶金厅工作的大学校友刘姐（她是天津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毕业的，也是我在武汉高中时高我一年的校友）。交谈中，知道我的情况后，她说：与她 1958 年同时分配来兰州的、天津大学化工系造纸专业一位姓何的校友，在当时甘肃省轻工业学校当教师。因她去过几次何姓校友的家，也就认识了该校的校长，听说该校正缺教机械制图的教师，便立即带我去轻校。经过她介绍，这位刘姓校长并未因我父亲的问题而拒绝，当时就答应了，并马上让办公室一位王姓主任给我填写了聘用登记表，还说表中家庭成员一栏中，不必填上我父亲是右派，以免惹麻烦，他知道就行了。王主任让我两天后带上相片再去办理聘用的手续。

两天后，王主任告诉我：五年大学我还未读完四年级，按大专毕业试用期待遇，每月 48 元的工资，马上可去办公室办理工作证，现在还不到月半，15 日可领取本月（6 月）全月工资了。他问我家住在何处？我向他谈到我和母亲寄居在亲戚家。约一周之后，王主任说：学校住房较紧张，现女生宿舍单元内，可腾出

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原为厨房约9平方），你家暂时无男性，住女生宿舍区，也不会感觉不方便。问我是否有意见？我除了很感激，还能说什么？我和母亲总算有了安身之处所。收入虽微薄，每月寄给妹妹15元，当时除每月购买按定量勉强果腹的粮食、及少得可怜的食油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余下的钱，已可勉强维持我们母女俩日常的支出，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母亲的体体已不能再去油毡厂做工，便在家休息，身体状况较好时，力所能及帮人缝缝补补做点小手工，每月还需接济在夹边沟的父亲几元钱零用。

1959年11月，我深知我已无望再复学，便申请办理退学。第一次申请，我所在的精密仪器系王主任，亲自给我来了信，认为只差最后一年了，退学太可惜，可特批继续休一年，待家境好转后，再复学，继续读完至毕业。我想王主任也是知识份子简单的思维，认为对“右派”的惩罚不会拖太久，从信中我也领略到了他对我很同情。我只好回信向他详谈了我当时的情况，再一次申请，学校批准了，并寄来一纸“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的证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这纸退学证书我一直保留着，也算是我人生转折

的一见证。

说到王主任，我再写几句题外话，2007年，我去上海妹妹家，她的邻居一对老夫妻，1956年分配在天津大学当教师，原是上海人，1986调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任教授。当得知我曾是天津大学的学生时，在与他俩老的闲谈中就自然谈到当年天津大学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王主任在“文革”中被迫害致身亡，听到这信息，我禁不住很心酸，也十分的不解，为什么好人大都遭受到迫害。

我工作的轻校，位于当时称为团结新村的大道上，前门门牌为一号。那时我对兰州街道基本不熟悉，当我搬入宿舍后，才知道该校后门与甘肃地质局大门是在同一条街上的两侧，且我住房的窗口与那扇我曾经进出过的地质局大门隔街可相望。1956年及1957年两个暑假回家时，虽与父亲当年的同事及邻居很少有交往，但1956年头一次回家时，我从天津带回去的干鲜大虾及其他海味、天津麻花等食品，母亲分送左邻右舍，那笑脸相迎，气氛融洽的情景，我还有记忆。

1957年“反右”了，左邻右舍见到我们则冷眼转过脸，路经家门也侧身快步而过，这些邻居的面容我多少也还有印象。尤其是那些来我家门口贴大字报的

人，更是记忆很深刻。现在偶尔在窗口看到这些面孔时，真有说不出来的滋味。想到他们当时那趾高气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作为，心中气愤实难平。但冷静下来想，也可以理解，这些人多数只不过是几个权谋人物利用的工具，为保全自己，只能出卖良知，充当打手，多数人也只是可怜虫。当然也有少数人从浑水中得利，平步青云。

约是 1960 年 9 月，当时兰州市物资已奇缺，副食品商店柜台除了摆放着象砖头一样的酱油糕外，已别无他物，居民已是饥饿难忍，抢劫之事随之增多。一天我去距学校后门不远的邮局寄信，当我急步超过走在我前面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约不到三米时，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哀叫声，我转身看到有一个身体瘦小的孩子，抢了那位老妇人手中的布袋，在争抢中老妇人已跌倒在地，孩子站着发呆。我走近看到孩子骨瘦如柴，从他抢到袋子还未跑开，一脸稚气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年龄可能还不足十岁。躺在地上的老妇，我认出她就是我家原住地质局宿舍平房时、同住在一排房间、相隔很近的邻居。我为难了，抢劫固然不对，但孩子已是皮包骨，我不忍去责备；而那位老妇，对我来说已是祖母辈了，老人与我并无芥蒂，但我不敢去扶她，

更不能相认，因为我的身份所限。三年前她家就与我家划清了界限，如我帮她，害怕好事者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交易，而给她已站稳立场的家人惹来麻烦。在那个年代黑白颠倒的事太多了，我稍犹豫就走开了，视而不见。但心中却五味杂陈，我真不知我这种做法是可耻？可怜？还是可悲？……

我在轻校工作的头一段时间，即 1959 年 6 月至 1960 年的 8 月，还是平静的。尤其让我感动的是 1959 年的 8 月中旬，我患上了黄疸型急性肝炎，病情严重，只得入住甘肃省人民医院。我到轻校刚两个月，七月初就放暑假，实际工作还不足一个月，但轻校的刘校长没有因此而不过问，住院费用按公费规定由学校支付。住院一个月，出院又休假二十天，至十月初才上班，工资一分也不少。我病愈上班后只能努力工作，以报答学校的关心。

我病愈后上班不久，约是 10 月中旬，有一天我碰到办公室姓蒙的年轻女职员（我进该校时，是她给我办理的工作证）。她对我身着的毛衣很是感兴趣，问我是否自己编织的，我告诉她是三年前我母亲编织的。她当时正怀有几个月的身孕，想给快出生的孩子准备些小衣服，可布票却有限，只能将她夫妻俩的旧衣服来改

制，问我母亲可否能帮忙，我便带她去到我那间小屋，我母亲当时身体已好些了，闲着也感到很无聊，就答应了。随后她常去我住的小屋，闲谈中，我知道了她和她丈夫都是西安人，她丈夫是军人，在兰州军区工作，她是随丈夫来兰州的。

从她口中我逐步了解到轻校大致的情况：该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共设有棉纺、毛纺、印染化工、造纸及皮革等专业，这些专业学制是两年。学生来源较广，大部分来自上海和江苏，学生文化程度差别也很大，有初中一二年级辍学的、初中毕业的、也有上过高中一年或两年的，因家庭大都是贫困阶层，有不少人已是在家闲了一段时间，是在号召支援西北的口号下，实际是作为移民而来的。因而学生的年龄差距也很大，年长的有二十三四岁，年纪较小的十六七岁。也有小部分来自陕西、河南，甘肃本省及兰州市区的人数却不多。另还有一个企业管理班及财会班，是培训性质，是轻工系统各企业的在职人员，大部分都是孩子的爹和妈了，有年纪较大的，对我来说可以说是长辈、姨辈。

轻校的教师也是来自好几个省市。纺织印染专业课教师多来自当时的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皮革及造

纸专业课教师多来自成都轻工学院，教化工的有来自天津的，也有来自东北的，教数学及物理的多是甘肃师专毕业的，他们大都是 1958 年毕业分配来校，也有几位五旬左右教语文、物理、政治等的老教师，可能来自本市普通中学，也还有几位是单个来自其他不同院校的。

学校除设有一个办公室和总务科外，有四个教研组（毛棉纺、印染造纸、皮革化工、基础课）。从专业上来说，学机械专业的只有我一人。她还说：当时教职员工全校共有 60 多人，年龄可能我最小（当时 21 岁）。行政人员和老教师都有了家室，1958 年从学校分配来的有好几对原就是恋人关系一起分来的，为分配宿舍，来校不久就结婚了。余下的几位年轻女教师都是名花已有主，其对象在其他的单位。年轻男教师还有好几位是单身，有的已年过三十了。

因为我母亲帮助了她，她后来也为我母亲揽下了一些缝补的活计。我在轻校工作一年多，交往较多的，也就是她了，都是她来我的小屋，我只去过她家一次，未见过她丈夫本人，只见过照片。我与其他教职员交往也很少，一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想主动去交往，万一对方不愿意，何必自己找没趣。就是那位何姓的大

学校友家，我也是在刘校友带领下去过一次，他是从部队下来后，作为调干生进入天津大学的，年龄也就较大，早已成家，孩子已经三岁多了。二是我不住在教职工宿舍区，而是居住在女学生宿舍单元内，下了班回家就陪母亲，我也就与其他教职工无来往。即是同一教研组的人，如无工作上的交流，也很少讲话，当时虽也知道他们的姓名，因印象不深，现在也记不起几个，至于其他教研组的教师，当时就认识不了几个，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就更无印象了。但当年接纳我工作的刘校长、办公室王主任，我永远感激，不会忘记。还有当年那位整人的后任校长及喊得最起劲的几位教师的姓名和模样也还有抹不去的记忆。

周日我陪送母亲到姜表兄家，有时也随刘校友去兰州铁道学院或兰州大学玩，（刘在大学时，交有一位朝鲜留学生男友，后男方回国了，但双方还苦恋着，曾咨询过外事部门，答复是这种恋情是不可能结果的，因而她也很苦闷。）这两所学校当时距轻校都很近，都有天津大学1957和1958年毕业的校友。但大多时间我是陪母亲在姜表兄家和他家人相处一天，母亲在自家小屋一天到晚关着门闷了几夭，说话的人只有我，周日到姜家，尤其与七姑妈相处她较开心。

因为这所中专学校所设的毛棉纺织、印染化工、造纸制革及企业管理等专业对机械专业基础课要求不高，每门课时也少，有的只讲授三周或四周就结束，于是我除担任机械制图课之外，在同一学期内还兼任如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甚至材料力学等课程，这些都属专业基础课（当时专业基础课与如语文、数学、物理等普通课同属基础课教研组），我就属基础课教研室成员了。因企业班多为来自工厂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学习比较困难，基础课教研组长贾效谊本身是甘肃师专学数学的，担任着企业班的数学课，他以组内工作忙，无暇课外再去辅导学员，每周有三个晚上安排我去企业班辅导数学，虽然教材很浅，仅是初中代数、平面几何简单知识，但对简单分数中的计算也出错：（如  $1/2 + 1/3 = 2/5$ ），这样没有一点数学基础的学员来说，也好似天书，他们多数年龄也较大，要想辅导好他们，还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但通过与他们接触，在与他们相处中，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甚至好评，也就不感觉累了。

1960年6月底，校长让我出差去一趟北京，任务是去化工部教育司要一套基础课教材，我本不想去：一是外出即是公派，个人也免不了一些小的花费，我

囊中羞涩；二是母亲身体状况，我也放心不下；三是在武汉已读了两年大学的妹妹，从 1957 年暑期离家后已三年未回家了，母亲和我都思念心切，当年暑期无论再苦也想让她回家来三人团聚。可推脱不了校长的好意，只好快去快回，约用了十天时间，在妹妹回到家的第四天，我就从北京返回家中了，这个暑期是母亲和我们姐妹俩三人，挤在那约九平方米的小屋内度过的，因为妹妹回来，母亲高兴，身体及精神状态都好多了，这是三年以来我们难得的团聚。

**风云突变，又陷困境。**当年暑期即将结束时，轻校风云突变。一天早晨起床走出房间，就见对面饭厅墙上贴满了与校长有关的大字报，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我从旁听到此大字报是一位刘姓年轻女教师的未婚夫，头天晚上贴出的，揭校长与他未婚妻刘老师有不正当关系，还揭校长为达到遗弃在陕北农村的原配，威逼一年龄较大的企业班女学员 XXX 冒充他的原配，与他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到底实情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随之而来的是原校长被停职，轻工业局派来了一位校长接替工作，此校长名刘廷富，见人不理不睬，派头不小，据说来头很大。有人猜测：校长易人，总该

要有自己信任的左右吧？原来有点权的岗位上的人，可能会有所变动。于是有的人坐不住了，千方百计去寻找原校长的罪责，惟恐他倒不了，想尽方法巴结新校长，能捞到一官半职。

一位来自上海的卢姓女老师，她有一位高中同学在天津大学与我是同班，自然也就知道我父亲是右派了，于是我的家庭情况有不少教职工知道了。她的丈夫严普华是党员，从这儿得到启发，如果收集到更多的教职员工家庭或本人历史有问题，原校长在用人方面就难辞其咎了，轻则没有贯彻阶级路线，重则就只好说了，还有几个党员也很积极，如基础课组长贾效谊等。尤其是化工组有一位名张俊祥的党员，之前我不知他姓甚名谁，没和他讲过话，即是偶尔见着，点头而过。他这时特别积极，在全校教职工批判原校长的大会上，发言高调，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姓名，听他那蹩脚的普通话，广东口音很重，可能是广东人，也因为他的言行特别，我印象特深。据说后来在讨论决定下放教职员工名单时，他也是极力主张将我下放，说“右派”的女儿不放去农村，还留在学校干么？因而他的名字我至今未忘。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几个男人为了争办公室主任的位子真是各显神通。原办公

室王主任自然已呆不下了，调往何处，我不知情。其结果是那位严普华任了办公室主任。化工组原丁姓组长是一中年女姓，为旧知识分子，自然是被张俊祥斗下来了，张俊祥当不上办公室主任，就安排化工组长了。基础课不受重视，贾效谊感觉屈才，想趁机换个头衔，放哪儿呢？有办法，增设了一个人事科，也就安排了。

当年十月的兰州，食品已严重匮乏，不少人已食不果腹，除省市一级机关外，其他单位已不正常上班了，天气渐冷，没有烤火用煤，人们真是饥寒交迫了。为疏散城市人口，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奉旨筹划，发出指示：各单位精减人员，“干部下放农村锻炼”。于是兰州市与全国一样，刮起了“下放”风，被“下放”的是哪些人呢？各单位自然清楚。轻校“下放”的第一榜全是老弱病残，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基础课组的杨副组长也首榜有名。此人能力和为人都不错，但不是党员，丈夫是驻甘肃临洮部队的中尉军官。凭各方面条件，在原组长任命为人事科长之后，基础课组长应是她吧。不幸的是刚结婚半年，因流产而得病，下肢麻痹，行动有点不便。借此原因，组长自然名正言顺地由新任办公室严主任的妻子卢 XX 老师（即其高中同

学在天津大学与我是同班)上任了。不提拔杨当组长也罢,我想病是暂时的,又是军属,就这样将她下放处理了,其中奥妙可想而知。我“荣登”第二榜,在大红《光荣榜》上写着:“热烈祝贺下列同志光荣去到甘南草原锻炼,……。”是否“光荣”一看名单,大家心知肚明,尤其是第一榜都是老者、残病者,有人连起床都困难,如何承受起这份“光荣”。

**急离兰州,安家南宁。**我当时的情况是母亲还病着,我去了甘南草原,她怎么办?我中学时代的密友李姐(1973年3月因患肺癌病故),她1958年从武汉大学三年学制的图书馆专业毕业,分配在广西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与在南宁市委工作的男友结了婚,1959年我辍学回兰州后,他俩很同情我的处境,她的丈夫(1989年4月因脑出血去世)便介绍了一位姓张的市委干部与我交往,兰州——南宁相距几千里,当时没有条件见面,仅是互寄相片相识,所说“交往”也只是两地书信坦诚交流。当我得知被下放后,便去信告之他们,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电报,未曾见过面的市委张姓干部还电汇了一百元旅费(当时的100元已是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让我带着母亲南下南宁。我犹豫了,我们去到南宁怎么办?我与“张”仅是照片相识及书

信交流，见面后会怎么样？即便两厢情愿，他是党员，又是市委监委干部，婚姻是需经组织审查批准的，我这样的家庭能行吗？这时我的女友又来电了，让我不必顾虑，可先将我母亲送到她那儿，即是其他事情不能解决，老人就由他们照料了。

当时粮食等供应是凭户籍或粮票的，且粮票还各地不一，只有全国粮票才能通用。每人的数量供自己一人食用都很勉强，当时粮票就是命，没有粮票寸步难行。我们母女到广西，即是他们好心收留，不办户口迁移和兑换全国粮票，居住能长久吗？当我去派出所等部门办这些手续时，办事的人员几乎都是一顿官腔将我哄了出来，我可能是无路可走了。姜家表兄提议：让我母亲去他家先住下，我一人先去南宁，看结果如何？

我与南宁市委干部有交往之事，之前我向姜表兄谈过，并将他的相片及部分信件给姜表兄看过，姜表兄认为从信中的字里行间可看出张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从我女友的介绍来看，此人是可靠的，关键在张的上级党组织是否能批准，只有去一趟，才能知道结果。姜表兄还说：“现在各单位已很混乱，你也不必向轻校请假，打招呼可能还惹麻烦，你将家中物品也全

部搬出放在我家，房门还是锁上，就走人。”我毕竟年轻，有点害怕，如南宁之行没有收获，再回兰州，轻校追究怎么办？姜表兄又说：“你不是已被下放了吗？一种可能就是去下放地点；一种可能是开除出轻校。你仅是外出未请假，最多违纪，并未违法，又能如何。照现在情况看，所谓下放与开除并无区别，真去了甘南，你还能回兰州来？你不必想得太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姜家表兄还设法替我换来 10 斤全国通用粮票，于是我一人即刻动身南行。

我记得是 1960 年 11 月 22 日晚 9 时，我乘坐的北京——南宁 5 次特快到达南宁站，站台上人很少，从车窗中我认出了站台上的“张”，我怀着忐忑复杂的心情下了火车，不知此行能否让我走出绝境。在我未到南宁之前，张已向他的领导监委书记谈过我的情况。我们见面相处几天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稳踏实言语不多的人，我的女友也认为是可以放心托付终身的人。他对我的看法可能是单纯坦诚、还有些稚气未脱。我们彼此认可了对方，就向他的领导写了报告，请求批准结婚。

监委熊书记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熊书记叫我去当面谈话，我见到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详

细地问到了我的家庭、我父亲和我本人的情况。之后，他沉思了片刻便说：“你父亲属高级知识分子，划右与你无关，他是他，你是你嘛”。随即就在我们的申请书上签名同意。

我俩也没做什么筹备，第二天就去医院婚检，1960年12月7日，只告知张工作单位交往较多的同事，及他从武汉一同南下南宁工作的好友，我和张就结婚了，婚礼简简单单。婚房就是他原来与一同事共住的宿舍，室友搬出。他原来的单人床，加拼一块一尺多宽的木板就是婚床。当时有关衣食的各类商品，均凭有限的票证供应，凭结婚证可购买三斤硬水果糖，半条大前门牌香烟，二十尺布票仅勉强购买一铺床单及窗帘布，蚊帐因已无布票不能购买，他刚参加工作时，他母亲给一半新中床蚊帐，他单身时觉得宽了，一直未用，这会正好用上了。至于衣服及其他就不可能购置了。我这只漂泊在狂风恶浪中即将沉没的小船，总算靠上了一个停泊的港湾。

结了婚，就着手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南宁市委组织部决定调我来南宁工作。我又在此住了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南宁市委组织部已向兰州相关单位发去了商调信函。我约是1961年元月5日离南宁返回兰州，到

达兰州后，我见到的是车站内外人山人海，一片混乱，站外人群拖家带口，身背手提行李，甚至还有桌椅板凳家俱，纷纷逃离兰州。好不容易挤出人群，在去姜表兄家的路上，我还见到了倒在路边的几具饿殍，真是惨不忍睹。

第二天我回到轻校，下放的人并未被送走，只有几位家在外地的（沈阳、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单身教职工离校回去了。学生原就是来自好几个省，尤以上海、江苏最多，也跑了不少。最使人想不到的是化工组张俊祥组长，使尽手段，上任仅够三个月，椅子未坐热，也携夫人跑回广东了。天气寒冷，因缺煤宿舍及教室暖器已停，也无法取暖，洗脸的湿毛巾都结了冰，硬邦邦，早晨水管结冰，无法用水。这位刘廷富校长已是焦头烂额，已停课一月余了。当我去到人事科谈我工作调动问题时，贾效谊科长倒不敢隐瞒已知我调离兰州之事，只是感到奇怪，我无声无息“失踪”了一段时间，从未听说我有男友在广西，忽然就结婚了，且还是南宁市委监察干部。他表情狡黠地望着我：“什么时候找到广西的男友？”我回答：“我找男友时，你还不是人事科长，所以没有向你汇报。”但他还是刁难我，不过不是训斥，而是要滑，他说：“兰州需要党

员干部，调他来这儿不好吗？你们也可团聚。”我也笑着回答：“人家在南宁干得不错，我能让他陪我去甘南草原”？他尴尬了，最后他推脱说要看省轻工业局的意见。我只得去轻工业局询问，答复是轻校不同意放人。到此，我明白了，推上再推下，省轻工局并不认识我，我一个普通教师，可有可无，何必为难我，还是轻校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有意刁难。

怎么办？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我肝炎住院时，我住的内一科病房，有一小套间住有一位老人，内一科病人大都比我年长，因疾病折磨也寡言少语。而我毕竟年轻，躺不住，就常在病房外侧的走廊上走走，也常遇见他，免不了就聊上了。聊得多了，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业。他是甘肃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也经历过长征，名李 XX。想到了他，我决定去找他碰碰运气。去到甘肃省委找他，知道他在 XX 疗养院，距省委不远，我立即赶去，见到他时，他笑哈哈地说：“小鬼，你有空来看我，真高兴”。我不想拐弯，便向他直白了我遭遇到一切。他仍然笑着说：“我的老战友的部下要求照顾夫妻关系，应该帮忙。”我以为他认识南宁监委的熊书记，他说：“不认识，经历长征的人，都九死一生，难得呀，不认识也

是心灵相通的战友，既是战友之托，也不是什么大事，试试吧”。说毕，他便拿起电话直接找到省轻工局局长谈我的事情。随后让我放心回去等消息，如果两天内没回音，让我再去找他。果然，不到两天，人事科找我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想不到你敢去找省委”。于是我的调动及户籍迁移等手续算是办妥了。可是当办我母亲的户籍迁移时，又出麻烦了，派出所当时办事的民警认为我母亲不应随我迁移，我只得又回轻工局人事处，请求帮助。经历这样一波三折，总算一切都办妥了。

办妥了这些，已是1961年元月底了，离春节已只有十多天，是否立即离开兰州，我又犹豫了。一是母亲十一月初给父亲寄去钱及信，随后又接连去几次信，已将近三个月未见回音，母亲很着急，她不愿离开兰州，想等着父亲的信。我当时想去一趟酒泉夹边沟，姜表兄极力反对：“你一年轻女性，没有同伴，现在旅途如此混乱，火车到酒泉后，去夹边沟还有不短的路程，你怎么走？叫人如何放心。你和表婶先去南宁，如有表叔来信，我会立即转寄给你们”。我只好放弃酒泉之行的打算。

二是购买前往南宁的车票又成了难题，车站上拥

挤的人群越来越多，即使手持有车票的人，也难挤上列车，有的人几天也挤不上火车。此前，通过刘学姐，也结识了天津大学 57 级及 58 级毕业，在兰州铁道学院工作的几位师兄学姐，我只好去找他们帮忙。他们有人熟识兰州车站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地购到前往南宁的车票，并由他们和车站工作人员带领，在未检票之前，经车站工作人员通道，我和母亲最先登上了还空无一人的兰州——北京这趟列车。待开闸检票时，旅客潮水般的涌入，从车厢门挤不进的，就从窗口扒入，火车开动了，还有人趴在窗口，双腿或下半身躯还挂在窗外，险象丛生，真叫人捏一把冷汗。车厢里拥挤的情况，象筷子插在筷筒里，根本无法动弹。我和母亲上去早，坐在靠近列车员休息室一张两人座位上，我从窗口向外望去，站台上还有不少挤不上车的人，边喊边追逐着已开动的列车，此情此景，与有些影片中看到的抗战时逃难的景象有过之无不及，可惜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可供拍摄的手机及相机，如拍摄下来，也可作为那年代的历史见证。车上无水也无食品供应，好不容易捱到郑州，转乘北京——凭祥国际列车，郑州至长沙段，人还较多，但已不十分拥挤。车过衡阳后，车厢内人就很少了，坐躺

自由。且有米饭、面条、鸡蛋、猪肉等食品供应，不收粮票，就是价格很贵。虽然车上旅客大多面容枯瘦，可能也饥肠辘辘，一碗肉面或一盆炒蛋饭都收十二元，按一般人当时的收入就吃掉了一月工资的  $1/3$  或  $1/4$ ，因此在车上就餐的人很少。母亲在兰州已很长时间未尝过肉类和鸡蛋的滋味了，我们在车上买过一盆炒蛋饭，一盆大白菜炒肉丝及白米饭，其情景至今已过半多个世纪尚未忘却。

我和母亲在 1961 年春节的前几天到达了南宁，我庆幸我们母女终于“逃”离了苦海，在南宁安了一个新家。春节过后不久，我的工作安排在南宁机械厂，1961 年 3 月 1 日我就在该厂设计科上班了。

#### （4）夹边沟——父亲人生的终点

（1958 年 4 月至 1960 年 11 月）

在 1957 年之前，夹边沟名不见经传。它位于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1957 年 4 月，成立于 1954 年 3 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父亲于 1958

年4月底被遣送至该处。

父亲的工作性质，长年在野外，已习惯了艰苦环境，他不畏惧吃苦，虽年过四十五岁，身体还算健康。被遣送夹边沟后，他单纯地认为也就呆上一年就可回家了，只是担心祖父和母亲，还有我们姐妹，在暂无经济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如何安排，可能就苦了我母亲了。母亲为让父亲少些牵挂，父亲走后，也一直未告之已被逼搬离地质局宿舍和随后祖父已亡故之事，只是让父亲寄信时寄往一位姓姜的湖南老乡家转交（并且是祖上亲戚），因寄往地质局怕惹麻烦，因此父亲一直不知他走后家中所发生的一切。

我无法了解父亲在夹边沟的情况，父亲去夹边沟之后，他只给我母亲写信，从不给我和妹妹寄信，我理解他是不想让我们周围的同学知晓，给我们更增一层伤害。我只是在1959年回兰州到轻校工作后，为让父亲放心，给他去了一信，为不使父亲为我退学难过，向他撒了一个谎，说我提前一年毕业，分配了工作，可以承担起家庭了，请他放心，多保重自己。不久，父亲只是回了一张明信片，三句话，十二个字：“**知道你已工作，很高兴。我很好。**”，对他在夹边沟的实际处境一字未提。其实当时的规定是：劳教的人员每月

只能寄出两封信，且需经管教检查后才能寄出，实际已失去了通信自由，因而父亲是不可能信中告之实况的。

他每次给我母亲的信就是明信片，几句简单的话，如果是母亲给他寄去钱和物，其回信就象一张收据“**所寄钱 X 元(XX 物品)已收到。我很好，勿念**”。如他需要什么则是：“**我想要 XX，如有可能，则寄，如有难处，千万别勉强**”。其他仍然是他还好，问候祖父或嘱母亲保重身体，或问我和妹妹简况。一张明信片，能写多少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到马鬃山煤矿后的一次来信，时间约是 1959 年 10 月，这次是用纸笺写的，告之我母亲他被派到该煤矿，一位姓田的矿长对他还不错，还询问他一些有关的地质及探矿技术等问题。这封信用的是两页红色直行十行纸，约写了一页半，每行约十多个字，全信最多不足 150 个字，这是父亲离家后最长的一封信，从信中文字可看出这段时间可能是他离家后心情最好的时候。在谈到田矿长向他询问有关探矿技术的字里行间，又看出了他对专业的执着，他以为在煤矿可以干他的本行了，他毫不在乎此煤矿地处偏僻、环境艰苦。在煤矿他呆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只知道随后他又回夹边沟了。这封

信之后，寄回的信，仍旧又是明信片。父亲寄回的这些信，当时的境况，我母亲没有单独的处所可存放，她可能也有顾虑，不想让我保存，给我增添麻烦。而我却感到很自责，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将它保存着呢？不过当时确实没有料到父亲再也回不来了。现在每当想到这些，的确悔恨不已。

母亲收到父亲最后一张明信片约是 1960 年 10 月底，父亲想要食物，这是他去夹边沟两年多，第一次提出要食物。因兰州市副食商店已一无所有，我的粮食定量每月已减至 20 斤，且在轻校食堂，无法领出。母亲每月减至 18 斤，基本是杂粮，能买到玉米粉就算是运气了，有时是马铃薯或高粱米，即是自己做饼都难，有什么食物可寄？我到火车站周边转了一圈，发现有一处一个中年男人在偷偷卖蚕豆，我一问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元钱一颗”。我和母亲当时都认为，既然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也许寄点钱在当地可买到食物，于是将在兰州只能买到 8 颗蚕豆的 8 元钱寄去给父亲。我清楚的记得我被“下放”的《光荣榜》已经贴出，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不敢告之此事。信及钱寄出，直到 1961 年 2 月初我调离兰州，母亲一直未收到父亲的回信。

我们离开兰州时，我给父亲去信，告之我已在南宁结婚，已调往南宁工作，母亲随行，且告之我女友在广西大学宿舍地址（我父亲知道她）。可我们到南宁一月余，仍没有父亲的信。三月初我收到兰州姜表兄给我的信。姜表兄在信中告之我们，他一直未收到过我父亲的信，且甘肃省遣送农场的右派已回来了，也不见我父亲去找他。

我和丈夫商量该怎么办？他建议我找我工作单位党委谈谈，能否以单位名义去信甘肃地质局询问。我当时工作的单位南宁机械厂答应了。约过了半月余，党委书记通知我去党委办公室，在场的有人事科长及党委书记。秘书将甘肃地质局回函给我看，上面几行字：“王本莢已于 1960 年 11 月在夹边沟病亡，并于 1961 年 1 月已摘帽。其遗物现在我局，家属是否来取或按家庭地址寄回，请转告其家属。函复”。当时我尽力抑制我的情绪，泪水在眼眶内打转。

党委鞠书记的谈话很坦诚：“人已不在了，遗骨也不在兰州，去到夹边沟也未必能找到埋葬的确切地点，当地风沙迷漫，路途遥远，你孤单一女性，路途多有不便。如去兰州，除了领取到遗物，也不可能了解到其他，往返花费，旅途劳累，有否必要，这只是我的

看法，你可与爱人商量决定。人事科长在这里，如你决定去，可找他办理请假手续”。我丈夫也认为鞠书记的谈话正确。

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告诉甘肃地质局我的地址。过了约 20 天，遗物寄来了，打开一看，惨不忍睹，几件破烂得已无法形容的衣服，肮脏不堪，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样的遗物哪敢让我母亲看到，我的心情悲愤极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这情景会时常呈现在眼前。我是学工科的，对诗词是外行，在怀念父亲时，为表达心中情感，就摹仿着写下几句心里话。

#### 诉衷情——悼念父亲

当年不恋黄鹤楼，怀志赴兰州。荒原钻塔耸立，  
夙愿化宏图。

阴云起，志未酬，业已休。奇冤难料，饥逝巴丹，  
遗骨沙州。

（巴丹：甘肃酒泉吉林巴丹沙漠。）

对父亲在夹边沟的处境及亡故的具体情况，在当时是不可能知晓的，我只能将伤痛及一些怀疑深藏在心底，尽心尽责照顾好母亲，供妹妹读完大学，我想这也是父亲的心愿。

## 第二篇 为何划“右” ——何罪之有？

### （一）兰州之行（1979年5月）

父亲因何被划为“右派”及在夹边沟去世之事，虽在我脑海中存在诸多疑问，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无法去厘清的。直到1976年，最高掌权者驾崩，“文革”随之结束，当时按权威的提法：“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有远见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将共和国建国以来二十多年里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作一次清理，人心难以平复，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就难以复苏，何谈“四化”建设。1957的“反右”所产生的数量庞大的所谓右派，该怎么办呢？于是如何处理好全国几十万（一种说法是几百万）“右派”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高层的某人坚持不能否定“反右”，认为“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工作的进展是很艰难的，阻力很大，也就不能彻底解决。不过，在制造冤假错案、及而后再如何平息事态，这方面党的某些领导向来是驾轻就熟的。很快就有了说词，对处理“右派”问题，不说

“平反”，而说“改正”。1978年9月就出台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55号文件。其内容有“关于改正问题”一项中提到：“对右派分子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的，要实事求是地给予改正。”另有：“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我是在1979年5月中旬才知道这份文件。

我在1961年就已知在父亲去世后，其“右派”帽子已摘。但为了弄清当年父亲为何划右？处理情况及死亡病因，便于1979年约是5月18日左右向工作单位请假，先到武汉与我妹妹会合，一同前往兰州甘肃省地质局。

我从1961年2月离开兰州后，至1979年5月已过了十八年零三个多月，兰州新的火车站可能落成不久。走出车站街道变化不大，如通往地质局那条街上两旁原有的和平饭店、邮电支局等依然如故。我原住过的轻工学校那幢楼房也还存在，只是后门的围墙已基本坍塌，可直接看到球场上有人在打篮球，但我没有过去询问是否仍是轻校？我在该校也并无深交旧友，也许已是物是人非。

地质局已是新的红砖四层大楼，也建了新的四层

的单元宿舍。原旧的办公楼已成为招待所，原我家也曾住过的两排干打垒平房，大部分已拆去，只在角落里还余下几间。我们找到局办公室询问，具体负责接待的是地质局党办组织部的一普通干部，该人姓彭。可能我们去时，已是该局办理“改正”的尾声了。我们见面时，他问我是谁的家属，我说出我父亲的姓名，他翻开一文件夹，随即说：“呵，有此人，你们怎么才来？”如果他不这样说，我也许不会生气，时间长了，变迁很大，寻找困难，情有可原。但这句话却勾起了我伤怀的往事，当初局方残忍地赶走我祖父和母亲，居心叵测地想置他们于死地。便忍不住说：“你们通知了吗”？他又说：“可能不知你们地址”。我答：“1961年我曾给你们来过信，你局也将我父亲的破烂遗物寄给了我，就没有留下地址？在你们看来，一个‘右派’死了，也就完了，想办法通知我们是你们的责任。”彭干部无话可答。接着，他口不离中央精神，拿出一份简单的“改正”结论。并说：“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补发处理期间被扣的工资，已故人员不开追悼会……”。我已经感觉到局方的敷衍态度，时过二十多年，1957年的领导早已不知去向，现任领导一则认为是给以前的领导擦屁股，并不认真；二则也是受当时

大环境影响，采取随大流的解决方法，并不重视。因当时已接近下午下班时间，随即彭干部便安排我俩在招待所住下。

1957 年以前甘肃局内与父亲相识的人，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波折后，由于各种原因，留下的已很少了，当得知我们已到甘肃地质局时，当晚便有两位约年过五十及一位约年过三十的妇女，来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房间内，她们说认识我父母，也曾见过我们姐妹，但我不认识她们。从她们那里了解到少许当年对父亲的处理及去世情况。父亲当年所在的探矿处，处长名乔崇俊，及几名其他处的负责人，还有个别党委成员，认为对我父亲的处理太重，他们主张放去下面的钻探队，边劳动也还可发挥专业特长。但以丛健为首的几位局领导却认为要给点颜色看看，坚持要遣送位于最艰苦的酒泉沙漠里的夹边沟农场，因为意见不一致，直至 1958 年 4 月才确定，而先我父亲遣送的是去离兰州较近的武威一农场（如上文所说那位同乡胡技术员）。后来所划“右派”达不到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规定的比例，又补划了几个，省劳改局认为补划的人数不多，懒得指派车辆押送，由各单位自行处理，因此甘肃省地质局补划的“右派”就未再送去农场，而是贬

到下面基层去了，一直在下面从年轻呆到中年，有的从中年已呆到老年。“改正”后也还未回局，来找我们的正是他们的家属。她们还说 1961 年初在中央监察部钱瑛部长干预下，在农场劳教还活着的都回局了，但也都都被赶到基层了，如胡 XX（此人我认识，上文已提到）去到了天水地质队，还有张 XX、陈 X……，这些人我均不认识。原四位局长，据说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真是应了那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名言，也真是报应。她们还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情况：1961 年初遣送农场的人返回时，不见我父亲，她们听说我父亲已去世了，后来也知道了我父亲并非病逝，是饥饿而亡，1960 年 11 月之后，因饥饿而死的已很难找到能行走的活人去掩埋了，只好胡乱丢在沙海里，遗体任其裸露，我父亲的遗体也可能是这种情况。

接着，她们问到了我母亲，说她们 1960 年底还见过我母亲，当时没说几句话，以后就没有见过了，我向她们谈到了 1958 年以后我们母女三人的经历。她们异口同声的说：“真是先苦后甜。与局内划右的人家属子女相比之下，你家现在算是最好的，你两姐妹都读了大学，现在工作也好，爱人也好。其他划右的家庭子女有的连中学也读不上，后来又被赶去农村，现在

生活也苦”。那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就是一位右二代，当年小学毕业就辍学了，1968年又去了农村，后嫁了一个农民，还生了一个女儿，1977年离婚了，当时她母女俩生活无着，就是想地质局方能安排一份工作。我问她们住在哪里？她们仍住在那几间未拆的干打垒平房里，局里新建的单元楼房，错划为“右派”的人，即使已“改正”，仍然没有资格住，一边是新的高楼，一边是挤在角落里的低矮残破的平房，如此天壤之别，看着让人心酸。

她们也谈到了当时局里的情况：帮派林立，领导层矛盾重重，水深得很。你们来这里，只能是浪费时间，消耗精力，他们不会告诉所有的真实情况的。并告诉我原来探矿处的乔处长的住处，已是副局长，现在党校学习，但他在局里话语权不大，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因为乔我认识，1957年我家住干打垒平房时，还是邻居，且从她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处理我父亲时，他还说过一些好话，隔天晚上我便去乔家看望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他的谈话中也暗示了某些问题，他认为我父亲性格太直，遇事太较真，一心赴在专业上。并对我父亲的遭遇表示同情，对“改正”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没有表白。也谈到“文革”中他

的处境，感同身受，庆幸还活着。还关心地问到了我们的情况，为我们姐妹都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高兴。我也看到了他的确已年老力衰，对局内的事，有难以启齿的表情。没坐多久，也就告辞了。

## （二）胡编的“改正”结论

那位接待的彭干部，给了我一纸“改正”结论。以下是那份“改正”结论全文：

### 关于王本莛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王本莛，男，1913年生，原系我局七级钻探工程师，1958年3月经省委工交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定为右派分子。于1960年11月病故在夹边沟劳教农场，1961年12月27日摘掉右派帽子。

经复查：王本莛同志一九五七年整风中曾说：

1. “好象一说话就有人在后边听，记得有一次，一位工程师对我说：过去外国人讲话，中国人是一百个‘也是’，现在仍然是一百个‘也是’，当时我有此感，所以答曰：都是中国人吗！？当然我没有把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分开是不对的。但就这句话，很快就被领导上知道了，给我开会，硬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想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为什么不让他有思想呢？有个

思想就要问你个什么思想！”

2. 为生活而工作吧！因为我有父母老人，要吃饭，不这样就不得吃饭。我好象坐在船上，不知开船的人把我开到那里去。我在旧社会受过气，好象在新社会也受排挤。有些人在旧社会参加各种帮会，但只要对领导唯唯诺诺（别人谓之靠拢组织）就会飞黄腾达。我不知道现在还要“阿逢迎？”。

3. “非党团员对党团员指挥不动。团员关继皋写了一个总结因文里不通。我改了一下，就抱头大哭。可是非党团员刘柱贤，我叫他写个报告，他就乐意接收了。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党团员。这不是‘墙’是什么？”

4. “下工作队提意见，而不经书记、队长就行不通。四个局长我都感到难接近，官僚主义太多了。”

5. “三反时逼我承认贪污，降了职，现在我要平反。因为我根本不是贪污分子。”

6. 整风前夕，与胡绍舜等人准备成立“工程联合办公室。”

上述几个问题是王本莢同志 1957 年鸣放会上谈的个人意见和看法，按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和中发[78]55号靖神，不是右派言论，经 1979 年 2 月 17 日局党组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技术 7 级。王本莢同志 1960 年病故按正常死亡对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二十三条规定，“符合本企业的平均

工资二个月作为丧葬补助费”，即  $80 \times 2 = 160$  元。按内务部“1955 年几项优抚标准”规定，付给“病故抚恤费 360 元，共计伍百贰拾元。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地质局党组章）

以上“改正”结论我现在是完全照抄（包括文字的错漏、标点、引号等）。我当时看了以后，首先提出了三个疑问：一是我父亲的技术级别，我知道他在武汉 1955 年时是六级工程师（1952 年三反时降职只是指撤去当时钻探总队副总队长之职，随后不久，中南重工业部钻探总队也不存在了。他的技术级别并未降低）。1956 年，我暑假回兰州时，曾听母亲说：1956 年春父亲调西北之前曾评为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提了一级，就应该是五级工程师了，而“改正”上写的是七级。二是 1961 年 3 月我在南宁机械厂工作时，请南机党委发函询问过我父亲情况，甘肃地质局曾致南机回函告之：我父亲在 1960 年 11 月在夹边沟病亡，并于 1961 年 1 月已摘帽。中央有关夹边沟右派的遣返是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当时摘帽应是适时。为什么这纸“改正”上摘帽时间是 1961 年 12 月 27 日，与 1961 复南机函件上所告之

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年。三是我父亲在夹边沟病亡的具体日期和所患病况、埋葬地点，病危及死亡时根据哪条法律不通知家属？彭干部无法回答。

我又提出：记得当年批斗我父亲时，地质局院内及我家门口的大字报，都是揭露我父亲严重的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与人民为敌的诸多罪行，似乎是十恶不赦，局方还指派了两人找我谈过话，动员我揭发父亲的反动罪行。如果仅凭这几条座谈会上的意见，够得上严重反党吗？我想知道我父亲当年还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导致如此严重的处理？原始档案里是如何记载的？答复是：“文革”时局里的档案已全部丢失。我反问：这份“改正”结论中几点我父亲当年整风会上的发言又是从何而来？难道这些当年的会议记录就没有丢失？在我一连串的追问下，对方仍然只是沉默。

第二天我找到当时的局长，此人名马万里，没说几句话就要起了无赖：“按中央精神办，你们不满意，在这儿愿呆多久，请便……。”并指指在他办公室内站着的几个人（看到他们在这位局长面前，那种卑恭的表情，可能是基层队来的）：“他们几个原也是被划右的人，是按中央精神办的吧。”那几个人连忙傻傻地点头，似

乎吓得有些慌乱。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说：“尊重你，才来找你了解，不是来吵架的。想不到你也和原局长丛健等人一样无赖，你甘肃地质局是一个让我伤心之地，祖父和父亲两代人被你局整死，你以为我愿意在这无聊之地呆着吗？我只想了解我父亲当时是怎样反党的、凭什么作如此处理及他的死亡过程。我对你们这分‘改正’有疑问，不可以质疑吗？你有本事可以取消这纸‘改正’，再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反正我已要不回一个活着的父亲。关于技术级别五级或七级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应该实事求是。就是这份‘改正’结论中，支付的这几百元钱也算个屁，我不稀罕。我也有了思想准备，等着你局也将我送去夹边沟，我正想去寻觅和拜谒父亲的亡灵。”他愕然了，愣了一会，态度也变了，让我先去休息，改天再谈。说实话我当时也未曾想到：我一番激烈的言词倒使对方态度缓和了。我离开南宁前往兰州时，我丈夫一再嘱咐与局方交涉时，遇到问题，态度不要过急。我丈夫一向谨言慎行，他常和我带着玩笑的口吻说，有句老话：头上长双旋的人，性格倔强。他担心我把事情弄僵，怕我吃亏。而我当时是认为父亲已去逝了，局方还能因此去整治一个死人？我不在兰州工作，局方又能对我怎

样？因此也就无所顾忌。

第二天局方党办一负责人找我商谈，说马局长有事，让他来向我说明情况。首先表示歉意：“你父亲的事，不仅是给你们家庭带来不幸，对局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现在，局里一时还难有如你父亲这样的优秀技术人员……。以前局里的人事档案及一些资料，确实在‘文革’期间丢失了不少，关于你父亲的情况，是在进行‘改正’这一工作时，向当年的一些知情者了解，集中起来的，毕竟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且你父亲来局工作时间也不长，接触的人也不多，有熟识的也已去世，因而难免有误，如你父亲的级别等。关于当年对他的揭批及处理就不好说了，请你理解。至于当年你父亲在夹边沟病亡及埋葬的情况，劳改局及农场方面也没有给予我局具体资料，详细情况我局也不知晓。你家现在如有直系亲属需要安置工作，局里可照顾安排。”（1979年有不少“老三届”及“文革”中被赶去农村后返城知青正等着就业。）我对党办干部说：“不必了，我的大女儿虽即将高中毕业，即是高考落榜，我也不会再让她来这倒楣之地吧！你认为呢？”这场交涉之后，我们感觉也没有必要在兰州再呆下去，当时妹妹已调往上海宝钢，正准备前往报到，我们就结

束了这趟艰难且伤感的兰州之行。

我看到父亲这份“改正”中所列父亲当年在座谈会上所说的第一条内容，使我想起了一件事：1956年我暑期回兰州时，有一个周末父亲所在处里的一年青女职员，拿着两张入场卷来给父亲，说是局里在兰州饭店招待苏联专家有舞会，父亲说他不会跳舞，票可给其他人去，这位女职员见到我和妹妹，就说：“给她两姐妹去”。父亲认为妹妹还是中学生，不适合去，我已是大学生了，为不使这位女职员太为难，就说让我和这位女职员去。于是我就随她一道去了当时兰州惟一最高档的兰州饭店。第二天我和父亲谈起我在兰州饭店的见闻，我看到父亲的表情很冷淡。随后母亲对我说：父亲很反感某些当时苏联来的年纪很轻的人，自认为专家，对中国的地质情况了解不多，工作上帮不上多少，但生活上都吃住高档饭店，每周舞会作乐。父亲的这些情绪也可能在同事之间有所表露，而引起当局对父亲的不满。

“改正”中提到的成立“工程联合办公室”，1956年我暑期在家时，曾听到父亲与胡XX谈及过，局里能否成立有关学术方面的组织，将地质普查及钻探能很好地结合，这是一个有关专业或者说学术研究的问题，

怎么就扯上政治了，还认为是想成立反党组织？当时想整治人，七拼八凑，罗织罪名，而后为凑这份“改正”，又塞入到我父亲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父亲在座谈会上是否讲过，反正死无对证，真是无耻之极。

### （三）划“右”标准及劳教条例

兰州之行，当时地质局当局对我提出对父亲处理的诸多疑问是回避的。现在我看到当年划右的标准，质疑我父亲的言论有哪一条够得上划右呢？且还是极右。现抄录划右标准如下：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反右派进攻中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以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并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且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者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出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般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分子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对照这些标准，尤其是极右的四条，那一条也套不上，父亲只是对当时局领导丛健之流的一些领导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正是这些伤了居心叵测的头头们的自尊。当时各单位都有划右指标，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哪管对错。尤其我父亲调到该局时间很短，有不少人对他的为人并不熟悉，领导如何布置就如何干了，广西有一句很形象的比喻：“新鸡丢入旧鸡笼，挨啄”。何况丛健之流是一群丧心病狂的恶鸡。

最近我在某网页搜索到有关对原地质局长丛健的简略介绍。此人原名王有巡，出生于1914年1月。对他的一生吹捧有加。特别可笑的是如下说词：“……成为懂专业的领导者，他尊重、信任、依靠知识份子，发挥他们的才智”。可是我父亲却被他遣送夹边沟农

场去“发挥才智”了。另有一段描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毁，1971恢复工作后，夜以继日无视‘四人邦’的淫威，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保护了一大批科技人员。1987年12月病逝于西安”。我想是“文革”中，轮不到他整别人，而是他自己也受到“严重摧毁”，才有所感悟吧，他没有被整死，也算是他的运气了。

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文章，是参与了该决定起草工作的人（晏乐斌）所写。现也摘录如下：

“1957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并提出‘搞个劳动教养条例’。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同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有关劳动教养具体内容的规定是：

1. 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犯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 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 不服从分配就业的、转业安置的、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强制性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照上面四条，我也困惑了，这几条中的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对照我父亲的情况套得上吗？他是不务正业的流氓盗窃罪犯吗？他长期拒绝劳动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吗？他不服从就业不断地无理取闹吗？再看第二条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对照甘肃地质局那份右派“改正”通知上所列，父亲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哪一条可套得上反革命或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在对父亲右派“改正”通知中有“……1958年3月经省委工交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定为右派分子。于1960年11月病故在夹边沟劳教农场，……”。这说明甘肃地质局丛健之流胡乱编造罪名上报整人，而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各级掌权者某些人也极不负责任，不认真核查胡乱批准，就葬送了一个无辜技术人员的生命。张仲良是毛泽东“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指示的真实执行者。甘肃省当年的灾荒情况，我是亲自所见的，省会兰州都处在饥饿之中，1960年底街头巷尾不时有饿殍倒地，全市食杂商店空无一物，甘肃老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生死攸关的状况，张仲良难道没有责任吗？应是罪责难逃吧！

我也在网上搜索到张仲良的生平，并有他的照片，算是第一次见识这位无产阶级政权的功臣。尽管1959年至1960年底我也曾是他在甘肃当政时的臣民，因是底层贱民，无缘得见高贵的尊容。有人描述他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四大恶人之首。据介绍，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揣摩旨意，是批斗彭德怀元帅的急先锋，并夸口甘肃粮食如何如何丰产，钢铁生产如何从无到有……。但从1987年出版的《中国潮》中，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一文披露定西地区便“饿死近百万居

民”。作家沙青 1988 年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有一段描述：“……更有人将自己尚活着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下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儿吓得躺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甘肃省当年财贸部长张天珩也谈到“当年整个甘肃河西走廊，日人均粮食不足六两原粮（四两食用粮），1959 年上半年就处处有农民饿死，饿死 130 万—200 万。”而张仲良 1979 年 2 月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还列席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垂暮之年，还选为中顾委委员，我不知是否因几百万的饿殍给他增添了政绩？

#### （四）人间地狱真相点滴

父亲在夹边沟的情况，1979 年的兰州之行，也没有找到半点信息，几十年来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又无法了解。2004 年 8 月偶尔在《南方人物周刊》

上看到一篇李姓记者采访作家杨显惠先生所著《夹边沟记事》的文章，文章中附有夹边沟当年断墙残壁的几幅照片。“夹边沟”总算有消息了，我的心情激动难平。立即想法在上海购到了这本书，在书中虽没有找到有关我父亲的信息，但夹边沟当年的惨状初见端倪。我向《南方人物周刊》打听到杨先生的手机号，本想与他联系，但不久我患上了重病（膀胱肿瘤），手术治疗接踵而至，已无暇顾及联系一事，家人也不愿我因此而增加烦恼，而影响治疗，已将杨先生手机号藏匿，我只好先搁下联系之事了。

肿瘤手术后，身体逐步恢复，在互联网上特别关注有关夹边沟的信息。2010年11月，网上一篇“夹边沟50年祭”，又勾起了我想了解父亲当年情况的心愿，让家人找出杨先生的手机号，联系上了杨先生，他又介绍了在兰州的和女士，和女士给我寄来了她的作品《经历——我的1957》，她的丈夫王景超先生当年也冤逝在夹边沟。她还介绍了其他的一些信息。随后有也曾经经历过夹边沟磨难，但侥幸逃过了死亡的一位杨先生，给我寄来了邢同义先生所著《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我又在网上搜索到何与怀先生所写《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高尔泰先生所著《寻

找家园》；赵旭先生所著《风雪夹边沟》；司继才先生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等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是亲身经历过夹边沟苦难的回忆，也有是历尽波折采访受难者的记述。还有《南都周刊》及《凤凰周刊》等采写的文章。也看到了王兵所导，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过的纪录片《夹边沟》的影象。钟政先生所著《血泪惊魂夹边沟》，只看到简介，未搜索到原书，简介中谈到他本名为提中正，原是一位电台的播音员，因他的名字‘中正’二字而获罪，因与蒋中正同名，如仅是因此，我不知划他“右派”的单位领导是无知还是无耻？！

在这许许多多的文字中，我没有找到我父亲的一丝信息，杨显惠先生也曾替我询问过当年在夹边沟造册登记死亡名单的经手人，此人当时也是右派，但因其身份特殊，接触的右派较多，所谈及之人，其着装谈吐，与我父亲不大相符，且她也闪烁其词，我能理解，也很感谢杨先生的帮助。我无法记下父亲在夹边沟的具体惨状，是我心中的一件憾事。但父亲在夹边沟的苦难境遇与其他人也会是相同的，当年的夹边沟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有关的描述很多，我现摘录其中极少的内容如下：

“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二十小时才能到达酒泉，沿酒泉至金塔行走，在第二十八个里程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沙丘，就是夹边沟”。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苇，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夹边沟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人间炼狱，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超过二千五百人成了饿殍！短短三年间，只剩下三四百人。”

“1960年9月初，粮食定量减至12斤。……如果还有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撷草籽、……，

挖鼠穴，掏地鼠过冬的食物，抓蜥蜴，煮食后，有人因此中毒死亡。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只好趴在洞外太阳下撅起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眼睛睁不大，就象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的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大都用肮脏的破被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的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煮着吃掉了。……”

“1961 初，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 2000 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在始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夹边沟既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但是 50 多年过去了，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夹边沟里发生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里的尸骨，被消磨殆

尽。”……。

“右派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1960年夹边沟二队队长张银说：“不跑的都是最听话的，正统些的，职务较高的，学历较高的。……，他们是一些比较自尊的人。”——摘自 2010《凤凰周刊》02期

2004年以后不少采访夹边沟的记述文字，也摘录一些片断如下：

“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到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

“另一位林场干部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一车。”

《当代》2004年1月的编后“夹边沟事件是当代

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刮心。”

虽然我没有从有关夹边沟的文字中，看到我父亲的身影，但通过这些揭露当年夹边沟的惨景描述，我完全可以了解我父亲的处境了。

2015年3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一个我不熟悉的电话，是一位女士打来的，她作了自我介绍，她是中山大学已退休的博导，是一位独立制片人。她去过夹边沟且在甘肃兰州等地采访了好几位原在夹边沟劳教，九死一生总算逃过了死亡劫难，现还健在、大都年逾八旬的老人，他们向这位艾女士陈述了当年的亲身经历，艾女士将这些采访摄制成了专集。她也要来采访我，了解我父亲的生平。我原有些犹豫，因不了解艾女士的来历，后我向在中大任教的堂侄女了解，艾女士是一个可靠的人，我便同意她的采访。她不辞辛苦，专程来到南宁，到南宁的当天下午及第二天的上午连续两次来我家，录音及摄像，我向她讲述了我所知晓的有关我父亲的情况。艾女士对人坦诚亲切，而我对她的接待是不周到的，两次的采访只是第二次随我们吃了一餐很简单的饭，也没在我家住宿，确实很抱歉。

她给我留下了她所拍摄的采访他人的资料，看到了她去夹边沟时受到当地有关人员的阻挠和刁难的画面，也看到有几位健在的老人去到当年他们受苦受难的地方去悼念冤逝的难友，将暴露在沙丘上的遗骨拾起来埋葬，他们不顾年老，筹划用遇难者家属及社会正义人士的捐款为冤逝者建立墓冢，可是他们历尽辛苦建起来的纪念碑却被酒泉当局的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马上就砸毁了。

从艾女士采访的这些声像中使我更清楚的了解了夹边沟这处人间地狱。人不是机器，那样恶劣的土质，天寒地冻，每天能挖那么多土方吗？没有食物，饿着肚子能支撑多久？生活在那无际沙海的狭窄的地窖中，或是断墙残壁的破屋里。夏天火热的阳光照射不能隔热的破屋顶，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纷飞的大雪，屋内如同冰窖，一年四季踏着赤热的黄沙或深深的积雪，从刚天明累到天黑，饥肠辘辘的人们回到住地，曲卷在多人挤着的肮脏土坑上熬到天明，他们有真正的天明吗？只有日复一日的劳累和饥饿，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改造”期限，没有法律的正式宣判，他们是如张仲良和丛健等各级领导所宣扬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来的，这是对他们的“爱护和

关照”，不是有古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好好“改造”，前途就是光明的。那里确实没有如共产党虚构的“白公馆”和“渣滓洞”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可他们天天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和饥饿的刑罚，饿死后的遗体还会被饥饿至极已濒临死亡的人吃掉，饥饿得已半死的人谈论的话题是：“明天会轮到谁，今天睡下，明天还能起来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惨景？据说《夹边沟》影片在威尼斯放映时，影场静谧中只能听见有人在抽泣，有不少外国观众实在看不下去，流着泪中途退场了。他们难以想象，在廿世纪声称先进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有这样的景象，与古拉格式极端有过之无不及。身处夹边沟的“右派”们，在各级权欲熏心的恶毒小人掌控下，在这改造灵魂的好地方，三千多被改造的人，有两千多已彻底地脱胎换骨，灵魂得到了高度的升华，脱离尘世升入天堂了，他们的遗骨留在了夹边沟荫佑着那片他们曾流过血汗的沙海。我父亲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印象中，他身体一向健康，所以他支撑到1960年的11月了。我不敢想象，他的遗体的某处是否也被人切去煮食了。为什么会出现夹边沟这样的人间地狱，这是谁之罪？！

可是我现在看到当年有关劳动教养文件中冠冕堂皇写着：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劳教所设立劳教人员食堂，在生活标准内尽量调剂、改善劳教人员伙食，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得卫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劳教人员公布伙食账目，严禁克扣。对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在生活习惯上也强调和大部分劳教人员一样要求。劳教人员宿舍要求采光不差、通风一般，有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保暖、降温设施。劳动教养管理所设置医院或卫生所，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病及时治疗。劳教人员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所外就医。保证劳教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节假日休息。劳动教养管理所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劳教人员可以看书看报、体育、看抗战电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开展有红色经典的文艺活动。”

而夹边沟的实际情况，却是人间地狱，如此欺骗人的虚假规定，是权谋人物惯用手段，真是无耻之极。

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饥荒时，夹边沟的农场管理人员的亲属，包括亲属的亲属七大姑八大姨都涌向农场，占食了被劳教的人员原本少得可怜的食物，

致使劳教人员的处境雪上加霜，因而当年饿死的都是劳教人员，而管理人员及其亲属却都安然的活着。

据有报导：1960 年底，当时的中央监察部长钱瑛去甘肃河西走廊调研，因其司机迷路，误入夹边沟，其随行工作人员见到不远处有炊烟，便前往打听，见到地窝子外沟边有堆放的尸体，感到吃惊，农场管理人员刘振玉还想阻挡威胁。随后钱瑛过来才知夹边沟农场之事，立即命抢救余下的饥饿得濒临死亡的被劳教人员。并去到地窝子巡视，当去到农场管理人员刘振玉房间时，见到有 28 条毛毯，200 多个各式手表，其老婆房间也搜出几十条毛毯。这些物品原本是个人财产，人死了，私人财产也被这些贪得无厌的人堂而皇之的占有了。

现在的夹边沟已成了休闲度假村，当局千方百计企图掩盖当年那人间地狱的惨景。但 50 多年前已改造成白骨的成千荒冢，仍然半隐半现在荒丘沙海里。据说每当深夜还可听到乱葬岗中冤魂凄声哀诉，此时可能也是度假村中人们杯盘交错酒酣耳热之时。如此两种情景交相辉映，不知人们感受如何？！

几十年来多少思念和愤懑，我难以表述，在我父亲于夹边沟遇难 50 年时，我仿填一词：

# 水调歌头（2010 年 11 月）

（夹边沟 50 年祭——纪念父亲遇难 50 周年）

蒙冤莫须有，慈父遣酒泉。断壁残垣陋舍，栖身至何年？沙漠荒丘深处，风沙严寒酷暑，凌辱并艰辛。饥饿西归去，遗骨弃沙间。

五十年，常思念，夜难眠。夹边荣变，车马喧阗度假村。荒冢冤魂谁慰？劫后余生鬓秋。纠错遥无期。但愿人为本，期盼和谐真。

以下是 1957 年受尽折磨的“右派”在原夹边沟无际的沙海中的劳动场所和蜗居的地窝子，真是难以想象的惨景。(1)、(2)、(3) 是地窝子外。(4)、(5)、(6) 是劳役遗迹。

(1)



(4)



(2)



(5)



(3)



57 难友住过的地窝子

(6)



当年右派们劳役遗迹

鸿志报国兮 魂断沙戈壁

遗骨无存兮 悲愤问长天



当年难友们所住的窑洞 地窝子内部

## 第三篇 怀念永恒

### ——敬盼英灵安息

祖父和父母都离开我几十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留在我心里。我祖父辛亥革命后，进入过政界任职几年，而后半生有 20 多年的时间是投身兴办教育。父亲一生从事地质技术工作，也任过几年教师。父亲不曾参予过任何党派或团体，与政界各派别风风雨雨的纠葛也毫无关连，他的一生，正直为人，踏实干事，遵纪守法。可是在进入廿世纪五十年代后，只因其直率坦诚，不善逢迎，有独立思维，不盲从的个性，为“尊者”所不容，知识倒成了罪恶，遭遇到莫名的灾难，着实令人叹息！母亲一生操持家务，勤劳善良，尊老爱幼，相夫育女，维护着一个温馨的家庭。我要尽力记下我对他们的怀念。

#### （一）祖孙情深

父亲被冤屈遣送农场后，1959 年 4 月我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辍学回到兰州，才知道祖父在 1958 年 8 月就已去世，我读着祖父留下的几句七言，

真是痛彻心肺。在母亲的带领下，去到安葬祖父的墓冢。可是墓冢已被铲平，种上了玉米，要不是母亲记忆原墓冢旁有一棵特别的树，就找不到墓址了。后来我们发现小块石质墓碑弃在树下，就肯定这原就是祖父的墓冢。我虽气愤难过，本想去质问毁墓的人，但是当年正是饥谨年景，在那不能有自留地的年代，如果不是饥饿得无路可走，也不会在这荒冢之地种几株玉米，此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忍去追究。我当时想：一生仁爱的祖父，也会宽恕的，我深信祖父善良的灵魂一定升入了天堂，在自由幸福的天国里与先他逝去的曾祖父母、祖母、小叔、哑姑、小姑等团聚，又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再也不会寂寞。

祖父虽已去世多年，他的音容笑貌，儿时与祖父相处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仍很清晰。我每当回忆起祖父，或凝望着祖父的遗照，我浮想联翩：我 1938 年在长沙出生时，是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体重不足 1500 克，身体极度虚弱。当时我父亲已随北京大学去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祖父小心地将我捧在手上，安慰着我母亲：“**孩子会长大的。**”我出生一个月后，随着日军的快速南下，已逼近武汉，我家只好迁回宁乡乡间祖居。祖居内居住的有继曾祖母，还有我大伯曾

祖父王晋臣的后人。祖父虽另购有住宅，因为不放心我，时来看望。

我出生于农历三月，正是乡间桐梓树开花的时节，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祖父的第一个孙辈，祖父去信与我父亲商量，给我起了一个“桐初”的乳名。由于体弱，我在三岁前重病过两次，尤其是第二次，约是 1940 年底，病最重时，已象是一个上不吃、下不出、眼不睁、全身不动、腹部鼓胀着的小木偶。祖父非常着急，寻遍乡间名医，乡间只有中医，最有名气的中医，看到这情景，摇摇头就客气地转身走了。这时我外婆家的一位远房同族，按辈份我应称呼他仲三舅舅，他开了一家中药店，据说也行医，但是一个坐冷板凳无人问津的郎中。他听说后，主动上门自荐：“孩子已是这状态，我来试试。”祖父很犹豫，还是我母亲下定的决断，背水一战。这位仲三郎中在他自己的中药店抓了几味中药，即刻熬好就给我灌下了。当晚我祖父和我母亲，还有祖居内同族的其他长辈们几乎一夜都未眠，不安地等待着结果。几个小时后，天将黎明时，我上吐又下泻，一番折腾后，终于微睁着紧闭了两天的双眼，也有了微弱的哭声。长辈们终于松了口气。继曾祖母及伯母们便忙着去堂屋点上了香

烛拜谢祖宗，感谢祖宗的保佑。祖父及伯父们便忙着备置酒席，要招待郎中。全屋上下都为我忙碌着，我就是在祖父和其他长辈们无微不至的呵护下，转危为安逐步长大了。

1941年的年初，我妹妹刚出生时，抗日战争仍然很紧张。继曾祖母也年近八旬了，我父亲北大毕业后，在广西参加了工作。我母亲要照顾两个孩子及继曾祖母，确实很为难。因为时有传言，日本兵距离我们住地很近了，进村就奸淫烧杀。我们居住的祖居旁是一条连结宁乡县城及益阳县城的交通线。一有传言，村里人就扶老携幼往山里去躲藏。我母亲和保姆杨嫂带着老人和两个孩子，也很不方便。于是便将我寄放在外婆家，外婆家与祖父的住地只隔一座不高的山，步行只需十分钟，祖父所办的群英小学距外婆家更近，相距不足一百米，群英小学校舍原是祖父租用的民房，后来该小学搬至外婆家。祖父家的住房是向一杨姓人家购买的。杨家原也是大户，上两辈中曾有人任满清朝廷的要职，后来家道中落了。杨老太的儿子及儿媳已去世，女儿（即上文提到的七姑妈）远嫁黄材镇上的姜家，年近六旬的杨老太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孙辈，老幼三人也感到孤寂，就将她居住的称为老忠堂的大宅

院出售了大部分，一半出售给我三伯祖父的长子（我称呼仙怀伯父）；另一半又出售了几间给我祖父。杨老太是王家出嫁的女儿，是我祖父的堂姐、仙怀伯父的堂姑母。三家住在同一大院内，对杨家老幼也有些照应。我到外婆家后，离祖父家近了，祖父常来外婆家看我，1946年冬我也在祖父办的群英小学读完了初小。

祖父留着垂至胸前的长须，我常常坐在祖父怀中将他的长须编结成辫子。有时祖父临时有事，起身就走了，忘记解开长须的辫子，引起旁人一阵善意的笑声，祖父也只好笑着说：“**这是孙女的杰作**”。不论是在祖父家，或是祖父来烈武湾祖居，晚上必定是我和祖父同睡在一床。祖父一年四季都穿着白棉布缝制的袜子，冬天还在袜子内包一层包脚布。当时我有些奇怪，因为我见外婆每次洗脚总是解开长长的包脚布，脚掌畸形了。男人也包脚，可脚掌并不是畸形？祖父说：女人是缠小脚，这是害人的，三至四岁就开始缠，缠得很紧，脚掌就变形了，是很痛苦的。男人冬天包一块布，可以保暖，脚上暖和，身上也会暖和些，因为寒从脚上起。祖父的棉布袜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六十多年后，我丈夫前两年双下肢患皮肤病厉害，天气转凉时，不能光着脚，穿现时的紧口袜，脚踝部

位有溃疡的地方就很难愈合，又买不到合适的袜子，我想起了祖父当年穿的棉布袜，就动手用穿旧了的内衣内裤给他缝制了几双，我丈夫穿着它感觉很好，不再影响脚踝部位伤口的愈合，去医院治疗时，医生笑问：这种老古董是那儿淘来的？

约是1944年，我的两个舅舅分了家，二舅另立了门户，外婆家房子宽了，大舅天天无所事事，外婆就让祖父将群英小学迁到了她的家，并让大舅帮助管理一些学校的事物。我也读二年级了，因寄居在外婆家，上学就不需出屋了。

三伯祖父是外婆同胞的兄长，他常来外婆家。三伯祖母去世后，三伯祖父也常到与我祖父同居一幢住宅的他大儿子家居住。因此祖父与三伯祖父老哥俩相聚的时间就很多。他俩原本就是同科考取的秀才，三伯祖父也曾开办过私塾。他俩聚在一处就免不了聊一些古典文学及诗词。我也就常常好奇地看着他们吟诗诵词的神态，听着那些听不懂的诗词和古文。但是慢慢的我也对有些诗文感到了兴趣。祖父选择一些易于解读的给我作讲解。我印象较深的如韩愈的《祭鳄鱼文》。我家祖居烈武湾及王家老屋，祖父的居所老忠堂屋前均有一池塘，都养有不少鱼。我便问祖父，这些

池塘里有鳄鱼吗？祖父说：“**鳄鱼很大，这些池塘里没有**”，我当时不可能看到鳄鱼。多年之后，我看到鳄鱼时，就不由得想起祖父对鳄鱼的描述。

当时农村也有流动的耍杂技的走村串户，有口技艺人学动物的叫声。祖父也给我读过一篇清代张朝所编《虞初新志》中描写“口技”的文章。文中的某些句子还有少许印象，好象有“京中有善口技者……”。还有“口技艺人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尺……”等。遗憾的是详尽的内容，已记不起多少了。

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初也是从祖父与三伯祖父的吟诵中听到的。两位老人一再的重复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赞叹道：“佳句呀！佳句”。又如陶渊明《酒歌》中的“……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及陶的《桃花源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两位老人都对诵过，我也在祖父的书斋中见过这类右起直排版的线装书，我当时识字还不多，无法阅读，但在我心里认为：凡是祖父看的文章，应该都是名篇。

唐诗宋词中，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等的一些名句。以致清代的纳兰性德的名词“山一程，水一程……”等。因为易记，当时我虽不完全理解其意，

但听多了，也就能背诵。我耳闻目染两位老人对古诗词的吟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爱好。1950年我进入中学后，高中课本中也选编了少量的古文及唐诗宋词，老师在讲解时，我特别用心。由于对古典文学的爱好，高中毕业前夕，我本想报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古典文学专业，由于1955年“反胡风”运动，我父亲建议我改变了志愿，报考了理工类大学。

祖父和三伯祖父相聚时，也下象棋和围棋。象棋棋盘上有楚河汉界字样，我也好奇，为什么称为楚河汉界？祖父就给我讲解楚汉相争中的两个历史人物项羽与刘邦的故事。使我在还未学历史时，就有了一些汉朝的初浅印象。我还记得当时三伯祖父谈到一个谜语，俩位老人对这个拆字谜语发表了看法。这个谜语是将项羽的“项”字拆卸出谜底的，四句话：“项羽昔日是英雄，拔山举鼎却无功；八千子弟今何在？自刎乌江不见身”。我当时不明白其意，祖父说“项”（当时繁体写为項）字左边是“工”，第二句中不见功是指“工”没有了，第三句八千子弟是指“项”字右边“页”下的“八”不见了，第四句是指“页”中的“自”字也没了，“项”字去掉这几部分就余下右上方的一横了，因而谜底是“一”。祖父认为经不起推敲，因“功”不

等于“工”，页字下面的部分也不是“八”，说着玩当然也无妨。

两位老人多数时间是下围棋，我看他俩下得很专注，我难以理解，白的黑的象扣子一样的小颗粒，棋盘就是方格子，棋子怎样走？如何定输赢？我脑海中一大堆问题。祖父在下棋休息的间隙给我讲围棋的来历。他说围棋是中国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古时称为“弈”。有一说是四千多年前尧帝为教育调皮的儿子丹珠、而想出的一个锻炼孩子思维的游戏，史书上有“尧造围棋，以教丹珠”的记载。祖父还说，围棋的说法很多，也不一定确切。但能锻炼思维倒是实在的，比象棋更好。而我感觉象棋易学，所以后来我也常和邻居小伙伴下象棋，而下围棋的机会却很少，仅是在读高中时与年长过我的邻居下过，十有九输。现在回想起来，我从祖父那儿学到了很多知识，增长了不少见识，不少知识都是在潜移默化中积累起来的。而现在的孩子，家长们煞费苦心，四处报班，家长花费，孩子受累。对比之下，我真是幸福多了，在祖父身边不经意就学到了不少。

1957年初祖父到兰州后，我在天津大学住校，他几乎天天都问我母亲，我向家里写信了吗？我几时能

回家？我写给家里的信，因他双眼已看不清字了，总是让我父母反复地念给他听，听完了还将信捏在手里抚摸着。由此可见祖父深爱着我的心情。我记得很清楚，是 1957 年 7 月 5 日，我到家时，祖父扶着拐杖站在家门口等着，他已看不清我的模样，用手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着：“长大了，真的长大了……”。毕竟已相距八年未见了，我已从一个顽童长成为一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我看到他混浊的双眼中已含着泪。我见到祖父时，心情也很难描述，有相见的喜悦，但见到历尽沧桑的祖父的模样有很大变化时，心痛极了。我见到他的身材比以前瘦小，胡子已花白了，且稀稀疏疏，也短了很多，但祖父没有将它剃去，也许是留习惯了，可能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头发完全秃顶，要是在外面碰见，可能不会认识。

七月初已开始反右，我父亲已遭批判，我理解祖父的心情，我每天陪着他，谈些我知道的趣事及我在大学里的情况，或回忆 1948 年前在家乡与他相处的往事。随着反右狂潮升级，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已贴满了我家房门口，祖父虽看不清大字报的内容，但他已感觉到了我父亲艰难的处境。祖父的神情越来越憔悴，言语越来越少，我只能尽量宽慰他那颗已饱经风霜的

心。可是我在家只呆了一个月，八月初学校来电要求学生回校参加反右运动，临离家的前夜，祖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谨慎。第二天早餐后，我依依不舍地将要走出家门时，祖父搂着我：“**路上小心，到学校马上来信**”。我不曾料到这一别就是我与祖父的诀别。他嘱咐的几句话，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遗言。祖父也只留下了他到兰州不久，我父亲带他去拍摄的一帧三寸的珍贵照片。1957年我和妹妹暑假回兰州后，本想和祖父、父母去拍一张全家照，也因为父亲已被批斗而无法实现。我现在也是老人了，也经历了不少事，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感觉到：祖父当年辞去官职，中断仕途，转而开办教育，并非仅因祖母有病而返回长沙。祖父生性坦诚，重义轻利，不善左右逢缘，为人做事多为下，少为上；只唯实，不唯虚。这些为人准则并不适合任庙堂之职。回顾祖父的一生，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我曾祖父与祖父都属于一类性格的人，都从事着教书育人的职业，却因社会环境的变迁，其最终结局竟是如此的天壤之别。我认为祖父的一生是无愧于家族和社会的。

## (二) 追忆父母

父母的一生，是曲折的。他们的少年时代，一个丧母，一个丧父，家庭不算完美。成年后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1935年夏至1949年父亲多是在外读书和工作，母亲一直是操持家务，先是大家庭中的长孙媳妇，服侍两代老人，照顾弟妹，很是辛劳。后是小家庭的主妇，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在这段时间里，我父母虽有不少时间是两地分居，也相互牵挂，因无其他社会压力，生活得还是平静温馨的。1950年初至1960年11月，虽然母亲因父亲工作的调动随行，从长沙至武汉，再到西北的兰州，但父亲经常出差，父母仍有不少时间是分居的。当时地质部有一位领导曾调侃道：“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到头守空房。即是偶尔见一面，还需帮洗脏衣裳。”更使人不曾想到的是1952年之后生活之路并不平坦，大多是在一种难言的压抑中度过，父母的境遇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

### (1) 父母的青少年时代

我对父母的少年时代知之甚少，只能是将母亲叙述中的点滴记述下来。

我父亲出生于 1912 年 12 月 29 日（民国元年 11 月 21 日）。其出生地是在长沙？或是宁乡祖居？我不清楚。他是祖父的长子，按辈份取名王本莢，这个“莢”字的来历，我查了一下，是从《诗经·卫风·硕人》的一句“葭莢揭揭”中取来。有乳名真男。我记得挂在我家祖居书房中有一幅字画，这字画的两边是对联，取唐代诗人元稹《离思五首》中一诗的前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山上云雾缭绕，山下潺潺流水的山水画。上书有“燧轩吾兄惠存”字样，我询问过母亲，“燧轩”是谁？母亲说：这字画是父亲的好友赠给父亲的。这说明父亲还有一个只有在好友之间才用的名字。

父亲出生的年代正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的第一年，社会并不平静。他出生不久就随祖父去到江西，祖父任职的吉安等地也比较艰苦，随后祖母又连生了几个孩子，祖父为官清廉，一个县官的收入，要维持全家几口人的生活，是不会宽裕的。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祖母一人操持家务，也很劳累。1921 年祖父返回长沙，1924 年祖母病逝。随后祖父续弦，继祖母无法承担一家老小的重担而另立门户。一个家庭在缺失主妇的情况下，未成年的孩子饮食起居可想而知。

因此我父亲的少年时代吃穿都很简单，衣服只能说是勉强遮体，食也只能说勉强果腹。我母亲曾说：1935年她嫁过来时，聋哑姑姑虽已是十四岁的姑娘，瘦小得似乎不足十岁；最小的叔叔虽已读小学五年级，冬天的棉衣又短又小，还遮不到肚脐，小叔还患有中耳炎，已有脓了，有时还发出臭气，因而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王五香”的雅号。真是应证了一句民谚：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我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很心酸，也意识到了她作为长嫂的责任了。

我父亲虽身处在这缺少母爱的家庭中，但他学习非常认真，给弟弟们做出了榜样。高中是在当时湖南长沙名校之一、1912年由符定一创立的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该校以公、勇、勤、朴为校训，培养了父亲坚毅、俭朴、勤奋的性格。他立志要考入北京大学，第一次高考未能如愿，第二次1934年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时父亲已年满二十一周岁，但身高仅过一米六，又黑又瘦，总算是在不够完美的家庭中长大了，跨入了青年时代，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我的母亲出生于1914年3月11日（民国三年二月十五日）。因为她出生的当日正是民间所说的“花州节”，因而取乳名“咏花”。在本族及至亲中，同辈们称她为

花姐或花妹；长辈们叫她花妹子。与我父亲成婚后，因我父亲乳名真男，在同胞兄弟中又是大哥，母亲在王家乡邻中，便被称呼为真少奶奶，或大少奶奶。在老家乡间非至亲，少有人知晓我母亲名字。而我父亲称呼她或写信时，都称呼“咏花”。

我外婆未出阁前，在娘家从小受宠，也由于王家祖辈在当地家世较显赫，外婆当年的婚事也很难如愿。外婆也是幼年丧母，是在我三伯祖父母（外婆的三哥三嫂）的照料下成长的，眼见挑来拣去，婚事还无着落，也很着急。三伯祖母娘家姓张，有一个堂弟，人品相貌还算出众，年龄比我外婆略小，于是在三伯祖父母的撮合下，促成了这桩婚事。

我外祖父的家，他上辈在当地还算是一个殷实之家，外祖父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人们称他怀三。外祖父的父亲在世时，家教甚严，靠勤劳节俭，大家庭还算过得红火。上一辈过世后，兄弟五人分立门户，原有家产分成几份，每家所得也就不多了。外婆婚后一年，我母亲就出生了，接着又生育了三个舅舅。外公家几代男性也没有进正式学堂读书的传统，何况女性，因而我母亲没有读过书。张家也比较守旧，我母亲三岁时，就被外婆缠脚。每当我母亲被缠得痛哭时，

外公很疼爱这个女儿，看不下去，就解开。就这样一个缠一个解，外婆为母亲设想的三寸金莲，在外公的阻挠下未能实现，我母亲也逃过了缠小脚这一劫难。但不幸的是外公患上了肺结核，在我母亲十四岁时，外公去世。原来家产不丰，外公生病去世后，家道就很艰难了。外婆在娘家时，很少操持家务，婚后也算不上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1927年前后，世事也不太平，可以想像出孤儿寡母家庭的艰难。我母亲是长女，是外婆的主要帮手，操持家务，照看三个弟弟，母亲就是在这繁杂的家务中成长起来了，在几年的时间里就显露出她的聪慧能干。对我父母来说，少年时有相似的经历，一个少时丧母，一个少时丧父。都成长在一个不算完美的家庭，因而在他们成亲后，彼此都很珍惜对方。

## （2）鸾凤和鸣（1935年7月）

我的曾祖父王泽臣对我外婆这个侄女中年丧夫的处境很是牵挂，尽力给予关照。随着我母亲年龄的增长，张王两家长辈们也就关心起我母亲的婚事，总想寻一殷实人家。外婆则想将我母亲嫁给我三伯祖父最小的儿子，我称呼十六伯父，而三伯祖父看中的是我

父亲，他很赞赏我父亲这个侄儿。而张家的族长们及我外婆却都不太愿意，一是认为我父亲在外读书，长久离家，并不善于管理家业。他们的说法是：三天风，四天雨，那天文章锅里煮，即是满腹经纶也是靠不住的；二是认为上有继祖母、继母，下有几个弟妹，有的尚未成年，家事复杂也难操持。后来我父母的婚事能定下来，一是曾祖父的决定，我外婆不好违背；二是三伯祖父极力主张；三是我母亲自己也拿定了主意。我父母虽是堂表兄妹，因一个在城市读书，家居城市，一个家居乡间，从未入学，因而很少见面，但彼此都认可了对方。这桩婚事不是自由恋爱，也没有媒妁之言，应该说是祖辈安排，两人满意。

1935年，我曾祖父疾病缠身，他自感可能不久于人世，我父亲念完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曾祖父决定让我父母完婚。父亲在北京大学这一年，可能因进入了自己理想的学校，环境的改变，与去时相比，已判若两人，身高已有一米七以上，身体也比以前结实了，由原来的瘦小身材，长成高大魁武的大个子了。因为王张两家族人及亲戚，都居住在宁乡老家，于是我父亲便于1935年7月回到宁乡祖居按乡间习俗举办了婚礼。婚礼是很隆重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旧友世交都到

场祝贺，送了不少的喜联喜幛。我稍懂事后，看到的那块挂在祖居正厅中的横匾，就是我父母结婚时，祖辈的友人所送的贺礼。这是一块材质上乘的红色木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鸾凤和鸣”，每一个字若有一米见方，烈武湾祖居正厅，虽高大宽敞，但显得有点陈旧空寂。有了这块大匾，气势高雅，厅中显现出一种说不明的暖意，它就成了厅内最耀眼的陈设了。是何人手书，对当时只有几岁的我，自然是不知晓，因我每到正厅，就见到匾，我也就最先认识了这几个字。当时因年龄太小，并不理解其意。成年以后，从实际的生活经历中，才真正理解这四个字在夫妻生活中是何等重要。我父母的一生，尽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他们彼此真诚，互信互敬，相濡以沫，是恩爱的一生，这种高尚的情操，确是这四字的真实写照。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将尽量展现。

1935年夏（不知具体日期）在乡间举行完婚礼，曾祖父带着全家即返回了长沙。父亲在家过完暑假，就回北大继续学业，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母亲先在长沙居住了两年多，由乡间去到城市，又是操劳一个上有老，下有几个弟妹的家庭，也的确不易，但母亲也很快就适应了，承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责任。从

父母婚后至 1949 年，虽这段时间国内大都是战乱，1938 年我们迁居至乡间后，战争对我家影响不大。也没有其他压力，生活是比较平静的。

### （3）父亲在大学的四年（1934 年 8 月至 1938 年 8 月）

父亲在大学的四年，社会也很动荡。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并对华北虎视眈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五四’爱国传统精神，痛切地感觉到“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便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1935 年 12 月 9 日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我父亲虽不是一个热忱于政治活动的人，但也是一个热爱祖国有理想的人，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活跃的环境里，自然不会置身于外，他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样的爱国活动，这是我父亲进大学的第二年。他租住在湖南会馆，这里还住了一些湖南籍的大学生，随后的一些抗日爱国活动，父亲虽不是骨干，但他一直是热情支持的。

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大学时光，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 月 29 日和 7 月 30 日，北平和天津

相继失陷。我在《西南联大校史》上看到8月5日日军就占领了清华园；9月3日日军进驻北京大学第二院和灰楼新宿舍。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始上课，这个日子以后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但随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1938年元月20日决定长沙临时大学又搬迁至昆明，并规定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西南联大校史》上有学生赴滇就学规定：“据此规定，学生须填写赴滇就学志愿书，由校常委审核，经批准者可领取赴滇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持甲种许可证者编入旅行团，由长沙步行到昆明；持乙种许可证者，须申请和领取护照，然后由长沙出发，乘船经广州、香港和海防、河口到昆明，至迟在3月31日前到本校昆明办事处报到。”

我不知道我父亲当年是领取何种许可证，因为他从未向我谈及过这段经历。不过我想，按父亲的性格，可能是甲种许可证，步行至昆明的。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

开课。父亲在昆明的时间不长，就是在这年八月，父亲就毕业了，从联大开课到毕业可能只有三个多月时间，因为是年6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我想：父亲的大学毕业证应是西南联大的校印，他就是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生。地质专业属于理学院，全称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亦称为地学系。我也从北京西南联大校友会编写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看到1938年第一届地学系毕业生中有我父亲的名字。1938年整个理学院毕业人数是八十六人，地学系就更少了。我儿时见过父亲在联大毕业时一张与原北京大学同学的四人合照，父亲这三位同窗的名字是白家驹、吴磊伯、马祖望，后来也常听父亲提起，在联大校史中证实了有此三人。前两人1952年来过我家，我见过面。联大校史中与我父亲同届毕业属原清华的是十四人，即北大和清华共计也只有十八人。从1938年至1946年，这九年间联大地学系三个专业地质地理气象毕业的人数，也只得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属北京大学毕业的从1938年至1942年共二十八人。我最近网购到《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在此书中看到了有不少测勘处的技术人员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

#### （4）父亲广西八步遇险（1938 年 9 月至 1943 年 4 月）

1938 年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正赶上这年夏天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当时湖南省政府联合成立江华矿务局，经理是谢家荣先生。谢先生是有名的地质学家，1936 年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是我父亲的恩师。父亲就去了江华矿务局任职。江华矿务局的办公地点分为两处：一处是在湖南江华县河路口，另一处是在广西八步镇，我父亲的工作地点可能在八步镇（现贺州市境内）。当时此矿务局设立有总务、工业、业务及会计四部门。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4 月，我父亲与其他工作人员对矿山的地质调查，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锡矿储量丰富，还有锑矿及钨矿等有色金属矿床。此矿务局在长沙也称为钨矿工程局。不久就开始了机械化采矿。现在我从《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中看到有如下描述：“1938 年，他（谢家荣先生）接到翁文灏先生的电报后，离开北京，到湖南江华矿务局经理，率领他的学生……在湘桂边界的八步河路口建立矿山，……用班加钻勘探并加以开采。”该文中提到谢老几位学生的名字，有我 1948 年在长沙曾见过的王植先生，还有我很熟悉的名字马祖望先生，我父

亲也是谢老学生之一。1942 年谢家荣先生已调任全国性矿产测勘处任处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战火已席卷了华北华中。1943 年春，日本第二次入侵广西，矿务局工作人员人心浮动，矿山一片混乱，私矿也乘机侵蚀公矿。在一次公私矿矛盾中，土匪也乘机作乱，公矿主要工作人员被囚禁，我父亲也在其中。在当时的战乱期间，政府部门也顾此失彼，各处诸侯林立，弱肉强食，发生这等事也并不奇怪。危急中，由于私矿矿长之子是我四叔在唐山工学院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在此人的斡旋下，我父亲才得以脱离囚禁之灾，但探矿工作也无法继续，不能再留该处，便马上离开了广西回到了宁乡。

我当时仅是五岁的幼童，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当时天气还有凉意，而父亲到家时衣衫单薄。据父亲说：他是半夜被抓的，根本来不及穿衣服，仅着内衣内裤。回家时身上穿的衣服还是那位营救他的人赠送的。可能是广西气候比湖南暖和，已不需冬装之故吧。父亲的家什等一切在混乱中已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了，回家的费用也是那位朋友赠送的。我最近收到谢家荣老先生之子谢学锦先生给我的信，信中写到：“你父亲的名字，我听我父亲提到过，是解放前抗日战争时间，

他（指谢老）在主持江华矿务局开采锡矿之时，我父亲对你父亲颇多好评，……，你父亲工作很努力，而且很勇敢……。”这也就证实了我的记忆。父亲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江华矿务局。父亲的初次就业就是进入对有色金属的探查这一领域，以后的地质钻探工作也多是与有色金属结缘，而对石油探查很少有交道。

### （5）难忘乡间的三年（1943年4月——1946年2月）

父亲从广西回到宁乡后，抗日战争仍在继续，父亲一时也无法与矿产测勘处取得联系，就暂时在家中住下了。

**温馨小家庭。**我回想起儿时祖居的生活，确实难忘，尤其是1943年至1948年初那温馨的小家庭。1943年春，父亲从广西回到了宁乡，这是父母难得的团聚。1942年三叔已结婚成家，另启炉灶；四叔也外出工作了；1943年6月继曾祖母去世，原服侍老人的杨嫂，我家也用不着了；1945年小叔也成了家，大家庭时代已逐步结束。

1942年初，长沙第三次会战大捷后，日军锐气大减，乡间有关日军进逼的传闻，也少了很多，乡间显得很平静。杨嫂离开时向我母亲谈到：她有一个亲

戚年龄虽过五十，但身体仍很健康，因家境贫寒，一直未娶，没有家庭累赘，是一个种植能手，只是性格有点古怪，去过几家做工，都因与雇主矛盾，只得作罢，现闲居在家，如果我家愿意雇他种植及养猪等，做点粗活，还是不错的。我父母答应让他来试试，此人姓张。后来我曾听母亲说过，他来到我家便主动先说：他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到衙门当过差，原来他老爹给他取的名，从未用过，他自己都忘了，他排行老二，就叫他张老二吧。他提出的条件是：凡是应由他做的事由他自己安排，主人不得干扰，比如哪块地该种什么、种的菜什么时候该摘、猪如何喂养等。我父母说：“这好办，我们家这类事全交给你，由你安排，不会多嘴。”他于1943年8月来到我家，一直做到1948年初我们一家人离开宁乡，他才难舍地离开。因为他年龄与我祖父相差无几，我父母很尊重他，称呼他张二叔，我和妹妹则叫他张二公，在宁乡老家称呼祖父辈为“公”。

我父亲回乡后也很少管家中之事，小家庭中的一切是由我母亲安排。张二公来家后，母亲只操持家中内务及女红等事，外面的事就由他去做，其实二公为人很不错，他将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且十分能干。

因祖产稻田还由继祖母掌管，我们小家庭没有分田，祖父的规定是：未成年自立的儿子，生活费用祖父全担，已成家自立有工作的儿子，如妻儿仍在乡间居住的，每家每年补贴 40 担谷子，至 1948 年初，我们未离乡之前，我们小家还得到这一补贴。因此张二公不种田、只种菜。他种的菜除供我家自己吃之外，他还主动送给我小叔家，有时还走几里路送去我祖父及外婆处，并帮我母亲做各种咸菜及酸菜，如干辣椒、辣椒酱、萝卜干……。我无法举出众多的品种，我家有一间小屋，放满了盛各种菜干的大大小的坛坛罐罐，都是张二公种菜的收获。他将我家祖居周围凡属于我家的菜地、山地、池岸，按其土质能种植什么，就种上适宜的品种，因此如花生、红薯、黄豆、绿豆、桐梓、茶籽、棉花等均有收获。桐梓及茶籽拿去榨油，桐油可油漆家什，茶油可食用。他每年养一头猪，临近春节便宰杀，猪油、腊肉、自制腊肠我家样样都有食用。他还养了四只母鸭，每天早晨就将鸭子赶到屋外，让它们在池塘里游弋觅食，产出的鸭蛋，我母亲就做成皮蛋咸蛋。还养了一群鸡，每年还孵不少小鸡，鸡天生是任人宰割的，在我印象里每一群小鸡在长到一定的大小时就开始逐步淘汰，小公鸡只会有一只逃

脱阉割和被宰杀的劫难，母鸡只有产蛋量多的会活得较长，这些决定鸡的命运的事，是二公操作，因他对鸡的品质很了解。淘汰的鸡就上了餐桌。母鸡所生的蛋，则是一家人日常餐桌上蒸煮煎炒的菜肴。二公每年还安排酿一次酒。野蘑菇生长的季节，每当雨过天晴，他就采摘回来不少，吃不完，就晒干保存。不同的季节他会给我和妹妹摘回不同的野果。他还常去水塘小溪抓鱼摸虾，有时还有泥鳅鳝鱼之类。因此当年我家的生活也只需购点食盐了，其他自给有余。

当时我寄住在外婆家读书，他每周六便来接我回家，周一一大早再送我去。1947年，我升入高小，去涌泉小学住宿，每周往返学校，大多时间也是他接送，他养了一条黑色小狗，每次小狗也与我们同行，一路上小狗撒着欢很有趣。我在涌泉小学上学的一年里，学费及伙食费大部分是他种的各种蔬菜卖给学校食堂充数。

我父亲回乡不久就先后在几所中学教书，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家。二公认为学校伙食可能不好，每当我父亲回来，二公总是抓来活鱼或鳝鱼，再宰一只鸡，餐桌上美味佳肴极为丰富。我祖父大部分周末时间也来我家，二公就让他们父子对饮，但父亲一定要二公

同桌，于是我们老幼六人围坐一桌，很是热闹。他们三人喝着自家酿的酒，吃着家产的菜，很是融洽。二公在我家，我父母将他看成家中的长辈，很尊重他，父亲常对他说，干活不要太累，如果二公稍有身体不适，父亲必定请来郎中看看。我母亲每年都亲手给他做布鞋棉鞋，每年也请裁缝给他做衣服，就是每天的膳食，母亲也是和他商量园子里有什么菜可摘，荤菜类有否鱼虾之类，由他准备好了，母亲只是掌勺。家中因劳动所需工具的添制，而需雇请相关匠人及其他需要由他去做的事，母亲都交予他，由他作主，从不干预，二公将这些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父母和他没有主雇之分，他将我姐妹俩当成孙女，爱护有加，我们之间尊老爱幼，营造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家。

**可贵的师生情谊。**1943年春父亲回乡后，没想到会在乡间任教，然而不久就接到了聘书。父亲先后任教于县立“宁乡师范”、私立“友仁中学”、私立“鹅山高中”。每个学期都会接到这几所中学的聘书，父亲只看接到聘书的先后，并不计较薪资的多少（私立比县立薪资较高）。从1943年秋至1945年底，他在乡间当教师两年多，共五个学期，在乡师一年，友仁中学一学期，鹅山高中也是一年。他在学校多是担任数学课，

有时也兼授物理。这几所学校离我家祖居都有十公里左右路程，父亲不可能住在家里，一般是每周回家一次。当时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大都住校，有的学生还是我家周围的邻居子弟，父亲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过去乡间的交通，除了骑马，就是坐轿。而我父亲每次回家和返校都是步行，从不坐轿。如遇到家住我家附近的学生，就结伴同行。

在我们家乡当时是很尊师重教的，家中有孩子能上中学或师范是家中的荣耀，对孩子的将来也是抱有无限的希望。全家节衣缩食，尽力满足孩子的需求。对孩子的老师，也充满了敬意。我父亲对居住我家周围的学生家长也很熟悉。有件事我至今未忘：父亲回乡的第一年去宁乡师范任教不久，他所任教的班有一个学生家距我家不足百米，他家除了种田，还做豆腐。他家姓尹，他父亲名“佑三”，周围乡邻称呼他“佑三豆腐”。这位学生是佑三的长子，下面还有几个弟妹，他的名字好象是“光前”。他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仍能劳动。因祖上几代文盲，现家中有了读师范的学生，就十分得宠。有一次我父亲从家中返校，走出家门不远，就有一乘轿子跟随其后，我父亲停下脚步往后望去，抬轿的是佑三和他父亲，因轿门有垂帘遮档，不

知轿内坐着何人？正当我父亲想询问时，佑三表情有些尴尬，我父亲有点不解，原来轿内坐着的是“光前”，爷爷和父亲两位长辈用轿子送晚辈去学校。我父亲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问是否身体不适？就在家先休息两天。这位学生也感觉难为情，急忙下轿。我父亲便说，如果身体情况允许，我俩一同步行回校如何？从此我父亲在乡间任教那段时间，每次回家或返校，都是与居住在我家周围的该校学生一道步行，爷爷和父亲抬轿送孩子上学的事，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也是我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学生的一个范例吧。

在长沙大火后，祖父有两位至交，带着家小逃难来到我家，借住在我家祖居内，有一家也姓王，当时这家有一个小姑娘正读初中，逃难后辍学在家，在家呆两年多了，我祖父认为十多岁的人在家呆久了不好，1941 初年，祖父让她去群英小学帮忙，并教小学生唱歌。1943 年我父亲去宁乡师范任教不久，就推荐她去宁师读书，1945 年毕业，正好抗日战争胜利。据说她后来在宁乡县城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

我 1947 年升入涌泉中心小学时，该校的青年教师中有四位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1946 年我父亲已去了

南京，他们常问我父亲的情况。三名是宁乡师范毕业的，一名是鹅山高中毕业的。他们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宁师毕业的有一位女教师，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女生宿舍与女教师宿舍联在一处，我的衣食冷暖，她都关注。有时晚餐后课余时间他们将我带着，在学校周边散步，就给我讲我父亲如何教数学的情景，有不少学生认为数学难学，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父亲则想法提高他们的兴趣。他们说：我父亲有一次让他们拿六根长度相等的筷子，组成四个三边相等的三角形，又有一次父亲拿出一张可折叠的长方形硬纸板问他们，将纸板卷成圆筒形，或将纸板围成正方口形筒或长方口形筒，当这三种筒形高度一样时，容积会一样吗？我当时只是听听，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们谈论时那充满兴趣及对我父亲很怀念的表情，使我牢记了那些有趣的数学知识。后来我学到立体几何时，很自然地就想起他们当年的谈话，知道前者是正三棱锥，四个等边三角形，由六条相等的棱组成。后者是立体几何中体积计算的问题，我也觉得这种对比的方法，圆桶方桶两种容积的计算一次就知道了，而且知道它们侧面积相同时，但围成不同形状的桶，容积却不相等了。宁乡师范与鹅山高中两所学校，我父亲都仅任教

一年，从几位老师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了我父亲与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却如此深厚，确实难得。三位男老师我也记得他们的名字：周乐善、陈实钦、张建军。女老师秦可勋。我与秦可勋、陈实钦、张建军三位老师拍摄的照片，至今还留在我的相册里，只是相片很小，且有些发黄模糊了，但大致轮廓还能看见，但遗憾的是没有周乐善老师在内。

**与乡邻的亲密相处。**父亲假日里闲居在家时，也与乡亲们聊得来，春插秋收时节，父亲也去到田间凑热闹，当然不论是插秧还是割稻，动作很是笨拙，往往引起一片笑声。乡邻们都认为父亲为人坦荡，耿直善良，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好接近。平时乡邻家有事，他能帮忙的，也很主动。如婚娶春节等喜庆之事，帮忙书写对联，丧事祭祀书写祭文。父亲在帮忙书写这些文字时，如祖父在场，父子俩就商量着、润色着，我在旁听着、看着，因而对过去一些传统的规定：晚辈对长辈、亲朋故旧间的称谓、祭祀文章等的格式，也就知晓了不少。在我的记忆里，只要父亲在家，家里总是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在我们家乡，春节从正月初一至元宵节，半月时间内有玩灯的习俗，组成玩灯队伍的人也都是农户中

的青壮年人。每玩到一家，这家主人要给红包，还要燃放鞭炮，鞭炮放得越多，玩灯的人玩得越起劲。红包及购买鞭炮是一项不小的支出，有的人家不想接待，就大门紧闭。而我父亲在家过春节的那几年，每天总是厅门大开，听到锣鼓声就主动迎接玩灯队，送上红包，热情地亲自燃放鞭炮。因而春节来我家玩灯的队伍络绎不绝，有时一队还在厅里玩，外面还有几队在等待。每年春节，这笔花费是家里的一大支出。父亲却说：农村的青壮年终年劳作，只有这几天有机会玩玩，老的小的也没有其他娱乐，能让他们尽情地热闹几天，不是很好吗？因此过春节的那些天，我家的厅堂里外总是挤满了人群。

父亲在乡间时，很少接触当地的官员及乡绅，即是最基层的保甲长也很少交往。但这些人的子弟却有的是我父亲的学生。每逢节日，尤其是春节总有人提着礼品登门拜访，父亲总是委婉礼貌地回绝，说教育学生是当教师的职责，家长应配合学校教育子女成才，就是对教师最好的支持，礼品就不收了。

**冒险的广西全州之行。**父亲在乡间的两年多，对家族及亲戚中的长辈，也是尽自己力所能及的照顾。继祖母对我父亲几兄妹年幼时虽很少关心，但我父亲

对她也没有太多隔阂，每当节日仍然去看望她，老人偶有身体不适，便及时请郎中诊治。也可能是自幼缺失母爱，对我外婆更是亲近，是岳母又是堂姑母，外婆家的事，有求必应。我的小舅 1942 年读中学时从学校参了军，随国民政府抗日部队去到了前线。1943 年 11 月在广西全州附近，军队驻地遭日军轰炸，小舅身亡。接到部队寄来的死亡通知，我外婆一定要将小舅遗体从广西接回宁乡安葬。我大舅和二舅从未出过远门，到广西接小舅灵柩一事就只有我父亲来承担了。战争时期路途艰险，王家长辈都认为不应该去，战时有多少军人牺牲在战场，哪有可能都将遗体运回家乡。外婆很固执，小舅是她最心爱的儿子，我外婆家舅辈也只有他进了正式学校读到初中，小舅亡故，外婆的精神就要崩溃了。我父亲为满足外婆的心愿，就答应前往广西全州。当时也没有其他人陪同，父亲就单身一人出发了。往返用了约二十天的时间，总算将小舅的灵柩运回宁乡。对当时的情况，我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是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父亲领着几个人抬着一具没有上油漆的白木棺材，沿着外婆家门前有些泥泞的道路走来，外婆家大门口站着的人群，立即燃起了鞭炮，有人将抬灵的人引入早已在大门一侧搭建好

的灵棚内。在我们乡间有一个习俗，在外死亡的人，灵柩是不能抬入家中厅堂停放的。

湖南宁乡至广西全州距离不算太远，却用了二十天时间。母亲在我成年后谈及此事时，还心有余悸。父亲当年向母亲谈到一路上的情况，确实遇到不少周折。当时是交通严重阻塞，不论是汽车还是火车都很拥挤，难民多，伤兵多，关卡也多，军警严查过往人员，且时有日本飞机轰炸。去时单独一人，挤上车还比较容易。回来时带着一具棺木，就不可能上火车，汽车也根本找不着。就只好一段一段找人工抬，能走水路时就租用民船。从广西全州进入湖南后，绕道湘西，如走陆路，最难是住宿。去旅店住宿，还得先找好停放棺木的地方，因旅店是不可能停放棺木的，有时也只能打开帐篷在野地里与抬夫们一起勉强熬过一夜。在广西我父亲尽力与国民政府当地驻军交涉，军方开了证明信件，告之沿途基层政府关照，也起到些作用。尤其当时老百姓对抗日伤亡人员也怀有怜悯之心，尽管我父亲只身与那些抬棺人及船夫相处，互相原不相识，也没有出现劫财害人的歹意，应该说当时的普通百姓是很纯朴的。走陆路我父亲也很少坐轿，大部分时间是与抬棺民夫一道步行，因此返回时差不

多用了半月时间，确实是一次很艰辛的旅程。处理完小舅的后事，已是临近 1944 年春节。

**欢庆抗日战争胜利。**1944 年春节期间，宁乡师范的校长亲自登门，又聘我父亲去该校任教，于是父亲仍在该校任教一学期。这年暑期，父亲先接到了友仁中学聘书，于是 1944 年秋季开学就去了友仁中学，在该校任教一学期。临放寒假时，父亲高中时的一同窗是鹅山高中的职员来到我家，带着校长签的聘书，力邀父亲去鹅山高中，1945 年春开学后父亲就去了鹅山高中。在该校父亲任教了一年。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约是九月初的一天，鹅山高中开学不久，父亲已去到学校。那天傍晚时分突然听到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我急忙跑出门外，就看到父亲的身影，并听到他高兴地叫喊声：“**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跑着喊着从学校回来。周围的乡邻们闻信也纷纷跑出来观看。父亲在离家还有几十米时就点燃了他从镇上购回的鞭炮，边走边放边喊，像孩童似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我很少见到。乡邻们听到这一喜讯也欣喜万分。当晚村里热闹极了，在我家院坪里舞起了龙灯和狮子灯，好似欢度春节，人们尽情狂欢庆贺。那天晚上，

燃放了多少鞭炮，实难计数，只知道第二天扫集燃尽的鞭炮残灰，有好几箩筐。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大约是 1945 年 12 月下旬，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信息，国民政府所辖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将从重庆迁回南京，处长是父亲的老师谢家荣先生。得此消息，父亲立即致信谢老先生，表示想回本专业工作，不久就收到了谢先生的回信，还寄来了去南京的旅费。1946 年春节之后不久，父亲即赴南京，从此又开始了他的地质探矿工作。此次离开生活了将近三年的乡间祖居，以后再也没有过那种怡然纯朴的乡间生活的机会了。

## （6）父亲南京工作的两年（1946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

**初去南京。**父亲到南京后，最初一小段时间，谢处长先安排他管理一些探矿方面的仪器及物资，似乎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隐约地记得父亲当年给祖父和我母亲的信中，也曾提到对谢老如此安排不甚理解。我当时才八岁，识字不多，父亲信上的字是一笔草体字，从头潦到尾，有时就象一条很长的细绳，曲里拐弯连成一串，很难辨认，我也就看不懂信的内容了。只是听到祖父对母亲说：可能是因父亲离开专业已有

几年，也许是让他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吧。现几十年过去了，已年过七旬的我，在网上查找到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谢老的资料时，有一位我父亲当年在矿产测勘处的同事，已年近九旬的殷维翰老先生，在纪念谢老诞辰一百周年（1998 年）的文章中谈到：谢老所主持的矿产测勘处，是少安排与专业无关的人员的，管理物资及经费等事务性的工作，多是安排技术人员轮流管理。殷老先生也曾管理过这类事务。现在看来，我父亲刚去时干一段这份工作，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现在我在《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中看到对殷维翰先生的介绍，殷先生“1945 年至 1950 年在矿产测勘处工作，任工程师并一度兼任总务课长等职。”也就证实了殷先生所说。还看到王植先生 1940 年起在测勘处任工程师，也兼任过总务课长。

在此书中有一张矿产测勘处全体同仁于 1947 年 9 月 6 日的合影，有我父亲的名字和身影，他坐在前排右起第一，与他同坐在第一排的有父亲常提到的、我很熟悉的名字：谢家荣处长、Davis（戴维斯）、赵家骧、王植、殷维翰、马祖望等先生。后排中有与我父亲一道去西沙群岛勘探的高存礼先生。此张全体同仁合影共 66 人，照片下面的介绍却有八人的名字是用\* \* \*

表示，从此书出版情况说明看到：书是 1997 年征集资料，自 1947 至 1997 年已过半个世纪，几十年的变迁，有人早已作古，已无处寻觅。书中对 1947 年在原测勘处工作过的地质学者的介绍，也不够在当年这帧照片中人数的一半。我父亲 1957 年就已遭劫难，1960 年就亡故了，编书者也就可能难以收集到父亲的情况了。有了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就是父亲当年确实在此工作过的见证。

**西沙群岛勘探。**在南京矿产测勘处工作两年多时间里，1947 年去西沙群岛勘察是父亲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当年我并不知西沙群岛在何处？只记得当时收到父亲一封信，是父亲从西沙返回南京后寄回的。内有一张父亲与一个约十岁的小女孩合照的相片，信上说明是赴西沙时，军舰起航前舰长的家人来送行，父亲见到舰长的女儿很可爱，就与她合拍了这张照片。父亲信中对此次的远行只简单地写了几句，并告之已平安返回南京，盼望能早日收到家中回信。我成年后，每当看到这帧相片，很是感慨，我在想：军舰起航时，看到送行的舰长家人，父亲在想什么呢？他为什么会与我姐妹俩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合照呢？且特意以军舰舰首为背景，用双手扶着小姑娘的肩膀，搂在胸前拍

下的。军舰起航就需在浩瀚的大海中劈波斩浪，路途的艰辛难以预测，我想：父亲是在思念不能来为他送行的远方亲人吧！这帧珍贵的照片原来一直珍藏在我妹妹处，可现在却找不着了，感到很可惜。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回想起往事，便在网上搜索，在搜索有关西沙群岛资料时，看到一则如下文字：“1947年4月，中国政府对西沙群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学术性调查。调查人员中有中央各研究单位专家8人，中山大学地理系、生物系教授等4人。调查团乘海军《中基》号登陆舰于4月3日从上海出发，22日到达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在永兴岛、石岛和东岛共调查了10天。参加本次调查的专家王本莢和高存礼发表了《西沙群岛磷矿》一文。”我看到父亲的名字，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眼中流淌着泪水，但却没有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我继续搜索，又搜索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份1992年第二期《民国档案》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其标题是《国民政府勘察开发西沙群岛的一组史料》。我心中一阵喜悦，立即去电邮南京档案馆询问，能否邮购此份杂志。档案馆工作人员即刻作了回复：邮购此份杂志已不可能，因时间已过太久，但如需此份杂志中某部分内容，可复印寄予。不

久档案馆的一位女士就将我需要有关西沙勘探的文章复印寄给了我。我看到了最为珍贵的内容，一份由我父亲及另一位高姓的人署名的西沙勘测报告，父亲署名在前。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惟一能找到的父亲留下的遗篇了。那位寄来复印件的女士连邮寄费也不需我奉还，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从父亲的勘察报告中证实了网上那段文字中所述，去西沙的时间所乘军舰的舰名等均正确无误。

这篇《国民政府勘察开发西沙群岛的一组史料》中，有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及矿产测勘处领导人员的批件等，我不详述，我只将我父亲执笔的勘察报告抄录如下，因为它对我来说，太珍贵了。下面是父亲勘察报告的全文：

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报告 第五十五号  
西沙群岛磷矿 王本莢 高 XX（矿产测勘处）  
附图壹版（略）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之东南，距榆林港一百七十里，地跨北纬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东经一百一十度十四分至一百二十度四十五分。星棋罗列，为数约二十余，实经人迹履践而得命名者，计十五岛，

别为东西两群，其东群名宣德群岛（Amphitrite Group.），西群名永乐群岛（Crescent Group.），东群所属为：林岛（现名永兴岛 Woud l.）、北岛（North l.）、中岛（Middle l.）、南岛（South l.）、石岛（Rocky l.）、树岛（Tree l.）、林肯岛（Lincoln l.）共七岛。西群所属为：珊瑚岛（Pattle l.）、甘泉岛（Robert l.）、金银岛（Mony l.）、伏波岛（Drummond l.）、邓肯岛（Duncan l.）、掌岛（Palm l.）、天文岛（Observation l.）、南极岛（Triton l.）凡八岛，故海南渔人有上七下八之称号。

此次调查该岛鸟粪磷矿层，乘海军部之中基军舰于四月三日自上海出发，因沿途略事羁延，至四月廿一日始再由榆林港启碇，经一昼夜之航行，至廿二日晨凭舷西望，始见茫茫大海中，有断续一线之小陆地出现，舰沿东群各岛之东侧航行，约三时之久，始绕永兴岛之南端转北，于该岛距西岸一千公尺处下碇，登陆人员，先乘小艇前进六百公尺，改乘小木船再进三百余公尺，然后涉水登岸。

永兴岛（即林岛）为东群中自北而南之第六岛，成不规则之椭圆形，东西宽径约一千八百公尺，南北纵径约一千一百公尺，全岛面积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

尺，为西沙群岛中最大之一岛。岛之西部沿岸约二千平方公尺之一线为空旷地，遗有日人已破坏之建筑物，现因海军部派遣陆战队驻扎该岛，将破屋略事修葺，尚有堪蔽风雨之平房数栋，其余均为浓密之阔叶树林，枝叶交横梗阻，无径可通，树枝极脆，即径达四五公分者，一折即断，巍巍直上，高者可达三丈，无数海鸟栖息其上。地面为海鸟之排泄物，棕黄黑白，因颜色可别新旧，除岛之外围环形部分为沙滩，及上述之空旷部分外，其余地面，均为鸟粪所被覆。

鸟粪之底部全为凸凹不平之珊瑚礁，而凹处部分，如掘去鸟粪，其下即为珊瑚砂所填充。岛之西北部海滩中，有约二十余平方公尺之珊瑚礁出露地面，微向东南倾斜。日人曾在距西岸二百公尺及三百公尺处各凿一井，前者盐分仍高，只可供洗濯用，后者盐分较低，即供岛上驻留人员之饮料。井水之高低，系以海水之潮涨潮落为准。

距林岛东北岸八百公尺处即为石岛，两岛之基部原共一礁，由林岛往石岛须于落潮时徒涉而过，落潮之时刻，并不固定，如先一日为下午四时开始退潮，翌日或推至四时三十分，因朔望之周始而推移其落潮时刻。该岛为群岛最高之一，拔出海面约十五公尺，

岛之全部为海水渗透珊瑚礁所遗石灰质之沉积，层次朗然，面积约六万平方公尺。西北隅陡峭；向东南微倾，其西南岸悬崖，有向东南倾斜约七十度之石灰质层，被同方向倾斜约三十度之层次覆于其上，并于该岛之西北隅高出海面约十公尺处，发现夹有约五公分厚之黄色砂质一层，足征为地壳一度上升之证据，该岛因受地壳变动之影响，引起海水巨浪之冲刷。至所存树木极少，仅有高不及丈之数株而已，因之该岛现已无海鸟栖息，所遗鸟粪，大都为块状，粉状者极少。

由林岛向东南航行二十五里，即为林肯岛，舰沿该岛之西岸海面航行，至该岛之距西南岸一千五百公尺处下碇，登陆人员，改乘小艇驶近该岛南岸距海滩一百公尺处仍涉水登陆。该岛为东群最南之第七岛，面积稍弱于林岛，为西北折向东南之新月形，西北隅因地势较高，置有灯塔，岛上树林不若林岛之丛密。该岛虽经一度被日人占领，现已渺无人迹，即间有海南岛一二渔人往来该岛，亦不过作一两星期之勾留，故丛林中海鸟栖息者为数较多。岛之东南空旷处有一水井，水自珊瑚礁中滤出，盐分大减，可取作饮料。树林地面，全部为鸟粪所被覆。

此次工作时间，凡旬日，几全部消费于林岛。该

岛鸟粪磷矿，自上而下，约可分为四层：(a) 海鸟初所遗失表面为白色，杂以死鸟之尸体及腐烂之落叶，因细菌作用而成黑色，大都隆起堆于高树之下，富含淡质有机质可溶性之磷酸物，因根毛之穿插及本身有机质之粘合而成轻松之块状；(b) 揭去 a 层或在高树根较远之处，即为深棕色之粉末间有成结核状者 (No dules)；(c) b 层之下为棕黄色，表面多孔之块状，混含有白色碎粒，试以盐酸，则起气泡；(d) 最下部则与珊瑚礁接触，珊瑚枝微起磷化作用染成黄色，将碎粉溶于硝酸，加入钼酸亚，亦稍有黄色沉淀，含磷极微，无经济价值。

在林岛槽探凡掘坑十八个，分别以该岛之气象台及东北隅之天文点为起点，攢越横阻之树枝，披荆斩棘而入。兹将各点方向距离，分别以图表列志于后：(略)

林岛鸟粪据接收时报告，日人已开采之面积为原有鸟粪面积四分之一，该岛有鸟粪之面积约为一百三十万平方公尺，各层之平均密度约每立方公尺重 0.7 吨。此次据探结果，平均深度为二十六公分，与朱庭祐先生十七年所调查之结果无多出入，依此估计，则全岛原有鸟粪储量约为二四 0,000 吨，日人已采去六

0,000 吨，现存量应为一八 0,000 吨。该岛原有日人建筑之仓库，现已破坏无余，但遗留一部份鸟粪露天堆集，块状者堆成长方体，高约二公尺，长约百公尺，宽约五公尺，共有矿量约七千吨。另有大小相若之粉状鸟粪四堆，每堆约二千吨，总计日人遗留之矿量约壹万五千吨。

林岛各层鸟粪之层次并不清晰，但颜色自上而下，由深变浅，因化学变化、温度影响及天雨关系，一部分物质因受热而挥发，一部分可溶物质则被溶解而滤出，其残余部分，因风化而成粉状，存留部分不溶解之磷酸钙及其他不溶物，因富含氮质及有机质，常凝结而成疏松之结核状，此为上述之 a、b 两层，即矿床学上所讲原生鸟粪 (Primary Guano)、原生鸟粪层有机质中之草酸化合物 (Oxalates) 及尿酸化合物 (Urates)，均能使第一磷酸化合物 (Monophosphate) 及第二磷酸化合物 (Diphosphates) 溶解而滤出，硝酸物则为更易溶解者。如是除挥发部分外，可溶部份均填充珊瑚礁之凹部，混以珊瑚细砂，凝固而成块状，并因金属矿物成分之增加，渐成棕黄色，即所命名之 c 层，矿床学上所谓鸟粪石 (Guanostone)，其底部之珊瑚礁与鸟粪石接触，微起代替作用 (Replacement)，

但不甚显著，即所谓 d 层，c、d 两层均为次生鸟粪 (Secondary Guano)。在该岛上，上列四层，并非处处逐层存在，因珊瑚礁本为一凹凸不平者，陵谷甚多，有 b 层即直接落于珊瑚礁上者，有 b 层之下即为由棕黄变至白色之珊瑚细砂而缺块状之鸟粪石者，在树林较稀而树身较矮之处，恒难发现 a 层，而与珊瑚礁起代替作用之 d 层，则恐因该岛之鸟粪历史太浅而更罕见也。

该岛鸟粪成分，民国十七年经中山大学分析结果如下：

石岛鸟粪层，已全部被日人开采，其块状鸟粪之颜色，较林岛者为浅，而硬度则稍强。推测其成矿时期，当较林岛为早，日人采出之矿，现仍遗留一部，堆成楔形，长约百廿公尺，宽约十公尺，平均高度约五公尺，并零星数堆合计，当有三万余吨。

林肯岛之鸟粪层所见者，全为粉状，而铺集较林岛者松疏，其分布之深度亦较林岛为均匀。此次曾在该岛之西南隅，掘坑数处，量其深度均为二十三公分。据海军部前进指挥所负责人谈，该岛面积仅稍弱于林岛。若是，则平均深度，以二十公分计算，亦应有矿量二十万吨左右。

此次因限于军舰之航程，仅能在上述三岛登陆，而其余各岛之鸟粪层，当可推论而知其梗概。日人估计整个西沙群岛磷矿，为百万吨，上列三岛，已占其半数，其余各岛，面积均小于林岛，且有环境不适于海鸟之栖息而不见鸟粪者，故其余各岛矿量总和，只能凑及五十万吨之数，故整个西沙群岛之鸟粪储量，当共有九十七万吨。

鸟粪之成磷矿，系海鸟食浅海中之鱼类、头足类、斧足类后之排泄物，此等海鸟，于南北纬各三十度（Horse Latitude）即贸易风流行之区域适于兹，于孳蕃每年至生殖时期（Mating Season）架巢于人迹罕立之海岸式岛屿之树林中，完成其繁殖任务，尤以高海面数尺之环状珊瑚礁岛（Atroll Reef）为最佳之栖息所，因环状珊瑚礁岛，系由栅状珊瑚礁岛（Barrier Reef）徐徐下降而成，基盘较宽，潮水一涨一落，恒遗留一部分海中动物于海滩，可供海鸟之食料。倘此类珊瑚礁岛，面积较大，断续绵延，屏藩海岸，则该岛邻近海岸之边缘高大树林中，海鸟之翔集亦多，因此积年累月，渐堆积而成矿层，沿智利、秘鲁之海岸及印度洋下圣诞岛（Christmas I）等处之鸟粪层，其厚度有达一百尺者。

鸟粪层因时代较晚之磷矿，但鸟类之孳蕃，始于中生代，推想自第三纪后历有堆积，不过因地壳之升沉，而有新旧厚薄之分，如距 Newca-Ledonia 南部一百哩之 Walpole 岛，拔出海面二百一十尺，岛之下面接海处，为一线极窄之珊瑚礁，其悬崖有五个梯层，最上一层积有鸟粪，是为鸟粪成层后地壳上升之现象，倘上升区域，仍保有适宜海鸟栖息之环境，则新陈重叠，厚度益增，西沙群岛之鸟粪，厚度甚浅，不能不释以下列之臆说。

此次于石岛所见，亦有地壳上升情形，业于上述，其他各岛，相距毗连，应同有升沉之可能性，因南太平洋各岛屿，自中生代以迄渐新纪，均在地壳变动过程中，而渐新纪尤为中国玄武岩流最盛之时期，此次在该岛虽未见有火山活动之证据，而接近该群岛之海南岛，其北部海口存有火口之遗迹，又其西邻安南南部之 Cecir de Mer 岛，于最近 1923 年春季犹有海底火山活动之现象，如此则推想该岛珊瑚礁之底部，可能有同样之岩性，并可认为在太平洋地壳变动中之一单元，由是几度升沉而形成今日之珊瑚礁岛，为时甚晚。石岛或先有鸟粪之堆积，一经地壳变动，只余劫后余灰之块状鸟粪，后无增益。林岛、林肯岛

之鸟粪，则为礁岛形成露出海面若干尺久后之新产物，历史短浅，粪层因而不厚，加以各岛面积过小，绝无屏障，常受风浪之侵袭，亦足使海鸟时来时徙，地形之条件不如其他产地之优越，故产量亦瞠乎其后也。

该群岛鸟粪，曾几度倡言开采，今日旧事重提，必先以建筑码头为前者。日人原在林岛西南岸建有码头，现已彻底破坏，仅留遗迹，码头原长四百二十公尺，宽二公尺，其尾端高出海中礁面约六公尺。据去年十一月海军部派人估计，需费廿亿，现当不止此数，其他各岛须建筑码头，总费为数甚巨。各岛之四周，既无高山，复无港口，船舶海面，无法避风，须依据当地气象台之报告，推测判断，在无狂风巨浪之际，乘间停航，运输极为困难。据接收报告所得日人经营时代之残留日记，其中一段记载：“昭和十五年四月中一次，七月初一次，每次约载二千九百吨”。

又据间接从日方调查之确实数字，每年载往日本约七千二百吨，七年间合共在林岛石岛载去五万吨，可见当时称为海军国家之日本，其运输情形，尚且如此，加以当地既无居民、工人之征集，胥赖海南岛当局之强制征召，亦费相当周折。岛上之饮料问题，亦

属难于解决者，即如林岛上日人所凿之井，亦仅足供三百人之饮料。综上所述，对该岛鸟粪之开采，不无困难，日人所以设法经营该地者，以该岛居海南岛、安南、菲律宾之间，当其侵入南太平洋时，以该岛可为中间小规模据点，而采矿为附带事业。今日该群岛与南沙群岛均重入我国版图，同为南海海岸之前哨，与其谓有经济价值，无宁谓有军事价值之为愈也。

以上是我父亲1947年4月去西沙勘察磷矿资源的详细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已看到了当时路途的艰辛。军舰4月3日自上海出发，4月22日才到达西沙海域。文中“因沿途略事羁延”等说明了路途不太顺利，是台风？或是海浪太大？我真难以想象在茫茫大海中的二十日航行，会遇到多少风险。到达西沙后上岛的过程是下舰先登小艇，再换乘木船，还需涉水步行，才能登岸，其登岛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报告中对当时西沙的海洋、气象、地质状况、实际的面积及岛上环境，海鸟栖息的状况，鸟粪的数量及其含磷的实况，都作了详尽的勘察。在当时的国力情况下，如对鸟粪进行开采所需的投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作了较为实际的分析。尤其可贵的是，父亲对日本人当年占领西沙群岛的看法，认为开采鸟粪只是附带的，主要是出于

其军事目的。在他执笔的勘察报告中最后几句是：“……日人所以设法经营该地者，以该岛居海南岛……之间，当其侵入南太平洋时，以该岛可为中间小规模据点，而采矿为附带事业。今日该群岛与南沙群岛均重入我国版图，同为南海海岸之前哨。……无宁谓有军事价值之为愈也。”在六十多年前，我父亲仅是一名地质技术人员，他那敏锐的思维就看到了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西沙、南沙应是我国海防要地，它所属的海洋资源自然也是属于我国的。近几年来一些国家对这些岛屿的关注，正说明我父亲当年看法是正确的，庆幸的是现在成立了三沙市，增强了对南海诸岛的重视。

现在我在《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书中第 176 页看到有 55 号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西沙群岛磷矿（《地质论评》12 卷 5 期）1947 年 12 月 王本莢、高存礼”。也就证实了我父亲确实执笔了这篇报告。

父亲的西沙之行，是近几十年我国一次对西沙全面的勘测。这篇勘察报告已存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这是他的光荣，我为他高兴，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我将珍藏着，伴随我终老。

父亲从西沙返回时，是经由广州再经武汉回南京，

火车也应经长沙市。虽然父亲已离家一年多了，且1946年秋母亲重病过一次，康复不久，父亲是很挂念的。但由于想及时将勘察情况汇报，并没有路经长沙时顺便回家，而是返回南京了。在南京工作的两年里，除这次西沙远行外，也去过江苏浙江的其他地方短时间出差，先后寄回不少用120相机在南京、苏、杭等地拍摄的照片，可是这些珍贵的照片，过去没有很好保存，大部分已丢失，确实使我感到十分痛心，这是我无法弥补的过失。父亲1948年初外派湖南新化锡矿山工作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到过南京。

#### （7）大家庭中的母亲（1935年7月至1948年3月）

**长嫂如母。**1935年夏，我父母在宁乡举办完婚礼，至1943年母亲都是大家庭中长嫂的角色。因父亲还在北大读书，祖父与继祖母另居，母亲与我曾祖父及父亲的四个同胞弟妹居住一处，三叔、四叔尚读中学，小叔小学尚未毕业，哑姑身体瘦弱，在传统理念中是长嫂如母。曾祖父已重病在身，保姆照料老人总难周到，惟有我母亲照料才使老人满意。可想而知，刚满廿一岁的母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让父亲能安心读书，母亲默默地承担着，对病中的曾祖父细心照料，

对叔叔们的衣食也安排得当，三叔四叔正当气盛的年龄，有时还有点小矛盾，母亲耐心劝解。这个多年缺失家庭主妇的家，有了温馨的气象，祖父也放心了。但是母亲因为劳累，孕育的第一胎流产了。

1935 年底，我曾祖父在长沙去世，灵柩运回宁乡安葬。料理曾祖父的后事，母亲又好一阵操劳，加上流产后也未很好休息，待丧事料理完毕，母亲的身体已很虚弱，便留在乡间调养了小段时间。哑姑虽留在母亲身边，但叔叔们已回长沙读书，母亲放心不下，不久又返回到长沙。在长沙家中仅生活了两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南下，1938 年 5 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我和全家迁回了宁乡。1938 年秋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但不久就去到广西工作。这时三叔四叔已相继上了大学，小叔上了中学，他们都住宿在学校。在宁乡的家中，平时就是继曾祖母、哑姑、母亲和我，还有一个服侍曾祖母的保姆。叔叔们假期还回家中，在叔叔们尚未自立门户之前，母亲仍然要为他们操劳。1939 年初，久患肺病的哑姑病情加重，病中全靠我母亲照料，去世后也是我母亲操办后事。1939 年秋我的大妹出生，取乳名“启招”，只活了两个月，据母亲说：一天早晨刚起床时，古式床铺上的一块装饰木板脱落，

掉下来砸中大妹的额头，当时大妹哭了几声又笑了，过后也没有再哭闹，额头上仅留下了少许红印，母亲忙于家务，也未在意，可到晚上突然抽筋，呼吸困难，还来不及请郎中，很快就停止了呼吸。从她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短促的两个月内我父亲还没有见过她。母亲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提及都伤感自责。在离我家祖住房不远处一座小山上，由上而下，从大到小排着三处土坟堆，最上面大坟安葬的是我父亲的生母，大坟下略小的坟堆安葬着哑姑，最下的一个小土堆就葬着那未能长大的妹妹。

1940年底小妹出生时，因家中除继曾祖母和我这不满三岁的小孩外，保姆杨嫂又忙于照料老人，母亲临盆时，竟无人帮手，母亲是自己接生婴儿的，当时她也只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妇，由此可见母亲的胆量和能干。小妹出生不久，我便去外婆家生活。1942年底，四叔回家很短时间，1943年初就离家了。小叔也上大学了。三叔成了家另立门户，因三婶是继曾祖母娘家嫡亲侄孙女，继曾祖母则和三叔两口一起生活。母亲只带着小妹及四叔带回的小周三人的生活，母亲似乎清闲了不少。

1943年春节过后不久，父亲从广西回到了家，约

是三月份继曾祖母就病了，三叔小俩口也有了孩子，要照料小的，服侍老人，显得力不从心，虽还有保姆，也难周到，因而时常发生矛盾。三叔原本身体较弱，心情不好时，就易生病。母亲只得又担当起照顾老人的工作。继曾祖母病卧在床三个多月，约是农历六月底去世，其丧事的办理，如悼念亲友的迎来送往，饮食起居等内务安排，大部分事情还是我母亲在操劳。

时隔不久，和我们同住在烈武湾祖居的大伯祖母又病重了，她三个儿子，其长子虽年过不惑，却仍是单身。另两个儿媳妇中，有一个也是常年有病，自顾不暇。余下的一个儿媳也就显得有点吃力了，我母亲也只得去帮忙照料。

在这同时，居住在王家老屋的三伯祖母也已重病。她惟一的女儿，我的大姑母已去世几年了，虽有四个儿媳，但乡间习俗老人过世后穿着的寿衣寿帽寿鞋等，不能由儿媳缝制。我母亲虽是侄儿媳，但又是嫡亲外甥女，以外甥女的身份可以为舅母缝制寿衣，母亲便为老人家赶制，连续几天在油灯下忙至深夜。我后来听母亲说过：在寿衣等缝制好的当晚，母亲在凌晨才上床就寝，蒙眬中因劳累产生幻觉，似乎有人在翻动缝制好的衣帽，母亲被惊醒，不一会，天刚大亮时，

老屋就来人告之三伯祖母在当晚子时去世。在迷信的乡间，人们传说着是老人的魂灵来取衣帽了。母亲从1935夏与我父亲成婚，至1943年，在这大家庭中对几位病逝的长辈及弟妹们的照料，是尽到了责任的。

在乡间还有一些琐碎事情，如亲朋戚友及乡邻间的礼尚往来；婚丧嫁娶的应酬；已逝祖辈们的生辰忌日及中元节清明节等的祭拜，每年对祖坟的修整等等。祖父很少具体过问，都交由我母亲处理。我继祖母更是从不问津。我亲祖母虽过世多年，但逢年过节母亲仍要准备礼物去祖母娘家探望。祖母的一位同胞兄弟（我称呼舅公），每年都会来我家住上十天半月，祖父仅是与他见见面，具体的食宿全是我母亲安排。这位舅公家境已较困难，母亲每年还需给予一点帮助。总之，大家庭中的长嫂角色是很难担当的。

**母亲的一次重病。**1946年秋，父亲去南京后，原本打算工作安定之后，便接母亲和我及妹妹去与之团聚。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可国内能否和平，并不乐观。1945年9月的“重庆谈判”所谈出的“双十协定”没有实际意义，1946年3月起东北的四平及长春国共两党就已开战。由于当时国内这种形势，父亲就想先等一等，暂缓接我们。

父亲离开宁乡后，乡间家中之事仍是母亲操劳，小家庭中我们三人及张二公仍如继往，平静生活。麻烦是来自外婆家，小舅去世之事，在外婆心里留下的伤痕太深，加之大舅为人做事有时不甚检点，外婆更是伤心。遇到这些事，母亲无人可以商量，只能一人面对，过去大家庭中历年的辛劳、流产、生育三个孩子也没有得到较好的休息及调理，身体已有点虚弱。1946 年秋因大舅之事，过度思虑而引起身体感觉不适，开始只是间或头昏，肠胃不大好，她认为问题不大，没有及时请郎中医治。后来越来越重，头昏已难起床，也不思饮食，严重到病危。乡间只有中医，给母亲治病的是当地有点名气，人称钱三先生的郎中，钱先生认为我母亲并无器质性病变，只是身体太虚。在他将近两个月的精心治疗下，母亲转危为安，并逐步康复。我们全家人对他很是感激。这位中医我还有印象：他家离我家不远，年龄约五十岁左右，穿一件长衫，留平头，落腮胡，文质彬彬，对人和蔼客气。

母亲这次大病之时，原来浓密的一头黑发，变得稀疏枯黄，后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约过了大半年才重新长好一头乌亮黑发。母亲这次生病时没有将实情告之在南京的父亲，她觉得父亲刚去不久，如因此请

假回家，会影响父亲的工作，直到已痊愈，为让父亲相信她已康复，母亲自己执笔写信，才将病况过程及康复情况如实相告。

### **（8）锡矿山的团聚（1948年3月至1949年4月）**

湖南新化锡矿山是抗战胜利后矿产测勘处调查的重点之一，1948年初，父亲被派往湖南新化锡矿山任钻探队长，这是盛产锑矿的地方。父亲到任之后，就决定接我们去锡矿山与之团聚，他让我们从宁乡先到长沙，在我堂姑母家住下等他，待他安排好，就到长沙来接。因他在长沙还需办理一些公事，时间较紧，他就不回乡下了，可节省些时间。

**锡矿山印象。**在我的记忆里，从新化县城至矿山约有三十公里，其行程大部分是山路，上山又下山，连绵几座山，连续上下，当时进出矿山只能是步行或坐轿，有的山路很陡峭，下山时轿身需前后调转 180 度，以防轿身倾斜时，轿内人前倾跌出，抬轿人很是艰辛。

锡矿山当时是四周高耸入云的群山环抱的山谷小镇，小镇上只有一条约三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长度不超过两公里。街道两旁是一些供应日常用品的小店。

沿山脚至半山腰的建筑物是矿山矿务局机关的办公用房、职工宿舍、子弟学校、职工医院、招待所等。我们住的招待所在半山腰上，招待所再上一层石板阶梯，接近山顶处是矿警队住地。招待所往下走约廿米阶梯是职工子弟学校，且是去街道的一个入口。矿山还有一个较大的吸水排水站，可供职工用水，水源来自何处，我就不知晓了。矿山也有发电厂，我们住的招待所内就有自来水、有电灯、有电话。镇上没有营业性的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只有矿务局礼堂周末放映电影，职工俱乐部周末也有舞会。电影对外售票，内部职员也有赠票，舞会则凭单位入场卷进入。

父亲的钻探队是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派来的，相对于矿山矿务局算是中央单位的派驻机构，所以矿务局对我父亲各方面都很照顾，住在条件较好的招待所，这间招待所用房是建在两层山腰上，上一层院内有三幢平房，成U形排列，如站在中间空地，面朝房屋，则进出该院的大门在右边，靠大门的一幢称外幢，此幢房间较少，是几间单间。与此幢相对的一幢称内幢，房间较多，整幢房为筒子楼格局，中间是公共走廊，我们住在内幢。走廊两边各六间面积相等的房间，每间不足 12 平方，另有男女洗涤室各一小间，

住户从同一走廊进出。中间一幢只有两头是前后两间套，其余是单边房间，走廊与前面空地相接，这幢办公用房有多少间房，我不清楚，当时它完全归钻探队作为办公用，那两套前后套间中有一套是我父亲的办公室。办公楼前的空地约不足一个半篮球场大。这三幢房内均无侧所，厕所在房后的山坡上，要上约四米的台阶，因不能冲洗，只好将粪坑挖得很深，下雨天要撑雨伞才可去方便，下雪结冰时，有人铲冰或散上煤渣，如需起夜者有点麻烦。在招待所上一层空地边，有一条约二十级的石阶连接到下一层，还有两幢较简陋点的平房，一是厨房饭厅；一是工人宿舍。整个招待所周围是一圈竹篱笆与外界相隔，上下两层各有一个门进出。

紧临招待所仅用竹篱相隔的是矿务局职工宿舍，好象全是两层的楼房，有多少栋房，不清楚，只见人熙熙攘攘，比较嘈杂。矿务局每周都送来电影票和舞会入场卷。父亲从不带我们去舞会，即便是电影，如他认为不宜我和妹妹观看的，也不会去。记得有一次放美国片，好象片名是《出水芙蓉》，里面有的镜头男女穿着都很暴露，且男女有不少暧昧动作，父亲就带着我们中途退场了。

锡矿山的夏天凉爽，晚饭后父亲常带我们去周围走走。除了沿石阶上山或下山，就是在小街上转悠。因为矿山当时不通公路，矿井采出的矿砂，送往冶炼厂，或已炼成的锑锭运出山外，全是人工肩挑，因此小街上总能看到成队的挑着矿砂或锑锭的工人来来往往。当时在招待所附近看到沿山麓已修了一段、又废弃了的公路，据说是 1946 年夏开工的，后来国共两方和谈破裂，双方战争开打后，就断断续续时修时停，年底只修了约一百多米就完全停工了。我们也常在这废弃的公路上转转，丢弃在路上的压路石碾成了我们休息的坐凳。

锡矿山的冬天很冷，下雪天到处结冰，白天行走都比较困难，因为少有平路，都需上下坡，结冰后很滑，晚上行走更难，因而基本就足不出门了，只能在家围着炭盆烤火。大人们搓搓麻将，玩玩骨牌。我父亲则与技术人员打桥牌的时候多，钻探队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小孩，我们都还在念小学，也不象现在小学生那么多作业压人，晚上无事可做，只好在大人身旁观看。我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初步知道了麻将的简单术语；骨牌“天地人和”比较易学，我基本上学会了；桥牌父亲他们叫牌出牌多数用英语，我听不懂，后来听多

了，也能知道大概意思：如“one spade(一个桃)、two heart(两个红心)、……。”等英语的叫法，也知道了桥牌的一些常识。

**钻探队概况。**父亲带领的钻探队大约有三十多人。在当时我不完全清楚其成员的组成情况。只知道随父亲从南京来的还有两个年轻的男技术员，一位名王基昌，是南京人，家在南京，尚未结婚，他的小妹妹，名字与我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别，且年龄与我同岁，因此他就将我看成是他的妹妹，他口琴吹得很好，总喜欢和我开玩笑。另一位名刘焕章，他家在河南，妻子是四川人，是抗日时期测勘处当时在重庆，他们相识，1946年结婚。其他还有两位工程师，一位姓农，约三十多岁，是负责岩芯化学分析的，他夫人身体不好，没有孩子。这些人和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同一幢平房内，都是开房门就能相见的邻居。另一位工程师，年岁较大，可能有五十岁左右，他是负责给打钻用的钻头镶上金刚石这一工作的，我称呼他发伯父，我想应是姓发吧，我不知他住在哪儿，也未见过他的家属。有一位姓黎的负责公文电讯等往来的，约三十岁左右，他是从矿务局过来的，妻子特爱搓麻将，常和几位兴趣相投的太太来招待所找我母亲玩，因为我们住地有空

房，正合她们玩麻将，他们住在矿局宿舍。还有一位姓艾的中年人负责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原就是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矿务局方面就安排他料理钻探队人员的食宿等事。因为这位艾伯父脚有残疾，矿山的道路多是上下坡，我父亲见他行动不便，对他很照顾，有些外出的事，尽量不让他去。我就读的子弟小学，见到有一位艾老师，和他长相一模一样，更为奇怪的他也有一只脚掌是脚尖在后，后根朝前，即转了 180 度，我向父亲谈到过这件事。因为艾伯父平时的穿着很简朴，给人的感觉是家境可能很紧迫，父亲以为艾伯父又在学校兼了职，父亲便询问矿务局，才知道这两人是双胞胎兄弟，但一人是左脚掌，一人是右脚掌，钻探队的同事们都感到奇怪。如是有人善意地调侃：说是双胞胎兄弟俩在娘胎中打架，互相将对方的脚掌拧反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及工人们的情况我不清楚。在我的印象里，那时不曾听说有书记、政工、人事等部门，也没有什么专职的行政职员。

当时有两部钻机在两处进行着钻探，在招待所旁不远处就有一个钻探孔，我常去观看，与现在电视里看到石油钻探有区别：当时是用美国产钻机，结构紧凑，体积很小，虽钻塔也很高，如不是狂风暴雨天，

一般情况工人在钻棚内不会被日晒或雨淋，冬天钻棚内可用碳盆来取暖。钻棚外有一个泥浆池，有一台泥浆泵向钻孔内注入泥浆，泥浆的作用，是否冷却钻头，我不知晓。钻孔时有两层管，内管小，外管称套管，泥浆可能是在两管之间流入。钻到一定的深度，起钻时，从小管中取出一节一节的岩芯，按顺序编号摆放在有格的木盘里，对岩芯进行分析，就可得出地层结构及矿藏的情况。如不出卡钻及钻头或钻管脱落等事故，父亲工作不是太忙碌。在我的记忆里，好象出现过一次钻头脱落事故，我听到父亲和清华实习的学生谈到过这次事故，我听不太明白，只记得好象说：地层很坚硬。1948年这是我近距离了解父亲工作情况难以忘却的一年。

现在我在《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中的第368页中看到1948年当年测勘处对全国钻探队工作的描述：“本年度本处共有七个钻探队，分在皖湘桂鄂台五省内工作。……淮南煤田的钻探……因时局紧张，全部员工撤回南京，所以在本年底只有湘江、锡矿山……钻探队尚在继续进行。”书中附有一统计数据，锡矿山探矿队：钻机数目是2台、钻进公尺：290.3、开钻以来总进公尺：341.0。还有一段特别对1948年锡矿山

钻探工作的描述：“锡矿山锑矿钻探工作，从去年（1947—编者）底开始迄今因为矽化岩层质性坚韧，钻进困难，停了好几个月，后来向美订购，黑钻石及 plug Bits 寄到，才重新开钻。迄年底（注：指 1948 年底）止第 1 号坝塘山钻眼共进 190.2 公尺，在 189.6 公尺处遇到矿层，计为花砂 0.1 公尺，内夹青砂 5 公分，详细成分正在化验中。……查第一号钻眼距含矿层背斜顶点达 800 公尺，今竟探到青砂，其意义殊为重大。”这应该是父亲 1948 年在锡矿山钻探队工作时，所取得的成绩。

约是当年（1948 年）的农历七月初，三位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来到钻探队实习，是由南京勘测处介绍来的。我父亲就根据他们实习所需内容，承担一些指导工作。他们在矿山呆了两个多月，我母亲见他们是三个年轻学生，在生活上也给予了一些照顾。我转学到矿山小学是读六年级，学校的老师讲课是讲新化县方言，我听课较吃力，因而算术中的应用题有点困难了，他们见我父亲忙时，就主动给我辅导。三人就像是大哥哥。父亲在与他们交谈时，知道他们中有一人是 1945 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当年也属清华学生，另外两人是 1946 年西南联大从昆明回迁、三校分开

后，考入清华大学的，十年前我父亲是西南联大地质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应该说我父亲与他们也算是师兄弟。三人与我家相处十分的融洽，他们离开矿山后，还有一段时间与我家有通信，可能是至 1949 年夏之后，他们先后毕业已离校，当年九月我父亲也离开了锡矿山，以后就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名字是：李振堂、柳贺昌、龚念祖。我现在《西南联大校史》一书中看到，1945 年西南联大地学系入学学生名录中，就有龚念祖。他们来信中还寄有清华大学校园内几处的相片：原校门“清华园”、“大礼堂外观”、“荷花池”等，其中还有一张是李振堂靠在一只石狮子前的照片，这些照片还保留在我的相册内。他们如健在，也该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

因为钻探队使用的是美国长年公司的金刚石岩心钻探机，约是 1948 年 8 月，南京测勘处电知我父亲，一位维护钻探设备的美国技师要来钻探队，让我父亲前往长沙去接他。父亲立即下山前往长沙市，接到了一位年近花甲的美国人，随行的还有长沙办事处为他雇用做西餐的厨师。这位美国老人很和善，我们称呼他戴维斯（Frank Davis）爷爷，他只能说和听懂如“您好”、“谢谢”、“是”或“不是”、“早安”、“晚安”

等简单的中文，他和他的厨师之间的交流也是用手势带面部表情连比带划来完成。配给他的翻译只送他到长沙，从长沙到矿山后，我父亲就成了他的翻译了。从他到钻探队之后，在清华三位学生未离开矿山时，他还多几人说话，晚上他们也常在一处打桥牌。清华学生离开后，我父亲除和他一起工作外，业余时间也多陪伴他聊天，因为其他几位技术人员英语交流也有点困难，总不能将他晾着不管吧。他来矿山原本是呆两个月，在与我父亲的相处中，父亲认为他的年龄与我祖父差不多，将他作为长辈来看待，在不长时间内，两人就由相识到相知。他告诉我父亲：他只有一儿子，是飞行员，后来加入了陈纳德的援华航空队，运输援华物资时，在飞越中缅边境的驼峰航线上不幸牺牲了。儿媳妇已另外成了家，有两个未成年的孙儿孙女与他老伴生活在一起。我父亲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当年的中秋节，我母亲下厨做了几个菜，请他和钻探队中几位单身职员一起来聚餐，共度中秋节。美国老人按原定时间很快就将离开矿山返南京。当时国共两方在东北已经大打辽沈战役了，也许战争离矿山还很远，锡矿山却还是一片宁静的“桃源”。在老人即将离开矿山的头两天，他突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向我父亲提

出了两要求：一是让父亲先电告南京他暂不离开锡矿山，至于什么时候走，视情况发展再决定；二是让西餐厨师回长沙去，他不用厨师了，要和我们一起吃中餐。父亲有些不理解，老人说：和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又让他重温了家庭的乐趣，不想这么快就离开。父亲请示南京的答复是：尊重老人自己的决定。于是让西餐厨师先走了，老人家就随我们吃小灶，我母亲也常下厨为他做点菜。直到 1949 年元月，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均以国民党战败而告终，蒋委员长也宣布已隐退。当时的南京已风雨飘摇，戴维斯老人不可能再推延了，他便力邀我家与之同行，由他办理出国手续，一同赴美国。我父亲只得耐心地向他解释，不能丢下探矿队的工作，一走了之，以后还会有机会相见的，父亲便亲自送老人至长沙办事处。

现在我在《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书中的第 77 页中看到刘汉先生所写《矿产测勘处开展油压钻机金刚石钻进的经过》一文中有如下描述：“……大概是 1947 年 5、6 月间，一天在公司的明城工厂内，一位负责人引我到钻机试验台上去会见一位老工人，名戴维斯 (Frank Davis)，是公司应测勘处之请，即将派往中国工作的钻探顾问。他时年 57 岁，看来身体很好，

干钻工已 30 多年，……，后来，他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多，……，在协助中国开展金刚石钻进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 1947 年测勘处同仁的合影中有戴维斯在内。这也证实了我对当时情况的记忆。（注：明城是指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城，戴维斯老人是长年公司技师。）

**母亲在锡矿山。**1938 年母亲离开长沙回乡间，至 1948 年，在乡间已居住了十年。这次父亲接我们到锡矿山，是母亲第二次离开生她养她的故土，也是第一次去到父亲工作的单位，入住单位的宿舍，与十年前在长沙居住在街道自家的房子，毕竟有差别。因为日常交往的是父亲的同事或下级职员和工人，还有当地矿务局的职工和家属。女职员及眷属中有不少是知识女性和见多识广之辈，我母亲虽是一个识字不多、且长居农村的家庭主妇，但她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待人接物交往礼仪与他人相比毫不逊色，彼此相处很融洽。过去在宁乡乡下没有人编织毛线衣物，母亲也不曾编织过，在矿山母亲与那些太太们相处，很快就学会了，而且织得还象模象样。很快又学会了做一些常食的西餐食品，西餐厨师离开后，我母亲间或还是给美国老人做点西餐，调剂一下口味，美国老人十分高兴，直点头称赞。对钻探队里单身的年轻职员，我

母亲很关心，如衣服扣子脱落了、缝线裂开了，只要母亲知道，总是主动帮他们整理好。职工有病，吃不下食堂的饭菜，就亲自下厨给他们做点适合病人吃喝的食物，因此钻探队里的职工对我母亲很亲近。

有一件事使我记忆很深刻，蒋委员长隐退及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结束都是在 1949 年春节的前后，春节过后几天，父亲送戴维斯老人离开矿山时，钻探队里发生了晚上工人煤气中毒的事件。由于矿山天气冷，工人们在宿舍烧起了火盆，且门窗关得太严，父亲在家时常去工人宿舍走走，提醒注意安全。父亲不在家，母亲一女性，自然不方便去到工人宿舍区。那天晚上一工人因在另一处聊天，回宿舍较晚，当他打开房门时，闻到煤气很刺鼻，再看三张床上的人，都已昏迷了。他急忙出来叫醒其他人，大家也着了慌，于是有人来告之我母亲，母亲沉着地让人打开房间的窗户，并让人帮躺着的人快穿好衣服（工人们多是裸身睡觉），以免受了凉，但领口不要扣，让其呼吸能畅通。还让人马上电话告之职工医院急速派医务人员来救治。因发现早，中毒还不深，三人均是浅度的昏迷，没过多久就都缓过来了。有一位年近五十的情况比较差，送到医院住了几天，也康复了。父亲回来后，听到钻探

队职工谈及此事时，对母亲的一片赞扬声，确为母亲而高兴。母亲却说：不怕是假的，腿都软了，但不冷静行吗？总算未出大事，真是老天保佑。这件事后，钻探队和矿局的一些人对我母亲很佩服，有人说：想不到从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一位家庭主妇，遇到这种事，竟能如此冷静的处理，尤其是那些太太们，更是赞不绝口。那三位获救的工人，也是心怀感激，随后不久在母亲带我和妹妹离开矿山时，他们赶来含泪送行，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们一路平安。

**告别锡矿山。**1949年3月，解放军已集结长江北岸，矿山也不平静了，人心开始浮动，不久就开始宵禁，每天都有矿局方面的人给父亲送来出入矿区某些处所的通行口令。三月中旬就动员疏散家眷，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于四月初就离开了锡矿山，返回宁乡老家了。和我们同行的有刘焕章夫妻，因刘妻已怀有数月的身孕，父亲就让刘亲自陪伴，也委托他在前往长沙这段路程上帮助照顾我们母女。父亲也安排了我们沿途行程及住宿。我还记得新化县城有一杨姓人家，是当地的名门，老主人1938前在长沙与我祖父很熟识，其儿子与我父亲是读高中时的同窗，当时在长沙锦品厂任职。我们下山到新化县城后，就住在他的家

“杨园”(这是一座较豪华的别墅)，等待由杨家儿子安排铤品厂的汽车来接我们到长沙。到达长沙后，刘氏夫妇安排在长沙办事处招待所，他们和我们就分手了。我们母女则住在我堂姑母家，由姑父送我们回宁乡。

1949年4月初母亲带我们姐妹离开锡矿山之后，父亲在锡矿山也接到了南京方面的指示，钻探队暂不撤回南京去，就地坚守等待形势的发展。四月中下旬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进驻了南京，对于锡矿山钻探队，南京方面自然就无人过问了，一切已交由长沙办事处处理。父亲也不可能放下队里的几十人，自己也无法返南京，只能留在矿山与队里其他人共同坚守着。八月初湖南和平解放后，锡矿山矿务局及父亲主持的钻探队由解放军接管，父亲作为技术人员留用，九月中旬离开锡矿山前往长沙集中进学习班。十一月父亲结束了学习，安排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稍作安顿，就回宁乡老家接我们到长沙安下了家。未曾料到我们这次离开宁乡祖居后，再也没有回去的机会了。1949年初，我已小学毕业，因当时的形势所限，在家辍学将近一年未能上初中。1949年11月底到长沙后，1950初我考入了当时的私立明宪女子中学(现长沙市第十五中学)读初中。

### （9）温馨的长沙岁月（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

1949年11月，我们到长沙后，先住在小吴门外堂姑父家。因父亲上班的地点是在南门外的原六铺街，与姑父家相距很远。我考上的女子中学当时也在六铺街附近，春节过后，父亲就在南门外距他上班和我上学都很近处租了住房，我记得此处是青山祠9号。在这里住了约四个月，约是五月份应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之邀，与他家合租一处有小庭院的平房，此房是沙河巷7号，是民国政府时长沙市警察局南区分局局长的住宅，这位局长房子建好还未入住，长沙就解放了，这位房主也被送去“学习班”了，因此是一处新房。李教授将它租下了，李教授是父亲在湖南省一中时的同窗。青山祠与沙河巷这两处虽街名不同，但却是一条街拐角的两边，两房是隔街斜对门。离这住房不远有一所属长沙名校的私立小学——“幼幼小学”，妹妹就上了这所学校。

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国家平静了，“伟大领袖”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对党外知识分子还有点照顾，那时父亲的心情是很舒畅的，认为从此他可以很好地发挥自

已的专长了。如果他不出差，工作之余，晚饭后就带我们去街上走走。当时长沙的小街道不少是条石铺成，有时走在上面还可听见石板下面下水道内哗哗的水流声，父亲称这种散步为“数麻石”。

夏日的晚上，天气炎热时，父亲就领全家去“天心阁”上的茶社。沏上一壶茶，品着香茗，俯观街上霓虹灯闪烁的美丽夜景，仰望浩渺无际的夏夜星空，这是父亲最舒心的时刻。他给我讲到：当年我曾祖父任职过的城南书院就在天心阁城墙下。“天心阁”原名为“天星阁”，一种说法是正对应天上“长沙星”而得名，曾是古人观测星象，祭祀天神之所。因近城南书院，旧时有不少文人来此登阁远眺，吟诗作赋。原在城楼有“天心”与“文昌”二阁，并取清代黄兆梅所作“四面云山皆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作对联。1938年“文夕大火”“天心”与“文昌”二阁均毁，只有一块“天心”的匾额留下。后在“文昌阁”遗址旁兴建一阁，便称为“天心阁”。父亲重复几遍黄兆梅的这两句诗，还有明代李东明的“水陆洲洲系舟，舟动洲不动；天心阁阁栖鸽，鸽飞阁不飞。”我觉得有趣，且水陆洲这个湘江中的小洲，是长沙宁乡之间我们往返时，乘小木船过渡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几句诗我至今

未忘却。夏夜每次去“天心阁”，那徐徐的晚风吹去了热浪，感到浑身凉爽，都不想回家了，父亲便说，下次再来吧。当时我家住地离“天心阁”不远，步行约十多分钟，从家门约走出二十米小巷，再过约六十米左右的一条名为社坛街的石板小街，就到了南门口，向右拐就上了城南路，不远处就是“天心阁”了。现在尽管已过去六十多年了，当年街道的格局及一些印象较深的地方，还一一留在记忆里。如社坛街上当年妹妹就读的“幼幼小学”、一所天主教堂，周日一群孩子跑去做“礼拜”，实际是凑热闹，骗点零食而已，妹妹也常随同学去。公安局南区分局附近有一家稍有规模的照相馆，1950年10月底，父亲调往武汉中南区工作时，我们一家四口就是在这里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四口惟一的一张合影，现在每当看到这帧弥足珍贵的合影，心中的感慨，无法用言语表达。

父亲也带我们去过一次岳麓山游玩，当时没有湘江大桥，我记忆中是在原称为六铺街的渡口乘小木船，过一次渡上岸先到橘子洲，再乘一次木船上岸才是岳麓山，当时上山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一天没玩多少地方，就很累了。拜谒了辛亥革命元老黄兴、蔡锷的坟墓，就想停下来休息了。这时父亲边走边谈起

了国民党将领张辉瓒的故事，父亲说：“张的墓也在这儿，1930 年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在龙冈被活捉，1931 年被砍头，头颅装进竹笼丢在江里，后在吉安附近发现捞了上来，因为没有身躯，就用楠木雕了一个配上，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蒋介石还为墓冢题了‘魂兮归来’四字。你们还去看吗？”我们都走累了，当时也认为是反动军人的墓，就不想去了。

在下山路经一处不完整亭台时，就停下来休息，父亲说这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毁的“爱晚亭”，就给我讲有关该亭的大致情况：此亭是乾隆年间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创建，原名“红叶亭”，与安徽的“醉翁亭”、杭州的“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亭，又名“爱枫亭”。父亲还说后根据杜牧的诗更名“爱晚亭”。当时父亲念了这首诗，可我已走得很累了，没有注意听，印象不深。2002 年我去长沙时，也去了岳麓山，这时的“爱晚亭”与 1950 年相比，已是另一番景象：“爱晚亭”三字的手书及亭内碑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已赋有新的历史意义。我又想起父亲当年说的杜牧的诗，便找到了这首诗，唐代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想应是取第三句中的“爱”与“晚”两字吧。

在长沙那段时间，周末父亲还带我们去看京剧。我记得当年京剧院是在黄兴南路附近的一条小街上。父亲对京剧情有独钟，尤其是梅派唱腔中雍容华贵呈现喜气的剧目，如《贵妃醉酒》、《凤还巢》、《龙凤呈祥》等。以旦角为主的剧目，荀派因其大都以花旦为主，多为小家碧玉，少了些雍容华贵气质，父亲也看，但不是特别欣赏，如《红娘》、《游龙戏凤》、《金玉奴》、《花田八错》、《杜十娘》等。程派唱腔的剧目也看过《汾河湾》、《武家坡》、《四郎探母》、《玉堂春》、《锁麟囊》等。而须生戏，则不论马派、麒派、谭派、言派等各种流派他都喜欢。因母亲文化不高，以前基本没机会看京剧，父亲让她能听到各种流派的唱腔及看到表演风格，以增长母亲的见识。

我对京剧的喜爱也是受父亲的影响。但随后的时间看京剧的机会越来越少，接踵而来的是“帝王将相要赶下舞台”，传统京剧已是封建糟粕，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反映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其实历代帝王将相也有出身贫寒的，如刘邦、朱元璋就出身农家，后皇袍加身，就成了统治者。也有一些草根出

身，后成将相，都成了被赶下舞台的对象。可京剧的服饰、程式、对白及唱腔的文绉绉、台步的慢方步等要改成现代的工农兵也非易事，真给各流派名家出了难题。不少名家也随着历次运动消声隐迹。1957年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已没有机会观看。再后来能看到的也就是“旗手”策划的不知属何流派的八个样板戏，不用购票，不论是否有兴趣，广播及电视中都可听到看到。

1980年之后，传统京剧逐步重现舞台，现在如央视戏曲频道有原名家的声像配和现在名家的演唱，我还是有兴趣观看的。但在观看时，又总会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日子，心情很复杂，有时会感觉父亲仍在我身旁，当意识到是幻觉时，我的心一阵痛楚，难以控制住满眶热泪。

沙河巷7号只住了我家和李教授一家，他任教于湖南大学，他是我父亲高中同学。后留学美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他老家好像是邵阳的，原也是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妻子是广东人，在位于六铺街的长沙油脂公司任财务，是侨属。他们有两个孩子：当时女儿四岁、男孩不满两岁。雇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唐姓保姆。因当时还没有湘江大桥，李教授不是每天都能回家。

他有一位兄长与他同住，也是留美的，我们称呼他大伯父。他 1948 年初回国时，已年过不惑，仍然单身，后遵父命迎娶了一位传统家庭文化不高，已年过三十的姑娘，好象姓秦，称呼她大伯母。当时她已怀身孕，最不理解的是当她分娩时，俩口子都不肯去医院，一定让我母亲帮忙接生。这可让我母亲为难了，因为她也算是高龄初产妇，万一不顺，如何了得。我们原住的青山祠 9 号有一位邻居，原当过护士，母亲只好请她过来帮忙，好在分娩还算顺利，生了一个男孩。我们两家相处很融洽，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一个大家庭。大伯父没去工作，小院里的清扫及花花草草的打理，他全包了。保姆唐妈带孩子又做饭，忙不过来，我母亲就帮忙。按年龄，唐妈比我母亲年长，李家妯娌都比我母亲年轻，因此她俩都称呼我母亲为大姐。周末李教授在家，如父亲也不出差，肯定是两家一起聚餐，他们三位男士和李教授夫人四人也打打桥牌。在长沙居住的这一年多，与以后数年我家的境遇相比，这段时间父亲心情是最舒畅的，与锡矿山相比，长沙毕竟是省会，购物游玩等也方便很多。

在这段时间里，可能是在学习班里听到新政权对建设新国家的宏大规划，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肯定和承

诺，父亲很信服，他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和激情。他有三个高中时要好的同窗，因原家庭都较殷实，已赋闲在家两三年，有两人我记得是原中央大学毕业，一个是学经济的，一个是学英语的；另有一名是北京大学学经济的。当时长沙正发布民国政府时期各类赋闲人员登记，再集中学习后，安排工作。父亲就去做他们的工作，动员他们去报名，后来他们都安排了工作。学经济的左伯父和学英语的缪伯父当了教师，（我现在《西南联大校史》中 1939 年经济系毕业学生名录上，看到了左伯父的名字。）“左”安排在中专，“缪”安排在中学。另一个学经济的易伯父去了贸易部门。在与李家大伯聊天时，父亲问及他今后有何打算，是仍去美国？或留在国内。如留下，不妨也去报名试试，后来李大伯也去登记了，安排在什么单位工作，我不大清楚了。

#### **（10）武汉的五年（1951 年 4 月 1956 年 4 月）**

对父母来说，这五年的经历是有欢乐，也有痛楚的五年。

**武昌乾福巷 9 号和 2 号。**1950 年 10 月父亲调武汉之后，当时的中南重工业部钻探总队开始组建工作，总队办公地点在汉口江汉一路的一座大楼内的第四层，这座大楼外的正门口悬挂的牌子上书“中南军政

委员会重工业部”。父亲住在洞庭街的集体宿舍。因父亲还需出差中南地区所辖的六省了解各钻探队的情况，工作较忙，无暇顾及我们迁来武汉之事，我们母女三人还留在长沙。我记得当时湖南常宁水口山钻探队是父亲负责的重点，因常宁铅锌储量居全国第一，父亲去常宁的时间多，从武汉去常宁往返经长沙，也就常有回家的机会，我们母女在长沙居住条件也不错，就暂时未将我们迁往武汉。直到1951年4月下旬，父亲的工作稍有了头绪，才去租房，准备接我们去汉。但在汉口很难租到房子，后来是在一位居住在武昌彭刘杨路上一条小街内的同事帮助下，在该巷租一间约11平方米的民房，我记得是乾福巷9号（那位同事住在该巷17号），作为我家住房，将母亲和妹妹在五月一日前接到了武汉。那时长江两岸还没有桥，汉口与武昌之间只能是轮渡往返，父亲不可能每天回家，只能每周三和周六回来，他仍在汉口住集体宿舍，吃公共食堂。汉口与武昌虽仅一江之隔，也只能是一家两处，成了短距离短时间的两处分居。而我一人还在长沙住校，直到学期结束，七月初放暑期才来到武汉，秋季开学后，我转学至武昌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继续读初中。

谈到我们在武昌的住房乾福巷 9 号，一间 11 平方米空间内，四张条凳上搁两块门板就是一铺宽约两米的床，我还未来武昌时，如父亲不回家过夜，这铺床是母亲和妹妹两人睡觉之处，父亲回家的晚上，妹妹则睡一张行军床。室内还有一张三抽桌、一张可折叠的直径约八十公分的小园桌、四张小板凳。紧靠床头，靠墙有一木架，架上放着盛衣服等用的箱子，除此之外，已别无他物。我来武昌后，父亲如在家，行军床睡不下我和妹妹，父亲只得又购回一块约 1.2 米宽的门板，晚上就搁在四张小凳上，就是我和妹妹的床，晚上需关上房门才搭床，早上先搬开门板，才可能开房门。这间房，顶上没有天花板，四周墙壁斑驳，这就是一个高级技术人员简陋的家。我记得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两位同窗好友，白家驹和吴磊伯，1951 年约是 7 月和 8 月先后出差武汉，老同学相见，父亲特别高兴，邀请来家叙谈，并招待吃饭，可连坐凳还不够五张，房间窄得难以转身，他们都惊愕了。与在长沙时的住所，真是无法相比。

约是当年的 9 月，乾福巷 2 号有户肖姓人家，男主人突然被逮捕，家中老小及妻子五人经济上难以为继，他家住的是一大间房，约超过 20 平方米，已用木

板隔成前后两间，肖家提出与我家互换住房，我们搬过 2 号，房子宽了些，无需晚上搭、早上拆床的麻烦了，但家俱只添了一张武汉人用来乘凉的那种可睡可坐的单人竹床及一张藤椅。在这乾福巷 2 号，留下了我们一家永不会忘记的伤痛，就是上文提到的“三反”中父亲所受的冤屈，而导致母亲孕育着的小弟早产夭亡。但在这里也使我们一家与邻居们结下了深厚而难以忘却的友情，我们在此居住至 1953 年 7 月，搬离时难舍难分。

**初到武汉的第一年。**尽管住房不宽，只要父亲不出差，周末一家四口能团聚，加之父亲在工作上，他自己感觉虽然忙碌，但很有收获。且当时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照顾，配给父亲一辆德产“三枪”牌自行车，这在当时的单位里，也算是一种不平常待遇了。尤其不久得知母亲有了身孕，因而心情比较愉快。记得当年我们一家约是在八月底去过一次珞珈山，父亲告诉我，武汉大学就在这里，我们坐公共汽车就是在一座上书“国立武汉大学”的门楼前下车，沿阶而上，就见到学校的校舍，使人记忆深刻的是有的房屋沿山坡一层一层而建，这是学生宿舍，每层宿舍取名为“XX 斋”。为什么称为“斋”，当时仅读初中二年级的我，

有些不解。父亲说：“斋就有房舍的意思，书房就可说是书斋，学生住的宿舍就是书斋，可能是由此而命名吧。”父亲还说：他报考大学时，当年武汉大学也有地质系，地质学家李四光当时就在武汉大学工作，不过北京大学是他的首选。父亲又说：“几年后你考大学时，如不想离家太远，也可报考武汉大学。”当天我们还游览了东湖，坐在湖边，一边吃着自带的食物，一边欣赏湖光山色，很是惬意。

约是当年的国庆节，父亲带我们去汉阳的“归元寺”，我记不清楚是坐轮渡，或是乘木船过江，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汉阳街道很窄，房屋也比较陈旧，少有高楼大厦，汽车也很少，我和妹妹在寺中好象数过罗汉，母亲则点上了香烛，虔诚跪拜了佛祖，我当时不知道母亲在祈祷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在求佛祖保佑她腹中孕育着的孩子平安出世吧。

我家的住地离蛇山不远，出家门约 20 米就出了小巷，上了彭刘阳路也约是 20 米，就到了当时武昌第一热闹的街口（解放路），走不多远，就是司门口天桥，由此就可上到蛇山。当时的黄鹤楼离江边很近，夏日的周六晚，父亲若在家，也去过，但次数不多，这与父亲常出差有关，即使不出差，每周也只是两三个晚

上在家住宿，上下班早晚来去匆匆赶轮渡、而在家时间较少。我记得第一次去黄鹤楼，站在蛇山上，可看到波涛起伏的长江。父亲曾告诉我，武汉又称为江城，其来历是由李白一首诗中得来，父亲念了这首诗，但我当时记不了全部，只记得最后一句中有“江城”二字。现在我查到这首诗是《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原诗是“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父亲还念了几首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如李白的另一首“故人西辞黄鹤楼，……。”及崔颢的《黄鹤楼》等，这几首诗后来在高中语文课本中我曾读过。而父亲当年的背诵，也在我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1年，我到武昌之后，第一次去汉口是这年的八月份，我考完插班考试之后，父亲出差湖南常宁水口山回家来，可休息两天，便带我们去了汉口，先去到 he 工作的地方，与同事们打了个招呼，笑问有什么事是否需及时处理。这是我第一次去到他的办公室，一间约十平方的房间，一侧是一个文件及资料柜，另一侧是岩芯陈列柜，那布局我现在还未忘却。

随后就带我们沿着中山大道走，在一家小饮食店买了武汉人称之为“烧麦”的小吃，然后去到民众乐

园，这里有耍杂技的、玩魔术的、唱戏的等各种娱乐的大集汇，但当时使我和妹妹最感兴趣的是第一次见到的哈哈镜，站在镜子前的人，看到自己在镜内的滑稽模样确实忍俊不禁。从民众乐园出来，天色已晚，走过三民路瞻仰了孙中山先生铜像，便在民生路上一家餐馆，要了四碗面条，我记得有冬菇面和牛肉面，每碗数量都不少，母亲、我和妹妹都吃不了，最后可能剩下了一碗，当时餐馆还需按客人食物的数量收取小费，我第一次听到“堂彩加一”这个名词。母亲当时就说：“知道是这规矩，少要一碗，既不浪费这碗面条，还省了点小费。”父亲笑着说：“难得在外面吃餐饭，就不算这细帐了。”餐后再民生码头乘轮渡返回武昌的家，母亲可能累了，可我和妹妹毕竟是孩子，似乎意犹未尽。我对哈哈镜使人变形感到不解，便问父亲：为什么哈哈镜会使人变形？父亲说：“是因镜面凸凹不平造成的。”1952年初我升入初中三年级，有了物理课程，我对凹凸镜成像的原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三反”之后的四年。1952年“三反”之后，父亲因精神上的伤害，性格有所改变，没有以往乐观了，即是不出差也很少带我们外出，我记得只是在他结束审查在家休息时，他青年时代的那位学经济的、原在

长沙贸易部门工作的好友易伯父，1952年初他也来到汉口中南进出口贸易公司，租住在民生路一小巷内的湖南会馆，他邀请我父亲去他家散散心，我们一家四口在他家吃了午餐。他家离民众乐园不远，见父亲与易伯父聊得专注，我和妹妹也只好与易家孩子在楼下玩耍，也就没有再去民众乐园这好玩的处所。

还有两次全家外出是父亲单位组织的。一次是1952年约是八月，父亲单位“三反”已经结束，组织部分人员去东湖游玩，并可携带家属。也许是庆祝运动胜利，嘉奖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或还有象父亲这样被冤屈人员，表示慰藉？可能两者都有吧。另外，当时也有内部传言，地质系统机构会有变动，单位有人想：有关活动经费不用不亏吗？何不以组织职工活动的名义去郊游一次呢。我父亲及我们一家人也得到通知，由单位提供中餐食品及往返车辆。依父亲的性格他本不想去，是母亲说服了他，不去不妥。运动中使坏的只是少数人，始作俑者已调离，多数人对父亲还是很好的。在东湖游玩一天，我和妹妹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但我见父亲却兴趣索然，多数时间是母亲陪着在湖边漫步或坐在树荫下歇息，只与母亲交谈，与他人很少说话。遇到他单位的人，也只是客气地微

笑着点点头，表示招呼。

另一次是 1952 年秋的一个周日，记不清具体月份，但已是穿着秋衣的时节了，活动时还有发热需减衣服的印象。父亲单位通知：全体职工携带家属去汉口中山公园观看土改展览。工会提供中餐食品，交通自行解决，上午 9 时半在公园门口某处集中，按名册分发食物，不得无故缺席。这是硬性规定，因是阶级教育的课堂，职工本人是不能缺席的，我想家属如果缺席又能怎样？不过我们一家四口规规矩矩地按时报到了。这个展览是以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为重点，还有其他一些认为剥削罪行较大的地主劣迹，记不清有多少个展棚了，干部职工及家属老老小小排队跟着单位领队走，一个个展馆看，中午集中休息吃了分发的食品。我记忆中一些上年岁的干部和家属已是昏昏欲睡，但教育还得继续，参观完之后，将近下午五点才走出展馆。大多数人已是精疲力尽，宣布各家可以自由安排了。父亲叫了两部三轮车，直拉到江边码头，过江回到武昌上岸后，母亲说回家自己做晚饭，父亲担心母亲太累，就在民主路上一家餐馆吃了晚饭，回到家已是将近晚上九时。第二天周一父亲还需赶早过江去上班，我们也要去上学，洗洗收拾就休

息了。周三晚父亲回家，因他去过四川及其他地方，我询问父亲，刘文彩真有这些罪恶吗？父亲说没去过刘文彩的家乡，不知道。近几年好象对“收租院”及刘文彩的描述与当年的展览又大相径庭，我该信谁？

就是在这一年的暑期，一边倒向苏联学习，教育系统对全国大学大拆大调整，将原综合大学的工科专业全部分离出来，另组成各种名称的工学院或专业学院，如武汉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就是当时新组建的，全是工科专业，有的专业就是从原武汉大学及其他大学调来的。还有的学校专业合去外地，如原武汉交通学院的船舶制造专业就合往上海交通大学，私立大学也全部取消。中小学也是取消全部私立学校，并将一年春秋两次招生改成只秋季招生。如原本应该是 1953 年 1 月（初三下学期）初中才毕业的学生，当时有几种可能：一是初中只读两年半，即 1952 秋季就参加初中毕业试，如毕业试能通过，就可参加升高中的考试，能考上就升入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二是如参加初中毕业考试不过关，就需重读初三上（即留级），初中就需读三年半；三是初中毕业试已通过，但升高中考试不合格的，即考高中落榜了，也不可能重读初中，就另某出路了。我正好赶上了这次变动，

值得庆幸的是我当时顺利地考上了高中，且录取在父亲所希望我去的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现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因此我初中只读了两年半。我妹妹当时小学也只读到六年级上学期就考上了该校的初中。我们姐妹俩就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了。在当年并未普及九年制教育，小学升初中，也是经考试选择录取，淘汰率也不低。我们的顺利升学，也算是家中的一件喜事，使父母在“三反”中因冤屈而受伤的心得到一些安慰。

1953年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撤消，成立中南行政委员会。原重工业部也拆散了，地质勘测方面，上文中所提到的传言，得到证实。1952年9月中央成立地质部，并设立各大区地质局，中南地区也就成立了中南地质局，办公地点也搬离了江汉一路那栋大楼，新址好象在解放公园路附近，我没有去过，具体地址不知。是大区局，管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原中南钻探总队也不复存在，在地质局内成立了探矿处，设有正副处长，正处长我见过，名常靖，是南下干部，为人不错。我父亲在探矿处，不担任领导职务，只是一名主任工程师。虽钻探总队已撤，中南区各省内钻探队仍是由探矿处管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父亲仍然不可能不过问。父亲在局里

工作的时间很少，基本就是出差前往各处钻探队，如大冶铁山、河南平顶山、湖南临湘等钻探队，因而一段时间他在武昌家中的时间并不多，只是每个月回家一两次，住两三天又离家了。

1953年7月，钻工学校出现一些问题，父亲便在当年七月去钻工学校任副校长。我母亲随行去铁山住了半年多。七月正是暑假时间，我和妹妹也随父母去到铁山。当时从武汉去铁山是先乘船到黄石市，再去到当时的华中钢铁公司在黄石市的炼铁厂内，乘进出铁山的专线轻轨火车到铁山。在铁山的居住条件远比不上当年的锡矿山，我们一家五口人（当时还有一个堂妹寄住在我家）只住一间约不足十五平方的简易平房，房内的陈设除了门板床，就只有一张简易条桌，四张方凳，都是学校配发。烧饭就在房门外的屋檐下放一个小煤炉，下雨天还只能将煤炉搬入房内。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培训工人操作作用的苏式钻机，与美式的相比，较笨重，也不够紧凑，现在我的相册里还存有我父亲在该校观看学员操作钻机的几张照片，具体操作如何，我就不知晓了。该校有多少工作人员和学员，我也未听父亲谈及过，只知道1950年底父亲在长沙招收的几位高中和中专毕业学生，跟随父亲已三年多，已掌握

了钻探方面的初步知识，可以独立工作了，他们几位均是钻工学校的老师，晚上课余时间常来我家，在房门前的空地上陪父亲聊天，师生间很是亲密。父亲只是告诫我们姐妹不要去学员区，也没说不让去的原因。暑期过后，我和妹妹返回武汉，在学校住宿。

父母是在 1954 年元旦后离开铁山回到武汉的，我的相册里有一张署有“热烈欢送王副校长赴平顶山工作”的钻工学校教导股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父母回到武汉后，我们的家就安在了武昌粮道街 50 号，这是当时中南地质局的职工宿舍。

约是 1954 年 3 月，父亲就去了河南平顶山钻探队。平顶山在 1953 年 9 月就有 401 队在进行地质勘察，全队有一千多职工，风餐露宿，艰苦地工作，揭开平顶山建设史上新的一页，探明了特大煤田和其他有色金属矿藏。随之的钻探任务也就十分繁重，父亲在平顶山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只是隔一段时间回武汉一次，在家住不了几天又走了，直到当年的年底平顶山钻探工作进展正常，他才彻底地离开，回到局里。现在据说平顶山当局为表彰当年的地质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建立了一个地质纪念碑，我想我父亲也属于这些地质工作者中的一员吧。

约是 1955 年的 4 月又去了湖南的临湘钻探队，临湘距武汉一百八十公里，盛产铅、锌、钨、钾等矿，父亲在那儿工作了多长时间，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是 1955 年高中毕业，我只记得当年八月底我离家去天津大学时，父亲不在家，他在临湘，离家那天是母亲和妹妹送我的。这不能说是父亲对我不关心，只能说明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我离开家后，至 1956 年 4 月父亲在汉的工作情况，是在局里？还是经常出差？或又去到下面哪一个钻探队？这些我全知道了。

**荣誉与喜悦。**“三反”过后，父亲有一段时间心情郁闷，1953 年去到铁山钻工学校之后，因为父亲只管教务，在教务股工作的人，都是他 1950 年招收来的学生，他们相处融洽。行政事务及学员生活等方面都是正校长管理。因而省了很多麻烦，心情也就好多了。1954 年元旦刚过，从铁山回到武汉，安顿好家，春节过后，父亲正准备起程赴平顶山时，让父亲想不到的是：局里告之，父亲作为地质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去北京地质部开会，这应该说是父亲自 1950 年以来几年工作成绩的肯定。自 1937 年秋他还是北京大学学生随校南迁长沙，后又迁往昆明，离开北京整整十六年了，

这次有机会能去北京，旧地重游，父亲的确十分兴奋。

从北京返汉后，谈及他在原北京大学附近，见到了十多年前他还是学生时，常去租自行车的那个小店。年过六旬的老板还认出了他，两人谈及往事都感慨不已。老掌柜还慷慨地挑出一部较新的自行车借给父亲，并说骑到离京前送来就行了，对我父亲竟如此地信任，可见父亲学生时代就给这位老掌柜留下了为人诚实的深刻印象。后来交回自行车时，老掌柜也不肯收取租金，并说：“你难得来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就算我尽地主之谊吧。”谈着这次去北京的经历：他和其他代表一起在“怀仁堂”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见到了他的恩师谢老先生及原南京矿产测勘处工作过的、1949年后已转至地质部工作的老熟人。我感受到了父亲发自内心的欢悦。他这次给我带回一本俄文常用单词字典，他自己则购买了一本英、俄、德三种文字对照的地质探矿方面的工具书，他原只通晓英语，根据当时的情况，常接触当时的苏联及民主德国的资料及设备，他还要学这两国语言，确实他也常和我一起读俄文，由此可见父亲的追求。

1955年春节后，开学我就升入高三的最后学期，我妹妹也升入了初中三年级的下学期了。父亲即

使不出差，因有一江之隔，也仍是每周回来一至两次，对我们姐妹的学习情况也常问及。我原打算大学报考文科，起初父亲不置可否。四月中旬父亲去了湖南临湘，五一节时父亲回汉和我谈及升大学选择专业的问题，听得出父亲并不赞成我学文，但也未明确反对。五月中旬“反胡风”运动浪潮高涨，父亲从临湘给我来信：明确建议我改变志愿，不要学文，可以学医或学理工。我原打算学医，六月底毕业考试后，学校组织体检，当天在医院正好遇到急救病人抢救未能成功，给我留下了恐怖的一幕，我不敢学医了。正好父亲又回来了，父女俩斟酌的结果是报考理工类。在报考学校方面，按照我平时的成绩属中上，努一把力可争前列，可我却是一个听其自然的人，不是一个很刻苦的学生。父亲对我从小体弱的身体及比较放松的性格还是很了解的，他不强求我一定争取北大或清华，他不想我离开武汉，工科可报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我有一位堂兄 1954 年在当时广州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工作；理科可报武汉大学。体检后填报志愿，当年中南地区学生不能填报华东地区的院校。我看到升学指导手册中天津大学机械系有一个新的专业“精密仪器专业”。当年那一届高考可填报七个

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三所院校。和父亲商议后我第一志愿填报工科电机系，学校只填报了清华。第二志愿是机械系，三个学校是：清华、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第三志愿是理科物理系，学校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第四志愿是数学系，学校也是填北大、南开、武大。七月中旬高考，八月中旬得到录取通知，我录取在天津大学，学制五年（当年直属教育部的院校全部改为五年制）。妹妹也考取了高中，录取在离我家住地很近的一所不错的中学：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附中。父亲正好在前两天有事回到了局里，看到我俩如愿升学，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从局里下班回来时神采奕奕地告诉母亲：局里工会发了一百元的教育奖金，周围的同事都很羡慕。父亲又说：“天津离武汉远，过两天我又要回临湘，你走时我不能送了，有点遗憾。”八月底我离家赴校的前一天，收到了父亲从临湘寄回的信“……时间过得真快，我还未意识到，眨眼间你已经上大学了，到新的环境一切自己慢慢去适应，大学的学习是要靠自觉的。……”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到校不久，父亲给我来信的同时给我所在班的团支部也写了一信，请求对我多加帮助。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父爱如山”。

1956 年春，父亲又一次获得地质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励，但他因工作离不开而没有去到北京，当时父母也没有在给我的信中告之此事，我 1956 年暑期回到已迁至兰州的家时，与母亲的闲谈中才得知，当时我看到了母亲拿出的一個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纪念文件夹，现在还珍藏在妹妹家。还奖励提一级职称。

**母亲在武汉。**1951 年 4 月来到武汉，在乾福巷 2 号住下不久，居委会便有人来到家中，想让我母亲做居民小组长。别看武汉在当时也算是大城市，但居家的中老年妇女有文化的不多，甚至还有不少文盲。街道干部认为高知的家属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孩子也大了，又没有家庭拖累，是理想的人选了。母亲则认为自己文化也很低，又是刚来到这里，对周围情况还一无所知，难以胜任而推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周围邻居处熟了，便再也无法推脱，我家迁住 2 号后，约是 1951 年国庆节前母亲便与住在 17 号的朱伯母两人一道担任了乾福巷这条街的居民正、副组长，朱伯母是正组长。那时正是所谓抗美援朝及肃反镇反期间，要组织居民读报及学习各项政策，母亲是协助朱伯母尽力而为了。也与邻居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而“三反”时在我父亲被审查期间，不但没人歧视，她仍是

居民组副组长，且得到不少邻居的同情，尤其是同住一幢房屋内的几家邻居对我家很是照顾，在那段时间内，我和妹妹在同屋六个家庭中都吃过饭，楼下三家，除我家外，一家是房东陈阿婆，她的子女均在外地工作，只有一年约五十的保姆陪伴。另一家男主人姓吴，是水利局的技术员，妻子姓肖，没有工作，有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夫妻两人都很年轻，他还有一妹一弟刚从农村老家来到武汉，和我妹妹同在武昌实验小学读书，且在同一个年级。“三反”时我俩在这两家吃饭的次数较多。1953年7月我们搬离这里，父母去铁山时，大家依依不舍，我记得我家母女三人与吴家的肖阿姨、她的小弟小妹及她的孩子、房东陈阿婆三家照了一张合影，这相片现在还保存在我妹妹处，这是邻居和睦相处的见证，确实难得。

1954年元月，我家住进了粮道街50号地质局宿舍。粮道街50号应是这幢宿舍的后门，前门是函三官65号。据说这里原是汉剧名角陈伯华女士的私房，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交公给当时的房产部门，后中南地质局整幢租用作为职工宿舍。宿舍内都是一户住一间，我家住此宿舍的主楼，楼上中间是前后两个厅，两厅的两侧共八间房，我家住了较大的两间，在当时

可能是在此宿舍内，因父亲技术级别最高有关吧。楼上中间大厅及前后走廊是楼上七家人共同的活动场所。此处住的是同单位的人，与外面街道居民无交往，院内活动空间也不小，在当时应该说是很不错了。这宿舍也有一个特点，住的大多是地质勘探队及测量队的人员，男人们出差多，家中常年多数时间只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所以麻烦也不少，老人有病、孩子有疾、或是女人临盆、还有婆媳不和、邻居相争等事也时有发生，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属委员会，我母亲是成员之一，与其他几位委员会成员时常为这些事忙碌着。

这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因父亲少在家，自然也是母亲一人操劳。1952年“三反”时所受到的伤痛，随时间的推移，似乎已慢慢平复，但在母亲的脑海深处是不可能完全忘却的。1952年秋，当年在部队工作的一位堂兄将他在宁乡老家的小妹接出来寄放在我家读书。1954年初因大舅已去世了两年，舅母另嫁，他的一个儿子也从老家来到我家，由我父母抚养。他们虽都已14、15岁，但在老家均未上过几天学，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年龄实在太大，母亲费了不少口舌才说动了我家附近的一小学校长，一个于1953年春同意插班入读四年级；一个1954年春插班入读五年级，母

亲还督促我和小妹承担给他们补课的任务，家中增添了两口人，虽然他俩都已十多岁，堂妹也很主动帮我母亲做一些家务，但衣食等事还需母亲操劳，更为重要的是要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负责，对他人的重托有个交待。

让母亲最为烦心的是老家乡下的二舅，因农村生活困难，不时来信要钱要物，总想让我父亲为他谋职，从家乡经常跑来武汉，说是要医病，实际是想离开乡间来我家住下。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孩子一家人，又如何安排得了？他每次往返费用及其他一切所需均由我父亲承担。记得 1955 年我将近高中毕业时，他甚至向我母亲提出，不再让我上大学：“女孩子已高中毕业了，还上什么大学，找一份工作可补贴家用……。”他是我母亲惟一健在的弟弟，母亲很心疼他，对他当时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撒手不管。另一方面母亲也觉得给父亲增加了太重的负担，也感到心里难受。我父亲也很为难，事实上父亲不可能为他找到工作，父亲一人的收入，要维持一家五口（堂妹是堂兄负担）的生活，已是相当紧张，再加上这样一个不通情理的舅舅，母亲的烦恼就可想而知了，她只能委屈自己。我家离武昌胭脂路菜市较近，每天下午三时以后，鱼

及肉类都比上午便宜，尤其是活鱼到这时已开始“翻白”（即肚皮朝上），母亲即赶到菜市购买。我们穿的内衣内裤等，都是她手工缝制，处处精打细算。维持着这个有点捉襟见肘的家。在我的记忆里，自1952年至1955年这段时间，母亲没有为自己添置过衣服，她操持这个家太不容易了。

1955年，表弟小学毕业，已是将近十七岁的年龄，他自己不愿再读普中，便进入了武汉重型机械厂技工学校；堂妹小学毕业也进入了初中，他们都离家住校了。我去天津上大学后，家中就只有小妹留在父母身边，小妹已升入高中，母亲在操持家务方面就轻松多了。1956年4月父亲调往西安西北地质局，母亲随行，离开了她已居住了五年的武汉。在这五年里，我想有不少经历会留在她的脑海中：有再孕的欣喜，却又经受了添丁希望的破灭，有我和妹妹顺利升学与父亲取得荣誉的喜悦，也经历了父亲挨整时的惊恐艰辛。总之，父亲经常出差，家中事情过问较少，母亲是家中重要的支柱。

### （11）历尽艰辛后的母亲（1961年2月至1966年11月）

1956年4月迁离武汉，随父亲去到西北的四年多，

母亲没过多少舒心的日子。刚去头一年，父亲如出差外地，她孤独一人留在家，人生地不熟，语言不全懂，南北方生活习俗多少有差异，她只有努力去适应。一年后，就反右了，以后的几年她更是在苦难中煎熬。

1961年初随我迁到南宁后，与在兰州时相比，生活条件大有改善，她和我丈夫亲似母子，市委大院内邻居老人们也相处融洽，身体已不浮肿，精神也好了很多，也常和老人们说笑。但父亲已去世之事，不可能长期瞒着母亲，当我们委婉地将了解到父亲已去世的过程告诉她时，她平静地问道：“信在哪儿”？我说是单位之间的信函，不能交我们保管。因父亲已几个月不曾有信，从姜表兄的来信中，也可想到，母亲心中早已知是凶多吉少，但总抱着一丝希望。现信息确定了，希望彻底破灭了，她表面平静，而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从此后独处时间多了，整夜失眠，经常独自去到当时南宁市委对面的人民公园，看着鱼池内游动的金鱼发呆……。一段时间内，母亲都是在这种思念和痛苦中渡过。在极度的悲痛中，1952年“三反”中，因父亲受屈，使母亲早产婴儿夭亡一事，她一直难以忘却。她又对我说起：“如果那孩子活着，也该九岁了，不过1958年那种情况，也难养活。”我现

在回想起了当年，如果那弟弟活着，“文革”时也会是上山下乡的对象。1977年恢复高考，也一定会挤在千军万马中去过这座独木桥，我想：他应该能过。如顺利，今年应该也是花甲之年了。

1961年还是物质困难时期，市委大院有家室的，大多养鸡，或在宿舍前空地上开垦菜地种菜。我和丈夫白天都上班，母亲一人可能太孤独了，如果让她有点能消遣的事做，可否分散她忧伤的心？于是我丈夫便想法买来了一对小兔及几只小鸡，也在宿舍楼前开垦了两小块地，种上了一些容易打理的菜。市委一司机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儿，长得很可爱，他爱人常带孩子来我家玩，熟识了，孩子的母亲有事时，我母亲就帮忙照看。有了这些事，母亲身心似乎有了寄托，就精心饲养着这些小动物，小兔长大了又生小兔，小母鸡长大了，每天都收获着鸡蛋。有时周末我们陪她去广西大学我女友家走走，女友已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女友有时也带孩子来我家看望她，母亲看到孩子，也很高兴。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从表面上看，母亲的心情在逐步好转。1962年妹妹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钢铁公司工作，我也有了身孕，1963年春我大女儿出生，所有这些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她全

身心地照看她的宝贝外孙女，操持着家务，孩子在她细心的照料下，长得白白胖胖，活泼可爱。母亲的身体似乎一天比一天好了。这时母亲也常对我说：“过去你年纪小，也忙着读书，我没让你学做家务。你现在已成家了，有了孩子，也应该学会一些女红和其他家务，家庭条件好，不需动手时，不做也不会‘发霉’；现在有我在，可以帮你；以后我不在了，需要你自己动手时，你却一点家务也不会，就难了。”于是我便向母亲学编织和裁剪缝纫，当时布票紧张，也买不到毛线，先用我们穿过的旧衣服改给孩子，拆已不合身的旧毛衣、收集原织毛衣余下的各色杂线，搭配着织小孩衣服，给孩子做小鞋子，总之，我在母亲的指点下，学到了初步技艺。

1967年初可凭票购买缝纫机，我买了一台上海牌的缝纫机，这时已是“文革”的第二年，学生走上社会闹革命了，教职工也纷纷成立了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斗得正热闹，学校已散摊了，而我成了逍遥派，闲在家无事，就带孩子做家务，孩子的衣服就可用缝纫机缝制了。遗憾的是这时母亲已去世，她来南宁后，在世时的那几年，物资困难，无法购到机器，她一直是用手工缝制，相比之下，我的手工是无法赶上母亲的。

而厨艺更差劲，尤其是荤菜类，只能勉强摆弄点猪肉，且仅仅是能煮熟而已。而家禽类我望着发傻，不知如何下手。在 1980 年以前，那时市场商品供应还少时，孩子们的吃食也少，南宁街头所摆酸品摊上有如酸萝卜、酸黄瓜等，这也是南宁人喜好的食品，此地人称为“酸嘢”。这些我们在宁乡老家时，母亲都会做。因我丈夫承接了母亲的厨艺，他便自己做酸品，如是我家也就有自产的如酸豆角、酸黄瓜、酸萝卜……。我丈夫做的菜肴色香味俱全，也因为如此，现在厨房的活，还是他全包了，他的厨艺受全家人称赞。

1965 年 4 月末，越南战争形势紧张，南宁市疏散人口，母亲带着我的大女儿去到已离别九年的武汉，在我妹妹当时工作的武汉钢铁公司住了九个月。她除了在我妹妹的集体宿舍（也是单元房，几个单身女性同住）居住外，还到我丈夫的叔叔家、及我妹妹的未婚夫陶家小住。妹妹当时虽还未结婚，但已确定婚约。两家的四位亲家老人及其家人，对我母亲也很热情，相处融洽。未婚女婿每周末从大冶铁山回汉，就去我母亲住处看望和帮忙做点家务，这个即将成为女婿的小伙，对我母亲又是很细心体贴的，母亲心中自然充满了喜悦。她闲时还去父亲青年时代的好友，当时好象是在

距武钢不远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的左伯父家，还有住汉口的易伯父家走走，在交谈中他们都羡慕母亲有两个好女婿，为母亲能很好地安度晚年而高兴。

1965 年底，因我又已怀孕几个月，母亲于 1966 年初在武汉过了春节，就回到了南宁，当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欢悦的母亲，回到南宁就着手准备我孕育的小生命出生所需的一切，未察觉到母亲身体有什么不适。谁也没有料到过去多年的家庭遭遇积累的内伤，在她的身体内已悄然发作。1966 年 3 月中旬开始腰痛，先后在南宁市第一、第二人民医院诊治，都作为老年人常见疾病治疗。可是病情发展很快，越来越严重，到五月底发展到不能下地走路了。去到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时，确诊为脊柱癌晚期，医院已无力回天，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只能给一些止痛药物，缓解疼痛，医院也不肯收住入院，只得在家中服用中药及止痛片。我这时也刚分娩，不久“文革”也开始了，社会已不平静。

我丈夫已于 1962 年秋调到银行工作，“文革”开始不久，银行就有少数职工也有行动了，银行金库的安全是大问题，丈夫这时在单位工作很紧张。回到家里卧病在床的老人、两个孩子及我这个产妇又需照料，

他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晚上忙完家务，深夜一时以后才能睡觉。找来保姆，却不愿照料病人，当时也难为我丈夫了。

当年六月份，妹妹结婚，母亲心中喜悦，病有所缓解。她唠叨着：不能去武汉亲自操办妹妹的婚事。她还说：我60来南宁结婚时，她也未帮上，两个女儿的终身大事，她都未尽什么力，有些感到自责……。妹妹婚后调往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去四川途中，夫妻俩特绕道南宁，看望了病中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妹妹、妹夫在家的那几天，是已卧床三个月的母亲心情最好的时间，谁能想到这竟是母亲与他们的最后的一次见面。

1966年8月中旬，母亲病情继续加重，大小便已不能自解，小便需导尿，大便需灌肠，家里不可能为她操作，腹部鼓胀，非常痛苦。其时“文革”运动已如火如荼，我因身体原因，早就调离了工厂，1965年已在一所中学任教师。我产假刚满就回校上班，当年学校不放暑期，我又不能请假照料，雇请人服侍，也无人愿意上门。只好去求助于一学生的家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当时外科的赵主任，总算如愿，母亲就这样住进了这所医院的外科病房。住院整整一百天，

在她病危的前一天，我白天在医院陪护，晚上我丈夫陪伴她通宵。第二天（1966年11月25日）早上我去替换丈夫，在照料母亲早餐时，她已不能说话，不一会就进入弥留之际，但从她眼神中看出，她想说什么？或在等待着什么？吊着一丝气息，待我丈夫中午来到医院时，她吃力地睁开眼看了他一眼，就断气了。我们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说：将我托付给我丈夫了，希望我俩能恩恩爱爱地好好过日子。去世时间是1966年11月25日中午约12时左右。回首母亲在病中的最后一段时间，疾病给她带来的痛苦，如没有坚强的毅力是很难度日的。我每次去替她擦洗时，看到的情况是脊柱一节一节全部错位，双下肢已毫无知觉，腹部以下水肿得像是透明的薄膜袋装满了水，一按就会破裂。她已不能自己翻身，只能直直地躺着。看到此情此景，的确令人忍不住掉泪。在痛苦中，她想到父亲当年在夹边沟饥饿亡故时，身边没有亲人，不知是何等惨景？她知道自己已无治好的可能，只希望尽快结束生命，去与父亲相聚。

母亲去世时不满53岁，如果是职业妇女，还不到退休年龄。假如不遭受那些难以描述的打击和波折，她是不会早逝的。在她重病时，又处在那混乱的年代。

总算上苍有眼，在她住院那段时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她还能得到应有的照料。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在我母亲去世不久，各医院的医务人员就分成了几派，开始了互相攻击，忙着“革命”活动，对住院病人的医疗护理日渐松懈，第二人民医院还成了各派武斗的据点，并升级到动用枪械互相攻击，住院病人也只能回家了。

母亲的早逝，给我因父亲冤屈早逝留在心灵深处的伤痛，再添上了一层阴影。妹妹在四川渡口，由于刚流产不久，加之昆明已开始了武斗，不能赶回南宁与母亲作最后告别。在那荒诞的岁月，母亲的后事也只能从简，当时我只通知了母亲娘家的一位在南宁送变电工作的远房侄女，及我那位在广西大学工作的好友，我和丈夫共四人送母亲最后一程。在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南宁刚建成了火化场，母亲的遗体采用了火葬方式，我目送她的遗体推入火化炉。委托母亲的堂侄女选择了一个外型庄重、材质较好的骨灰盒安放母亲的骨灰，骨灰盒就存放在殡仪馆的骨灰堂里。自1966年11月25日至2003年11月3日，存放了37年之久。

母亲的骨灰存放几十年，没有入土安葬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父亲惨死于遥远的酒泉，十年“文革”难以得到父亲遗骨安葬的信息，我们曾幻想寻觅父亲遗骨与母亲合葬，直到1979年的兰州之行，这一幻想就完全破灭了。此后的二十多年，南宁的公墓发展也很缓慢，有的公墓离市区太远，交通不便。其中也有社会气氛的原因。总之，还不合适去做确定墓地安葬的工作。即是存放在骨灰堂的遗灰，我也不可能常去悼念，也只能是每年缴纳管理费时去看看。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一些莫名的禁锢逐步消失，怀念先人的气氛日渐浓烈，清明扫墓的传统也在普通民众中日渐恢复，我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并且有了第三代外孙及外孙女。因而，每年的清明节我和丈夫带着孩子们也汇集在扫墓的洪流中，去到殡仪馆的骨灰堂，请出母亲的骨灰盒祭拜一番，聊表哀思。

1990年末至2000年初，南宁市有的公墓区至市区交通已很便利，我的年龄也渐老了，身体情况也一年比一年差，母亲的遗骨也应该入土为安了。2003年9月，妹妹与妹夫来南宁小住，就商议购买一方墓地，安葬母亲骨灰。于是，就选定在南宁烈士陵园所属市民安葬区内购置了墓穴，于2003年11月3日正式下葬。因父亲的遗骨已不可能寻觅，父母同穴的愿望是

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只能在墓碑上刻上双亲的英名，生辰与去世年月，还有双亲的合照，并在母亲骨灰缸内放入一帧父亲的遗照，以示遗骨相伴同穴，英魂永伴。此情此景，心情实难平静，我仿“蝶恋花”填词一首。

悼念父母：（愿英灵安息）

慈父蒙冤逝酒泉，母逝邕城，南北两分离。

双亲同穴难如愿，墓中仅是影相依。

七十年前燃红烛，鸾凤和鸣，相濡几十年。

意笃情深赢美誉，英魂天国定团圆。

我妹夫也写有悼念文字如下：

《合葬墓记》

癸未秋冬之交，王氏姐妹合家聚于邕上。稟高堂遗愿，寄孝女衷肠。恭购陵园公墓一处，平米见方。同年十月初八午时（农历），合葬双亲于佛子岭之阳：背山面水，环抱神秀，纳藏三泽，神凝九峰。

盖父蒙冤经年，遗骨寻觅无存。仅穴置遗像，魂招归寝，与母相伴。碑刻英名，上粘慈容。还洁白精忠，往升天国；合烈士英灵，共沐日月。敬作此记，示儿孙永纪。——婿建国癸未书于邕城

（三泽：邕江、南湖、仙子湖；仙子湖在南宁雕塑

园内。九峰：青秀山、伊岭岩、飞凤岭、高峰、皇帝岭、四厦岭、天堂岭、老虎岭。)

按传统的说法“入土为安”，父亲遗骨未能与母亲同穴，也只能这样安排了，只能说是很勉强地了却了一个心愿。回顾我父母的一生，他们从 1935 年夏结合，至 1960 年 11 月父亲冤屈而亡故，这二十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因父亲工作多在野外，他们的生活是聚少离多，团聚的时间屈指可数。

父母的婚姻虽不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他们婚前也不曾有过花前月下，相伴于影院茶楼。也不会有口头上的信誓旦旦，海誓山盟。但几十年里，父亲忙于自己的工作，母亲一人承担着家务、孝敬长辈、照顾弟妹、哺育孩子，他们之间那种默契，真正体现出了他们结婚时，世交长辈所赠那块匾额所书的“鸾凤和鸣”的实意，这本该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可他们生不逢时，处在一个荒诞的年代，使无辜的他们无法安宁地生活，甚至遭到难以想像的不幸，直至本不应该的生离死别。这决不是命运如此，而是某些人性缺失者造成的人为灾难。

## （12）平凡而珍贵的精神财富

母亲的一生仅是一个相夫育女的传统女性，父亲也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科技人员，没有惊世伟业福荫子孙，作为后人招摇的资本。也没有留下宏篇巨著，供后人玄耀。因为种种原因，如父亲当年慷慨的捐献及1957年反右后的遭遇，造成家境的拮据，甚至仅有的几件稍象样的衣物也贱卖一空，至1960年，除了两只破旧箱子，一卷旧铺盖，不到20元尚未兑换完的1952年所购国债，就别无他物了。父亲留给我的遗物，是1955年我考上大学时，给我购买的一块瑞士产手表，1961年我到南宁后，母亲保存着的父亲曾穿过的两件杭纺短袖衬衣，父亲认为不适合在劳教农场穿着而留下了，在当时布票及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母亲拿出来给我丈夫穿上了，也算是父亲给不曾见过面，也不可能见面了的女婿留下的纪念品吧！这种见物如见人的心酸，实难言表。而我妹妹和妹夫处，父亲的遗物则只有一个父亲生前出席先进工作会议用过的活页夹。这些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物质遗产，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而我们则认为万分珍贵。使我感到万分愧疚的是，父亲当年给我们的信件一封也未留下，因

而现在已寻觅不到他的笔迹，即使为数很少的相片，我也没有注意全部很好地保存，有的遗失，有的发黄，已不清晰，虽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我的过错。父母留给了我们的是他们优秀品格，这是无法衡量的精神财富。

**敬佩父亲的品格：**父亲的为人是正直善良的，他嫉恶如仇，洁身自重，不结交权贵。在他的思想里没有阶级的概念，只有人品的区分，也不懂官场潜规则，不论在新旧社会很少接触各级政要。他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他鄙视只会鱼肉百姓，争权夺利，侵吞国家资财，欺下瞒上，不干实事的权贵。也看不惯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巴结逢迎的场面。只渴望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环境里尽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干点实事。父亲的这种性格，致使他的朋友多是过去的同窗好友，一般平民，探矿队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人。单位领导即是相邻而居，除工作急需外，也很少主动登门。记得解放初期，长沙警备区负责人中有一名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弃学去了延安。1950年在长沙警备区任领导职务，大街上布告中领导人名字中就有他的大名。当年在北大时与父亲相处也算不错。据父亲说此人在“一二·九”学运时是学生首领，为躲避当

时军警的搜捕，曾躲进过父亲居住的学生公寓，得到过父亲及其他人的帮助。1950年父亲得知他已是军政首长，却没有去找过他，父亲说：“彼一时，此一时，何必呢？”1957年的“反右”，如果他当时低头认“错”，也许会从轻处理，但父亲认为自己没有错，决不屈服于丛健之流的淫威，而招致“抗拒从严”，我佩服他的“威武不屈”。

父亲不善接触上层，但他性格并不孤僻，在乡间时他能与农民交往聊天，上文我曾描述过他去田间与农民学习插秧。他尊重我家请来种菜的张二公，亲切的称呼他二叔。在钻探队与一般职工也是能融洽相处，职工有困难，只要他自己能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他去基层工作，是有野外津贴的，如遇基层职工有难处，就将自己的津贴让出。在一般职工的印象里，父亲平易近人，也就有职工毫无顾忌地向父亲借钱借物，父亲则慷慨地回应，钱物在宿舍内某处，让需要的人自己去取，因而，有时谁向他借过钱物，借出去多少他都忘记了，当别人还回时，他甚至都毫无印象。他的衣物别人拿去穿用，他从不计较，我曾听母亲说过：有时出差回来，替他清洗衣物，发现少了，父亲的答复是“不记得谁拿去了”。母亲还说：哪怕仅有两件衬

衣，别人拿走一件，自己不能换洗，也无所谓。父亲的这些往事，我曾在中南地质局工作过的几位熟人谈话中得到印证。那是1965年7月我在南宁街上偶然遇到、在武汉与我父亲一处工作过的一对夫妻，他们是1956年调来广西地质局的，我们相遇后，他们问到我父亲，我如实相告，他们震惊了，因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大女儿去了武汉，我暑假闲着，便应他俩之邀随他们去了广西地质局宿舍大院，还有几位也是熟人，谈到我父亲和我家1957年的处境，无不叹息。他们说：我父亲在基层钻探队都是与钻工们同吃同住的。那对夫妻还说：他俩的结合还是我父亲从中撮合的，1955年当时他俩都随我父亲在湖南临湘钻探队，男的是技术员，上海人，1985年后任广西地质局局长，前几年已去世；女的是绘图员，湖南人。从他们的谈话中，父亲与普通职工的相处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父亲的克己俭朴：**他继承了祖辈的传统，他的生活是很俭朴的，但对需要帮助的人和国家的需要，却毫不吝啬。1946年至1947年冬，在南京测勘处工作时，尽管他工资加津贴收入不低，母亲和我姐妹三人还在宁乡老家，并不需父亲接济，父亲却没有添制

几件象样的衣服，也没有当时同事们都有的如收音机、相机之类物品。记得当年父亲在给母亲信中曾自我调侃：“鸡处凤中，形敦乞丐。在此期间普通朋友却交了不少，看着有难处者，不能袖手旁观，生活倒并不寂寞……。”按他当时的收入，如果不去接济比他收入低的人，自己添制几件较好的衣服，购买收音机及照相机等物品，我想是应该可以办到的吧！

1948年初，母亲、我和妹妹到锡矿山与父亲一起生活，他在锡矿山的津贴是南京工资的50%，母亲操持家务，已足够我们一家的生活开支。当时，南京已风雨飘摇，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父亲在南京的好友马祖望先生等担心将钱汇至锡矿山就会一文不值。谢家荣老先生考虑由资源勘测处在长沙的办事处发放。长沙办事处的办公室主任刘海苍先生，是父亲在湖南省立一中求学时的同窗好友，也担心贬值，就将父亲每月的工资换成了黄金饰物或金条，直至长沙解放，这一年多的工资收入就成了父亲一生中惟一的积蓄了。可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父亲一件不留地悉数捐了出去。也曾有好友劝他，有两个女儿，总该给她们留一两件饰物吧，父亲却说：孩子们今后应该自立，抗美援朝是大事，应响应国家

号召，尽自己的全力。

1950年后，随着工资改革，当时对留用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相应行政人员略高，但下基层及野外津贴则减少了，父亲外出工作频繁，母亲不可能随时陪在身边，父亲在钱方面的手松习惯又一如既往，对他人有求必应，加之宁乡老家我母亲娘家人麻烦不断，父亲的收入也就只能勉强应对日常开支，有时甚至捉襟见肘了，那里还会有积蓄？可后来号召买建设公债时，父亲又是倾囊而购，以致影响到当月家庭生活的开支了，母亲只好每天下午菜市闭市前去购买便宜蔬菜。父亲的生活很俭朴，吃喝从不挑拣。对我们的要求是学习上需要购买的用具，可以尽力满足，但穿着上的要求却有限制，不能超出一个学生应该遵守的限度，要朴素大方。

**理解父亲的爱国情怀：**1948年来锡矿山协助工作的美国技师戴维斯老人，工作中几个月的相处，与我父亲结下了亲如父子的情谊，1948年中秋之后，戴维斯老人本应离开矿山回南京，可老人不舍离开，至1949年元月不得不离开时，老人想让我们一家随他去美国，父亲当时以不能丢下钻探队一走了之而婉拒了。可老人是认真的，南京解放前夕这位美国老人返回美

国时，老人又给仍在锡矿山的我父亲通电话，让他同行。父亲又一次婉拒了。至 1950 年初，老人又来到香港，不知通过多少途径打听到父亲当时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又给父亲来了一封信，说在香港等待着父亲和我们全家，父亲虽然为老人的执着诚意而感动，但他认为国内新政权刚建立，新中国的建设是需要用人的，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要为自己的国家而工作，父亲仍然回拒了。在以后父亲遭遇到不幸时，我也曾想过：父亲当时不走而坚持留下，这样的选择是否错了？！这几十年的不少事例，使我理解了父亲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高尚情怀。他的恩师谢家荣老先生也没有离开，不是也留下了吗，“反右”及“文革”一次未漏的遭劫，在“文革”时于 1966 年 8 月冤逝。与父亲同在夹边沟“改造”的傅作恭先生不也是因为爱国，而舍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国内，也成了夹边沟的冤魂，有如此遭遇的人，几十年来难以计数，我不知爱国何罪之有！！

**赞叹父母的恩爱与真诚相守：**父母的婚姻，我在以上的文字中，已经谈到，父亲是高学历，家居城市，长年在外工作，接触面广，知识面宽。而母亲生长在农村，未进过学校，两人的经历、性格、爱好等差异

是明显的。父亲的一生虽不是高官厚禄，但也有较为顺利的时光，1949年以前，有妻有妾，进出花街柳巷，并不为人所耻，极为正常。而我父亲却鄙视那些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他常年单身在外，熟识的人中也曾有人邀他去游秦淮等风月场所，父亲却从不涉足那些酒肆舞厅，盛名的南京秦淮花船，也未曾去过。他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女儿，至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我母亲已因身体原因而多年不孕，也曾有人劝他纳妾陪伴，并生儿延续香火，他也严词拒绝。1950年某些人进城之后就遗弃农村原配，在城市另觅年轻貌美新欢，记得1951年当时一位在中南重工业部某部门任领导职务的转业干部，刚进城到职就缠着几位年轻姑娘打转，当旁人有微词时，他却毫无羞耻理直气壮地说：“男人就象一把茶壶，就要有几个好看的茶杯配着。”此污浊之言，随后成了一些男职工相互戏谑的谈资，相处较好的男同事相见，就打趣道：“你这把茶壶，配有几个杯子了。”与这位领导相比，父亲虽谈不上富贵，但用“富贵不淫”来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母亲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与父亲二十多年的婚姻，大多时间是独守在家，不论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她都操持得井井有条，她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文化，增

长自己的见识，1948年从家乡农村跟随父亲外出后，努力适应父亲工作单位的环境，在待人接物方面与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姓相比，并不逊色，且缝纫编织厨艺等，也是能手。1958年父亲蒙冤遣送劳教后，在经济上极度困难，精神上巨大压力的处境中，她尽心尽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她当时也才是刚过不惑的年龄，却遭连累，成了贱民，真是贫贱交加了。195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历次运动中有多少夫妻因丈夫被整，而妻子反目另择他路者，举不胜举。当时我母亲容颜并不显老，天生的温文尔雅庄重的气质，也有人劝她另择他途，可母亲则是一直信任着父亲，尽自己力所能及安慰着父亲，等待着父亲归来团聚。在某些权势者认为，她划不清界线，是立场问题。我认为母亲的品格是“忠贞不渝”“贫贱不移”的典范。

### （13）寻觅足迹，告慰在天之灵

我好想去父母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去实地回忆当年一家团聚的欢悦，或寻觅父亲的往事，可是我办不到，因为我行动困难，父亲去过的那些矿山，我去不了，我只能去几处地方，即宁乡老家、长沙、南京、武汉。

1948 年离开老家祖居烈武湾后，只是在 1949 南京解放前夕，由锡矿山回去宁乡，此次回乡多数时间居住在外婆家，回烈武湾时间很少，至当年的 11 月离老家去长沙，就彻底地告别了烈武湾。但儿时 in 烈武湾居住的将近 10 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印象，是不会淡忘的，因而几十年来经常梦里祖居重现：有祖父的慈爱，有父母亲在乡间生活时闲静温馨的家庭团聚，有乡邻的和睦相处，有小伙伴天真的玩耍，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山青水秀，春季杜鹃花满山遍野，房屋两侧果园里桃红李白，各色野花争奇斗艳，屋后竹林苍翠，田野里油菜花一片金黄，夏秋时节，稻田里稻穗迎风摇曳，屋前池塘里群鸭戏水，小溪流水潺潺。晴朗的夏天夜晚，父亲在家时，父母便将竹椅放在厅外的场院里乘凉，瞧着我和妹妹与邻居小伙伴玩耍，或听邻居们谈论着白天听来的、各种流传着的真真假假的新闻。夏夜的晚风吹去了人们一天的疲劳，月明的夜晚，明月高悬，树影婆娑，有时还可听到悦耳的蝉鸣。现在回想当年情景，不由得想起了辛弃疾的一首词，对农村夏夜的描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002 年，在离别故乡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回去了，

但我所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虽建起了不少新房，已不再是当时的一幢多户，大多为一宅一户。但已不是山青水秀，已看不到苍翠的竹林，更无参天大树，光秃的山上是茅草丛生，池塘大多是几乎干涸见底，有的田地已经荒芜。仅够一辆小型运输汽车通行的土路上，时有运送建材的车辆通行，看来乡村对建造新房情有独钟。

我家祖居烈武湾早已拆除，祖辈和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场所，我已无缘瞻仰，心中感慨太多。我想起了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脍炙人口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而我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儿时玩伴多离世，祖居已拆感伤怀。”不过，我还是从久居乡间的堂兄口中听到了一些我父母当年在乡间的往事，在我们离开家乡的这些年，一些比我年长与我父母相识的乡邻在谈到我父母时，都夸我父亲为人爽直，肯帮助人，母亲和善能干。

我 1938 年在长沙出生不久，因抗日战争离开长沙去到祖居，11 年之后再回到长沙，上文曾谈到了在长沙一家人的团聚，那是父亲最顺心的一段时光。因而 2002 年在回宁乡时，在长沙停了三天，在老伴的陪同

下，儿子推着轮椅寻找我们当年曾经居住过的旧址，但是很遗憾，原址所在街区均已拆除。我们只好沿城南路上了天心阁，这是当年父亲常带我们去的地方，旧地重游，几十年的沧桑，虽变化不小，但阁上那些古旧建筑，原貌依旧。回想几十年前的情景，父母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物是人非，此时的心情难以描述。当年我家曾在南门附近名为社坛街的一照相馆，拍摄过一帧惟一的全家四人合影，社坛街也已寻觅不到，这帧珍贵的照片，浓缩了半个多世纪前在长沙经历的一切，这一切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

1948年初，父亲从南京资源勘测处外派湖南锡矿山后，直到冤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南京。1946年父亲从湖南老家到南京任职后，他在给家中的来信中告之，他所在单位的地址是：“南京高楼门峨嵋路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我当时在老家虽只是八岁的儿童，母亲为让父亲在字里行间看到我的成长，也让我能牢记父亲在外工作的地址，每次在给父亲回信时，总让我写上几行，而信封必定让我书写，因此我对这个地址熟记于心。2007年11月，我和老伴去上海妹妹家探望，在妹夫的安排下，我也是第一次去南京。我和老伴及妹妹老俩口在南京游玩时，我请求出租车

司机带我们去一趟这一地址，我总认为高楼门是一座门楼，原来高楼门也是一条街道的名称，而峨嵋路是这条街上一条小巷，巷道不宽，进去后倒车不便，出租车司机说，几十年这里变化不大，现大都为军队住此，我也不知当年测勘处在此巷那幢房内，就只能在巷口停了片刻，往巷里望去，此巷并无高楼。其实即是进到这条街上，又能如何，此处居住的人还会知道当年的测勘处吗？对我来说，也只是印证我脑海中深刻着的这个地址而已，因为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却。现在我在《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书中找到了当年的测勘处是峨眉路 21 号，是二层楼房。

2011 年 11 月，我下决心去了一趟武汉，这是父亲工作将近五年、也是我家居住过五年的地方，但我们原住的地质局宿舍，粮道街 50 号已完全拆去，父亲当年的同事大多都已作古，或早已调去外地，个别健在的也都年事已高，亦无法寻觅，能找到的只有极少数与我家同宿舍居住过、已年过九旬尚健在的家属老太太，她们对我父亲的情况了解很少，按她们的说法是：“很有板眼”（板眼是武汉人认为有本事的说词）。我的外孙推着轮椅、老伴陪同着在江汉一路上寻觅着，看到了 60 年前原中南重工业部钻探总队曾经在此办公

的那幢大楼，外观依然如故，看到那四楼上面对着一个窗口，我浮想联翩，因为我父亲曾经就是在这间房内筹划钻探总队的工作。

我也去到我家曾居住过的武昌乾福巷，此处变化很大，原来巷口周围空地已建有房屋，原巷口已不存在，我几乎找不到进巷的道口，而现巷口是一个公共厕所，需沿厕所围墙还要拐一个弯才进入乾福巷。我家租居的原门牌为二号的房屋仍然存在，但门牌号已是12号。此房大门紧闭，临巷的楼上楼下房间也是窗门关闭，全屋不见灯光。紧挨着此房原称“中和里”的一拱型门，仍如旧貌，但拱门一侧挂有一牌，上书此门为“xxx建筑文物，特此保护”。因巷子很窄，巷内街灯极暗，牌子挂得离地约有两米多高，字迹也较小，因此“xxx”就看不确切了。我想原二号房屋仍保存着的原因，也可能是如拆此房必会影响拱型门的完整，所以也就留下了。因为在巷内当时只有一乘摩托车驶过，暗淡的街灯下，除了巷口公共厕所有人进出外，巷内寂静无人，无法打听，时间也将近晚上九时了，只得离开。因灯光太暗，也未拍照。后来妹妹老俩口回武汉，又去到此处，妹夫在乾福巷原住处拍下了照片，房屋虽已陈旧，但外型依旧，他俩将相片传

来给我，我看到相片，回想往事，眼前浮现了当年父亲骑自行车上班往返的英姿；周日在家与校友兼同事朱伯父夫妻俩彼此之间调侃打趣的笑貌；与房东老太及其家人交谈市井所见所闻的情景……。我一直认为父亲不应该去西北，这是他错误的选择。

父亲已冤逝 50 多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他刚直不阿的优良品德使我永远敬佩。父亲当年和几千被当政者遣至夹边沟如蝼蚁虐待致死，嗜权者张仲良、丛健之流未曾想到，“夹边沟”惨景也会有向世人暴露的一天，《夹边沟》影片中展现的那些用破被烂席草绳胡乱捆着的遗体，随手丢弃在沙海的情景，也就是这些“无定河边骨”向世界无言的控诉；对当时某些狠毒的当政者无视人权的揭露。张仲良、丛健之流及他们的后台，不仅仅是被有良知的国人唾骂，也被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所指责。在阳世间如此狠毒的张仲良、丛健等人死后应打入阴间的 18 层地狱。

在父亲离家时，我和妹妹都还未出校门，尤其妹妹还不足 18 岁，父亲受尽折磨去世时，心中放不下的是家中的亲人。他没有看到我们走上社会和建立家庭，他一定难以瞑目。我现在要告慰父亲：妹妹在 1962

年也完成了大学学业，我俩先后于 1960 年底、1966 年夏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您的两个女婿都是朴实善良的好人，当年母亲尚在世时，母亲与他俩亲如母子。母亲离世时，妹妹刚成家，我的两个女儿还很小，现在我也要告慰父母：妹妹有两个女儿，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您们这五个孙辈都受到了高等教育，现都早已成家立业。第四代正在茁壮成长，您们的大外曾孙硕士毕业已参加了工作。大外曾孙女大学毕业后，已去澳大利亚留学。妹妹的两个外孙，一个正在大学学习。另一个也将入读初中。我们四人也已退休多年。这些年来您们的孙辈、曾孙辈从未忘记每年的清明节去陵园祭扫，望着墓碑上您们俩老慈祥的合影，虔诚地敬盼您们在幸福的天堂里安息。

## 后 语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写完了这篇沧桑家事。有童年时代在长辈呵护下的幸福，有刚步入成年时的波折，祖父和父亲的遭遇，我刻骨铭心，永不会忘却。在写到我的家庭劫难时，我是怀着痛楚的心，字字血，句句泪，有时我不得不停下笔，伏案痛哭，让热泪流淌。

在结束我这篇回忆文字时，还应该对在我家及我个人处于极度困境时，给予了关心和帮助的好心人，表示真诚的感谢。在当年那种政治高压的年代，不顾风险伸出援助之手，确实难能可贵。我文中提到的我母亲被地质局驱赶出宿舍时，接纳我祖父和母亲去她家安身的河南大妈。正是我寻找工作无着时，介绍我去甘肃轻校的学友。接纳我工作的轻校的校长。多方关照母亲和我的姜家表兄和他的全家。经济上曾支援过我家的父亲的学生。在困境中帮我购得车票，我才顺利地离开兰州的师兄学姐。关心我的闺中女友夫妇，为我找到终身伴侣，使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家。这些好心人，有的早已辞世，我敬盼他们在天堂里安息。尚健在的，我真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凡是帮助过我家的人，我都牢记在心，永远感激。

“反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某人为维护自己的威望，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因而对错划为右派的人，仅用“改正”，而不提平反。1957至1979经历廿多年的磨难，在磨难中早已亡故的，“改正”时千方百计掩盖死亡真相，编造疾病名目，作病故处理，其家人遭受难以表述的牵连，甚至被逼身亡，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赔偿。现在大部分当年受冤屈的“右

派”都相继离世，健在的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即是当年刚出生的“右二代”也年近六旬，可现在对“反右”运动，当政者仍不能彻底反思，还在坚持“正确”，扩大到 99.99%，还是“正确”，世上竟有如此荒谬的说法。其实大家都明白，其做法，一是遮掩，当年几千名右派受尽凌辱折磨臭名昭著的夹边沟，现已建起了度假村，用轻歌曼舞、休闲娱乐显示繁荣，去掩盖当年的悲惨景象；二是回避，装聋作哑，对健在的“右派”老人的呼声，不作回答，甚至还监视，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了，还有几年可活，拖上十年八年，一直拖下去，老人们也将寿终离世，即是 1957 年刚出生的“右二代”也将陆续故去，第三代、第四代……对过去的事也可能一无所知，当年整人的当权者及其助纣为虐的追随者也死完了，某些人期盼过去的一切就可随岁月而完全流失。因此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点历史痕迹。我认为，世界民主潮流滚滚向前，总有一天会见到曙光吧？！

——完稿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父亲诞辰  
100 周年前夕）。2019 年 7 月修改定稿

# 父亲遗作

## ——南海泛舟记

（1947 年在南京矿产测堪处所作）

以下是父亲 1947 年在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工作时，发表在该处《矿测近讯》刊物上的文章及诗作，对我来说，是父亲留下的珍贵遗作，将近 70 年了，难得谢家荣先生一家能保留至今，承谢学锦先生之女发来给我，我当很好珍藏。

### 南海泛舟记 王本莢

丁亥仲春，余與高子存礼奉派赴西沙群岛测勘燐矿，侧闻该地远处南溟，除林岛驻有海军人员外，其余渺无人迹，好奇心动，欣然束装就道，抵沪而舰未抵埠，乘间作杭州之游，是时春意方浓，山色湖光各呈妍态，襟怀为之一醉，凡三日返沪，舰始抵埠，移居舰上。俟其启旋。

四月三日，舰始解缆出吴淞口，九重空阔，一片汪洋，水绿霞红，风恬浪静，俄而一轮红日，坠落天

边，暮色苍茫，夜凉如水，立於舷上者久之，始入舱熟睡。次日，风渐紧，舰身渐觉动摇，及入台湾海峡，波涛汹涌，舰身起落於陵谷中，舰上舱门抨然作响，人坐舰中，如入摇篮，只得蜷卧悬榻，任其颠簸，幸未呕吐。越三日，舰近香港，至四月七日晨，始见远山一片，屹立海中，渐入港门，则大厦高楼，都来眼底，俄顷，岸上车轮尘突，路塞人喧，而市声已入耳矣。舰旋转海面良久，始得一抛锚位置，於是换艇登陆，稍事盘桓，商旅云集，街衢修整，足以骋耳目之愉，然而卧榻之侧，引人鼾睡，不禁有感於怀也。

舰泊港面凡三日始往广州，泊於沙面，岸上浓荫绿树，细草如茵，华屋成行，周道宽坦，因上岸稍事游憩。越日，广东省政府设宴招待，并乘专车赴黄花岗一遊，土阜丛冈，得埋忠骨，令人肃然起敬。日落啣山，始驱车返城，时华灯初上，即下车缓步於闹市中，酒楼小酌，滋味盎然，醉醺醺回舰而卧。舰留广州者三日，因得访南明绍武君臣冢，苏东坡书於六榕寺之遗墨，及南汉宫苑遗址。

四月十五日舰启碇，十七日抵榆林港，此港素闻为南方优良军港，仅见诸地理教科书中，今日践履其地，诚为快事。该地经日人经营，建筑良好，万吨船

只，可逕泊碼頭，馬路縱橫，平滑如鏡，但街市僅有高大之房屋數間，其餘則茅檐槿屋，零落數椽而已。附近村落之黎人婦女，多肩挑椰子，來貨於市。椰子體大如碗，為堅壳之果實，擊破則清水溢出，頗有酸澀味，但該地赤日懸輪，灼金溶石，偶有行動，渾汗如雨，得一二椰子擊破，將水傾注口中，則覺遍體生涼。黎婦皆跣足蓬頭，面目黧黑，着青衣，但不着褲，腰際系青裙，裙邊綉白色花朵，其語言即廣東人亦不了解。余與高子登岸，曾向其購椰子，只得指物索購，屈指計錢，彼則目冉冉動，口啜啜言，余等瞠目不知所對，相視而笑，授錢取物而已。居榆林港三日，乘間往附近之田獨鐵礦作大略之調查工作。

廿一日艤出港向西沙群島進發，南海汹濤，甚於台灣海峽，經一晝夜，卧不能起。翌晨，風稍靜，卧艙中，聞人呼曰：「至矣！」「至矣！」因出艙凭舷西望，見天边一线，若干小陆地断续出现，航行良久，始近林岛，绕其南端至西岸距海滩一千八百尺下旋，先以无线电通知驻岛人员，俄顷，遥见数十白衣战士，鹄候海滩。余等乘艇驶近海滩，改乘木船划行一程，然後涉水登岸，岛上人员，一阵欢呼，因伊等不见国内人士者已六阅月矣。

登岸後与广该岛驻留人员略事接谈，伊等均有虎口余生之慨，因法人曾有强迫登陆之行动，伊等奉命死守，法人见威协未成，率舰离去，此本年二月事也。岛上原有若干建筑，都摧毁无馀，现就其残馀材料凑合成容膝之平房数椽，发电间，气象台，及士兵寝室，集在一处，朝夕相见亦可稍慰寂寥。余等因就屋中小憩，索水解渴，颇有咸味。日人在该岛掘有二井，此水出自距海岸稍远之井，水味已较淡。随即步入森林，枝桠交错，阔叶遮天，初见小径，疑其有路可通，不及百步，荆棘纵横，绝无履迹，地面一综黄黑白，腥气逼人，触目皆为鸟粪。鸟白色，翔集树间，鼓翼长鸣，嘎然有世外优游之慨，因未能深入，循原径而返，绕岛之周围一周，费时不及一小时。此岛原为椭圆形，最长径约一千八百公尺，故其周长不及十华里。是时潮水已落，傍岸之珊瑚礁得透水入目，波摇疏影，宛若游龙，是日风平浪静，安然返舰。

越日，风骤急，波涛澎湃，涌若移山，余等因亟欲完成任务，荷囊携斧下舰，舰舷甚高，余先下，高子立舷上，余跨下所悬之铁索梯，面向舰身，背向海面，两手紧持横杆，逐步徐徐而下，时舰身摇动，梯亦随如悬摆，艇在舰傍随波腾跃，水激船身，惝然作

响，余觉渐近梯之尾端，试以足後踏，意欲下艇，高子立舷上顿足嗔目而呼曰：「空！」「空！」盖艇骤落波谷中，余则右足悬空，进退维谷，勉强回头下视，艇於浪花四溅中，低昂如飞舞状，只得耐心紧握铁索，俟其上举俄顷之际，一跃而下，坠落艇舱中，触额折足勿顾也。其余诸人，皆冒险鱼贯而下，闭目坐艇中，任其逐浪前进，但觉身如附翼，心亦怦怦然，良久，始进入波浪稍杀处，因水浅换乘木船亦不致遭没顶，於是登岸擬作数日勾留。

自是日起，每日深入森林，披荆斩棘，穿越枝桠，进行掘坑工作，地面树根穿插，掘坑甚为费力，因解衣赤裸，汗涔涔下滴，浓荫处虽不通风，幸能遮去日光，时锄时憩，虽数尺之坑，费时甚久，觉腹馁，即返破屋中进餐。岛上守备队部赠余等各小罐头一瓶佐食，皆大欢喜，因在舰上每食皆清汤所煮之冬瓜一碗，十数人共菜一簋，已匝月不知肉味，得此如获佳珍。入夜铺席於破屋地上，海风拂暑，且无蚊虱，甚为舒适，与白日大相庭迳，若日之方中，其温度恒在华氏百度以上，岛上人员，仅皆以布系腰际，终年不着衣服，沐海水浴，皮肤呈黑黝色，渠等皆来自青岛福建，骤视之，俨然当地土人也。

余等在该岛勾留九日，因间赴邻近之石岛一观。由林岛赴石岛，须於下午四时後落潮时徒涉而过，水平胸部，着皮靴踏水中礁石，但觉蹒跚巅滑，随波荡漾而行，费时十余分钟，始获登岸，因其间有八百公尺之距离也。该岛屹立海面，宛如假石山置於池中，西北绝壁悬崖，高约十余公尺，层次朗然，均为石灰质之沉积物，下部洼然有洞，系海水冲刷而成者。因登岛之顶部，全岛在目，四顾茫茫，水天无际，岛之直径不足四百公尺，矮树零星数株点缀其间。日人遗留之鸟粪石，堆成小阜，此岛不独人迹渺然，即海鸟亦不见飞影，余等往来此岛者凡三次。

四月杪日返休息，五月一日舰启碇，绕往南端之林肯岛，航行约三小时，渐近该岛，岸上隐约有人影移动，舰长以望远镜观之，仍未清晰，因该岛素无居民，疑系法人侵佔，即命左方卸下炮衣，装备子弹，以防万一，舰上诸人佇集舰边，各有惊讶之色。俄而驶近岛岸，见岸上仅三人，以手相招，即判断其非法人，因在岛之西南距岸一千五百公尺处下碇，乘艇横行一程，再涉水登陆，所见三人，立於登陆处，褐衣草笠，赤足袒胸，则海南岛之渔夫也。因伊等为响导，引人探幽，舰长亦派兵四名，持枪在前搜索。该岛亦

树林丛密，海鸟栖集，渔夫在傍海岸之树下，结一草庐，长宽皆不及丈，屋中所有仅草席一铺，铁斧一具，破碗数个而已。屋傍有大约方尺之水井，水滤出珊瑚礁中，为伊等之饮料，除此三渔夫外，更无他人，朝向红墩，暮观碧浪，乱草藉地，鸟语深林，亦世外桃源也。余等在该岛勾留约三小时即返舰。

前在林岛获一大龟，重逾三百斤。余等系於午夜绕岛环行，瞥见海滩上，有龟足之痕迹，因於该处守候，俄顷，见其出海面，舒腿昂头，匍匐而至，於是骤起，持木棍以一端抵地，横落其腹部，而突转他端，腹部朝天，龟因无着力处，不能抵抗，系以麻索，四人曳之不能动，更加三人，始将其曳至海岸，专船送舰。此番在林肯岛又向渔人购得两只，大小與林岛者相约，携回艦上，盛木桶中，贮以海水，唼呷有声，亦平生罕见者也。

舰启碇绕林肯岛之南端而北返，翌日返榆林港，再留三日，重往田独铁矿作调查工作。舰将发之前夕，大张龟宴，食其一龟，共食者有当地要塞司命部及舰官长共约七十余人，尚未能尽其肉，味鲜美，无腥气。五月六日舰启碇返广州，过香港时又泊三日，至十一日始抵广州，泊黄埔，乘艇入城，更衣沐浴，皮肤起

水泡而更生新皮者凡二次，自吮肘部，似有咸味，盖全身不经淡水洗濯已匝月矣。当进驻西沙群岛时，居於舰上，不独洗濯为艰，即饮水亦告缺乏，天热口燥，搔首无策，幸居岛上，有稍淡之井水，吞之如饮甘泉，迄返广州，无异重返天堂，大为快慰。

先是本拟乘原舰返京，该舰迟迟不发，後接得处中匯款，遂决意改乘粤汉车，转汉返京。适春雨滂沱，沿路桥梁，多被冲毁，候至十七日，始登车，行至英德，迎面开来之客车被匪劫，俄而前面桥梁又被冲毁，车留英德一昼夜始复前进，当过甫经修复之桥梁时，车身摇摇，如入险境，探首窗外，基地龟裂，蠕蠕然行将崩塌，及机车全部过桥，心始释然，本来二昼夜之行程，经五昼夜始达汉口。东下旅客，甚为拥挤，而招商局以登记为辞，强有力者，书一便条笈立购若干优等舱位，由是黑市购票成为惯事，余等因无门径，只能依登记手续办理，因留汉口又六日，黄鹤楼头，鹦鹉洲畔，亦经凭吊怀古。至六月七日始登江安轮，至九日與六朝胜地，久别重逢，东南半壁，环绕一周，险境奇闻，都经目睹，於生活史中，又添新颖之一页也。

步怀楚兄原韵恭祝  
季师五秩大庆成二章

——王本莢

- (1) 星罗拱北天，人寿亦丰年，橘藻篇三百，春秋计八千，培才期尽用，树德务求全，谁慰苍生望，东山有此贤。
- (2) 坐拥皋比日，徵书几度催，民生拯水火，宝藏集山嵬，凿石寻和壁，开渠发古煤，寿人斯寿国，同举玉斝杯。

注释：此诗是父亲恭祝其恩师谢家荣先生  
1947年五十华诞时所作。

(说明：父亲遗作字体不少是原繁体字，原本想尊重原文，不想改动，但为印刷方便，有不少繁体字我改了，可能还有个别漏改。)

## 2015 年 清明节感言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

——摘自辛弃疾《汉宫春》

今天是 2015 年清明节，我感慨万千。我的祖父**王子濂**逝世于 1958 年 8 月，是在我父亲被错划右派遣送夹边沟、家境突然变故、处于十分窘境中自缢离世的，当时草葬于兰州市一处荒僻之地，我仅于 1959 年辍学回兰州时去哀悼过一次。1960 年底离开那令人伤感的城市之后，至今已 55 年，我无法再去谒悼，我想那座简陋的坟茔早已不复存在。

我的父亲**王本葵** 1956 年 4 月由原位于武汉市的中南地质局调往西安西北地质局，同年 6 月西北局迁至兰州，后分省局，父亲就任职于甘肃省地质局，他只是一名地质钻探工程师，从事技术工作，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和团体。在甘肃局仅一年，1957 年被当时局领导丛健之流以“莫须有”之罪名而错划为右派，遣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受尽屈辱和劳累，在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于 1960 年底（具体时间不详，因当局并未通知家属）因饥饿及劳累而亡，时年刚满 47 岁。是夹边沟几千饿亡者之一，其遗骨就丢弃

在沙丘上，以后的几十年“夹边沟”成为当局的敏感之地，我也因主客观原因不可能去到该地悼念，对当时情况也知晓甚少，仅是从互联网及有良知的作者所写的文章中看到对该地的有关描述，是一处货真价实的人间地狱。

我的母亲未进过学校，文化不高，但是一位操持家务的能手，一直是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家人，在父亲去夹边沟后，甘肃省地质局强行收回所住宿舍，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房，带着年高体弱、双目接近失明的家翁几乎流落街头，好心人推荐她去当保姆，后去兰州甘肃建工局所属的一家街道所办简陋的油毡厂做工，才得以活命。当时兰州副食供应已很紧张，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在劳累与饥饿中，患上了浮肿病，在她病情危重时，我从天津大学中途辍学回到兰州，在好友帮忙下寻到了一份工作，收入可勉强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母亲才得以休息，病情也逐渐稳定。1960年底我的工作也遇变故，这时甘肃严重缺粮，兰州街边也出现了饿殍，兰州已是一遍混乱，不少外省籍在兰州工作的人纷纷离开，火车站拥挤不堪，我也带着母亲南下广西南宁，我在南宁结婚成家，母亲也才有了安定的生活。但 1958 至 1960 将近三年的艰

辛生活，加之对我父亲的思念及随后我父亲的亡故给了她巨大的打击，原本瘦弱的身躯已积劳成疾，1966年3月中旬便一病不起，患上了脊柱癌，转辗几家省市大医院，多方治疗亦无效果，在病床上躺了八个多月，1966年11月25日辞世，时年52岁。骨灰现安葬于南宁烈士陵园市民公墓区，在安葬母亲时骨灰缸内放入了一帧父亲遗照，墓碑上有俩老合影及名字，以示双亲同穴。如果父亲不遭此劫难，母亲也不会刚过知天命之年而早逝。

今年清明节前，我有机会看到了对在夹边沟劳教过幸存健在的老人们的采访记实影像，影像中的老人都已年逾八旬，他们讲述了当年在夹边沟的磨难经历，远胜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影像中我看到了在沙滩上到处丢弃着头颅骨、髌骨、大腿骨、肋骨……，我不知其中有否我父亲的遗骨？有几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不辞辛苦去到该地弯着腰用双手在肮脏的沙土中仔细的翻查，将这些遗骨拾起来轻轻地放入塑料袋，他们说：“不忍心再让难友们的遗骸再遭风吹日晒和辗压，以后要安葬这些遗骸。……”老人们向难友的遗骸庄重地鞠躬，甚至艰难地双膝下跪，祝愿难友们安息。他们还高声唱起了用《夜半歌声》曲谱自己新填

的歌词的歌，这歌声虽不会如某些经过精心包装歌颂盛世而赢得高人的赞赏，但这些发自善良老人们内心对逝去的难友真诚怀念的苍老歌声，它震撼了大地，感动了善良正义的人们的心灵，我反复对这些影像看了几遍，这歌声使我内心灼热。他们将用余生为逝去的难友们争回公道，洗刷冤情。看到这些，我禁不住热泪双流，我从心灵深处赞佩这些老人们的善良、忠诚，也使我更为疑惑，当年这些好人为什么遭到如此的劫难？！

2014年清明节，反右中历尽艰辛现健在的、夹边沟幸存回来健在的老人及已在夹边沟罹难者的后代自愿出资，还有一些正义人士的捐款，在几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艰难的筹划和奔忙下建起的夹边沟死难者纪念碑，却遭到一些良知泯灭者捣毁砸碎，更有甚者还将已埋入的遗骨挖掘出来，丢弃在沙丘上，使之风吹日晒。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是秉承何人指示？还是自觉自愿，这些人他们有父母亲人吗？有一句俗语：“人都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你们就能预测到你们的父母亲人及自己一定善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多行不义必自毙。我还想问：清明节怀念故去的亲朋，扫墓祭祀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到底触犯了哪条

法律或规章？夹边沟的这些右派罹难者，早在 1978 年就已摘帽改正，改正书上按中央所发文件明白称为“xxx 同志”，家属及健在的难友清明节前往悼念，却遭遇野蛮地阻拦，一套一套的假话就是不让进入荒冢祭奠拍摄，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几位手无寸铁的老人却让这些人如此神经紧张，就不言自明了。

我无法去到兰州及夹边沟，但祖父及父亲的音容笑貌都深藏在我的心里，我深情地敬盼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我为父亲及与我父亲相伴长眠在夹边沟的难友填下一词，我知道可能不合韵律，但是我的心里话，以示我对罹难者的敬意。

### 清明献词 ——（踏沙行）

逝者难瞑，健者渐老。莫名冤屈何曾了。

夹边莹陋尽凄凉，沙丘遗骸知多少。

迷雾仍浓，平冤杳渺，清明悼念遭阻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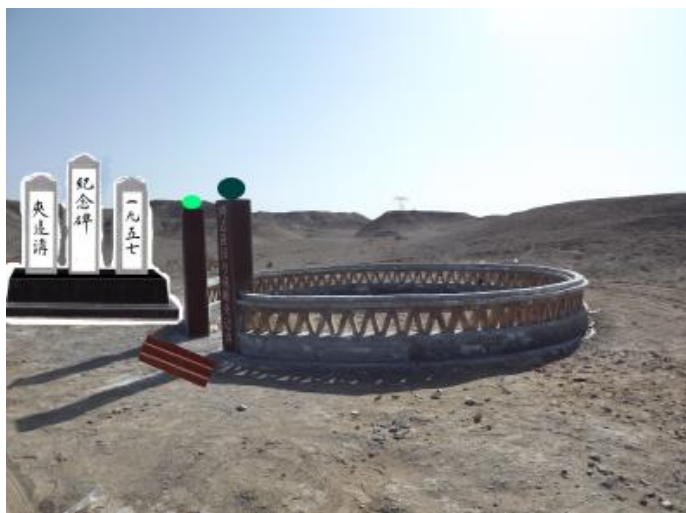
仰望苍天泪涟涟，苍穹何日阴霾扫。

——写于2015清明节

(以下是夹边沟受难者家属出资及社会正义人士捐款所建墓冢,后被良知泯滅者搗毀。)



夹边沟纪念碑和《罹难者衣冠冢》



鴻志報國兮魂斷夾邊溝  
民富國強兮和諧祭冤群

## 怀念故乡

至今我离开我的祖籍湖南宁乡已 70 年了，只是在 2002 年应堂兄成哥邀约，离乡 54 年多后，回去过一次，但停留时间只有不到两天，即头天上午约 8 时半从长沙乘汽车出发，约 10 时半到达成哥的家，他家是在原祖居老屋（保民堂）旁新建不久的二层楼住宅，在他家住宿一晚，第二天下午约四时许就离开了。因时间太短，我来不及探访儿时在故乡所去过的地方，也不可能会见儿时熟识尚健在的全部亲戚及乡邻。但此次短暂的故乡之行却感慨良多。

约是 2010 年，成哥老两口就离开乡间去到岳阳他大女儿处，现又居住在长沙他二女儿家近旁新购住宅，不打算再回乡间（他现已患病不能自理，住康复医院已两年多），去年（2017 年）6 月 26 日他二女儿及儿子来南宁看望我，我问他乡间那所住宅现在谁住，侄儿说空着，没人住，连房间门也不关了，看他的语气是丢弃不管了，我感到很可惜。

2002 年这次从长沙回乡乘汽车只用了两小时，乡间至宁乡县城相距约 30 公里，县城至长沙市约 50 公

里。在我的记忆中 1949 年以前从我家乡间祖居到县城的道路虽不需爬山越岭，路虽是平坦的，但大多是不足一米宽的泥土或细沙路，是不通汽车的，去县城只能是步行、骑马、坐轿或乘坐马车。一般乡民很少去县城，有在县城工作或读书的较年的学生往返多数是步行，1943 年秋至 1945 年底我父亲在县城附近中学任教时，回家往返也多是步行，成年人有人也骑马（当年乡间大户人家有自家养马，自家不养马则有马行有马出租）。年长者或妇女幼童则坐轿或乘坐马车（有的家庭自家有轿，只需雇请轿夫，自家无轿则向轿行租用）。1948 年初我和母亲及妹妹第一次离乡去父亲工作处（锡矿山）及 1949 年 4 月由锡矿山返乡，这两次经过长沙，在宁乡与乡间祖居这段路程就是坐轿的。

回想起 1949 年 11 月初再离开乡间去长沙时，因当时新政权刚建立，父亲从长沙回乡去接我们时，考虑到坐轿在乡间影响不好（解放了还享受），不想在乡间借轿雇轿夫，就从我外婆家先步行至大成桥镇（此镇距外婆家约 6 华里），到镇上轿行再租轿雇轿夫，于是我和母亲跟随父亲步行，而我妹妹则坐在一箩框内由雇请的一位挑简单行旅的挑夫挑着。谁知到镇上后，原有的轿行已关闭，无法租到轿了，只好继续前行，

且沿途所经较大的镇已均无轿行，行至距县城还有 10 多华里时，天又下起了大雨，在大雨中且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走，到达县城旅馆，下半身湿透，上午约 9 时从乡间出发，到达县城已是晚上将近 9 时，中途在一镇上吃午步休息了不足两小时，沿途有时也坐下小歇一会，当时只有 11 岁多的我，徒步行走将近 10 小时，里程约 30 公里，还遇上了风雨交加，当晚就发烧了，双膝关节红肿，从此就落下了双腿关节炎的毛病。第二天上午休息，下午约 2 时乘公路局汽车去长沙，县城至长沙的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的客车速度很慢，不到 50 公里却用了 3 小时多，到达长沙已是傍晚 5 时多，还需两次过渡（当年没有湘江大桥，坐小木船过湘江，湘江中有一小岛将水面隔开），上岸乘人力车到达住处（我华姑的家），已是晚上将近 8 时了，华姑一家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晚步及住宿房间，晚步后洗洗就睡下了，两天路途的经历我确实感到很累，交通不便利真给人们带来不少麻烦。2002 年回乡与 50 多年前那次离乡相比，一次是行程劳累，一次是轻松的两小时，真是天壤之别。

2002 年回乡正是秋末，岳麓山上的枫叶正红，实在太美了，我写下了几句话：岳麓山区红叶艳，故乡

美景心中留。双鬓染霜苍穹问，不知还有几度秋？

**我已八十岁了，几十年的经历真是“风箱饱历知寒  
暖，世味经尝识苦甜。”儿时家乡的所见所闻及此次回  
乡所见，几十年家与国的变化，我想尽力记录下来。**

经历几十年风霜岁月，我 2002 年回乡时，祖辈均  
早已离世，父辈堂兄弟共 16 人，也只有一位年过八旬  
的婶娘健在，我这一辈比我年长的，也有几位堂兄姐  
已经离世，健在的留居乡间的所剩无几。

高祖辈留下的王家老屋(保民堂)，原住着三伯祖父  
一家及四伯祖父一家，1950 年后土改时已分给贫农，  
后被大部份拆掉，只余下三间房，成哥买了保留，也  
算是老屋遗迹了。我居住的祖居烈武湾早已完全拆除，  
房基已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1950 年后，故乡的变化，族人们在艰辛中度日，  
他们大都知道我父亲在外的工作单位及我家住址，但  
没有一个本族亲人向我父亲来信要求帮助。在当年那  
种政治气氛中，他们不想累及我父亲，这是亲人们对  
我们的爱护。

2002 年回乡与故乡亲人们相见时间短促，只会见  
了与我同辈的几位堂兄姐弟及几个下辈侄儿侄女。不  
禁使人回忆起当年大家庭的温馨岁月，祖辈、父辈、

我辈兄长们对我的关爱，节日的互相走访与团聚。几十年的相隔，上辈人在风霜岁月中受尽磨难，在 1950 至 1970 年相继辞世，大家庭分崩离析。

外婆家的情况：大舅早在 1951 年冤逝，成哥说二舅于 1993 年去世，到过南宁的表弟（二舅儿子）跑生意时因车祸伤了一条腿，行走虽有不便，但已无大碍，已不经商了，现家境还过得去。那些堂舅们 1970 前后相继去世，也谈及他们后代的生活情况，问我是否要与他们联系？他们的后代我儿时所见过的很少，大多不相识，也因为时间短促，不必再告诉他们，也就没有见到我外婆家的所有后辈族人。人世沧桑，多少话从何谈起？！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离别时只能是饱含着泪水互道一声“珍重”，那离别时的情景我真难以描绘。

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乡间旧貌已不存在。当年我的家乡独门独户居住的较少，只有少数较贫户居住在矮小土砖砌墙茅草屋顶较简陋的茅屋，而大多数人家都是几户合居在房间较多的瓦房深宅大院内，有的大院古色古香雕梁画栋，这些大院多数依山傍水。不论是低矮茅屋或是大院瓦房周边大都种有果树：如桃树、石榴树、橘子树……，结出的果实，虽不如现时的果

实味道鲜美，但在当年的农村孩子们没有多少零食可吃，酸酸的水果也吃得津津有味。房前池岸屋后土堤各色野花在不同的季节绽放。池塘池水虽欠清沏，但很少干涸，孩子们常在池边用竹篾编织的笠箕沉取小鱼小虾。池岸柳枝摇曳，弯曲的小溪流水清沏见底，当时乡间基本没有供饮水的水井，小溪中的清水就是供饮用的，溪中也时有小鱼游弋。我儿时记忆中当时不曾有丢荒的土地，就是狭窄的田埂上两边也按季节种植有适时的农作物，如豆类等植物。

我居住的烈武湾是丘陵地带，没有太高的山，都是小山和面积较大的土丘，都是黄土地。较平坦的地方种植着红薯、花生、萝卜，这种黄土地生长出的白萝卜，可腌酸萝卜、可晒萝卜干，新鲜白萝卜如用来煲骨头汤或牛腩汤，味道特别鲜美，记得陪我回乡的儿子吃到这样的萝卜时，赞口不绝。而坡度相对较高的地方则种植桐梓树、茶子树、毛竹、松树等植物，结出的桐子和茶子，榨出的油即是桐油和茶油，桐油可油漆木制门窗、家具、木桶、木盆等用具，茶油则可食用。毛竹长成后用来编织竹篮、箩筐、晒谷用地毯等。尚未长成竹子的竹笋也是一道美味的菜肴。松树结的松果及落叶可做燃料，煮饭炒菜时用它放进灶中

燃烧，冬天将红薯埋进刚燃烧完的热灰中可闷熟，是乡间孩子们的美食，寒冷的冬天老年妇女有时也将这种热灰铲入手提的小烤炉中取暖。我记忆中儿时的故乡，生活中所需米、菜、鸡、鸭、鱼、肉、蛋（包括咸蛋及皮蛋）、食用油等均可自给自足，仅需购买食盐。村民们对树木的砍伐也是有规矩的，不会任意砍伐或破坏植物，因而小山和土丘上都是树木成行，花草郁郁葱葱。

儿时所见那些房屋多已拆卸，见到的多是一个模式的两层楼的独户新建住宅。一路所见到的新建住房四周少有树木花草及苍翠竹林，沿途所见池塘大多干涸，池岸道旁也少有树木。成哥与杞哥原住的祖居老宅我记忆中屋前的池塘面积不小，当年微风吹拂时水波荡漾，岸边有一棵树干不小的树朝池面弯曲，像伸向池面的跳板，离水面很近，我儿时还调皮的趴在这树干上，手在池中划水玩耍。而这次回乡，此池塘的水已浅得快要见底，成嫂是用井水洗涮，而洗涤完的脏水就倒入池中，这几乎干得见底的池塘已是污水坑了，池内杂草丛生，那棵弯曲的树也已不见踪影。多数小山上已少见成行茂盛的树木，大多是丛生的茅草或无序低矮的灌林。原弯曲的小溪，有的已是无水的

壕沟，有的溪水很浅，据说现在各家都挖有水井，供洗漱饮用，不再用溪水了。小块的田地多已荒弃，杂草丛生，因此，我见到已不再是山青水秀。这难道就是现代农村新颜？或是环境已严重污染的现实。总之，这次回乡留给我的除了伤感，还有不少疑问。

我不理解 1949 年前，家居乡间的年青人，有的初高中或师范毕业后，还愿意回乡，在乡间小学任教，并不留恋城市。当年我读书的那所完小，校舍是一关帝庙宇，每天进香者络绎不绝，条件与现在乡间的小学校舍差多了，我的老师多是宁乡师范或其他中学毕业的年青人，有个别还是家居县城的，却愿意去乡村小学任教。是否当年的公职人员待遇城乡差别不大？我记得 1948 年前家乡有两位年青人，一是我家佃农刘老汉的儿子，老汉让他去锡矿山我父亲的钻探队当学徒，我父亲接纳了，可他去了不到半年，就想回家了，他说在钻探队两班倒，不自由，几个人住一间房太挤。在家乡务农，晚上可早睡，农闲时自由。想吃的菜自己种，吃得新鲜，想吃鱼虾就去抓。另一位杨姓青年，他父亲是喻家坳镇上一布店老板，他是 1944 年我父亲在乡间教书时的学生，1945 年高中毕业，他父亲想让他省城长沙市谋一公职，1946 初我父亲去南京工作

时，带他到长沙托朋友为他在当年的税务部门谋得一职，但干不到一年就回乡了，回乡后在喻家坳镇上一小学任教师，1948年我父亲接我们离乡时，他还来送行，我父亲问他，还想外出吗？他说不去了，在家乡父母妻儿团聚，感到温馨。因为当年父亲带我去喻家坳镇时，去过他家，他家人热情招待吃饭，他的父亲我还有少许印象，当时可能年过四旬。因此这次我回乡向杞哥打听他，杞哥说他父亲的布店后来也公私合营了，他家没有人子承父业，他父亲去世后，布店就与他家无关了。他本人在小学任教直至退休，1998已去世。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原来山青水秀的环境会变得树木稀少荒草丛生？池塘和小溪为什么会干涸，水流去哪儿了？以前清晨起床，就听到树上小鸟的欢叫，现在也听不到了，因为没有了大树，鸟儿也无处建窝，不知道可爱的小鸟们栖身何处了。

现在我在怀念故乡时，也只能在网上查找那些留在脑海中熟悉的地名，如我儿时曾去过的喻家坳镇、大成桥镇，原来与我居住的烈武湾近邻的宋家湾、荷叶塘、砖屋湾、沙泉坝……。聊以安慰思乡之情。

—— 写于 2018 年 4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1.

